

目 錄

起訴書.....	1
審訊經過.....	36
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受審經過.....	37
被告約瑟夫·契加克博士受審經過.....	58
被告雅羅斯拉夫·庫拉契博士受審經過.....	65
被告雅安·波卡爾博士受審經過.....	74
被告奧特卡·斯維茨博士受審經過.....	87
被告安东尼·曼德爾受審經過.....	94
被告伐茨拉夫·姆特非受審經過.....	103
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受審經過...	108
被告雅安·奧帕塞克受審經過.....	120
証人的証詞.....	140
教授安东尼·霍布薩博士的專家鑑定詞.....	162
檢方的總結陳述.....	167
辯護人致詞.....	202
被告最後的陳述.....	210
判決書.....	214

布拉格檢察署致
布拉格國家法院
(審判委員會主席)

起 訴 書

布拉格檢察長控告：

一、斯坦尼斯拉夫·雪拉，神學博士，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二日生於霍尼·聶特契茲，沙弗拉根主教兼阿羅木茨總主教區的副主教，其最後住址為阿羅木茨共和廣場三號；

二、雅安·奧帕塞克，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生於維也納，布列夫諾夫的本篤修道院院長，其最後住址為布拉格布列夫諾夫的修道院；

三、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神學博士，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費林，斯特拉霍夫的勃孟斯特修道院院長，其最後住址為布拉格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四、約瑟夫·契加克，神學博士，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於奧布丹尼，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議會副主教，其最後住址為布拉格第四區格拉堪斯廣場十四號；

五、奧特卡·斯維茨，神學博士，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於比爾森，宗座主教兼布拉格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諮議員^①，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四區格拉堪斯廣場七號；

六、雅維斯拉夫·庫拉契，神學博士，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生於拉坦尼斯，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諮議員兼教士聯合會理事長，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四區格拉堪斯廣場七號；

七、安東尼·曼德爾，神學博士，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生於布拉格，爲主事，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一區米夏爾斯卡街十二號；

八、雅安·波卡爾，神學博士，一九〇六年五月八日生於布拉格，大主教的一等秘書，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四區格拉堪斯廣場五十六號；

九、伐茨拉夫·姆特非，一九〇七年十月一日生於別契弗依的特洛布克，薩列斯修會的修士，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八區哥必里斯克廣場一號；

以上所有在押犯人，均犯有背叛國家、從事間諜活動以及本起訴書中所檢舉的其他罪行。

我國各民族的解放鬥爭的歷史證明，羅馬天主教教廷一向站在壓迫制度和剝削階級的一邊，而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正是爲了反對這種壓迫制度和剝削階級才進行了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的。作爲國際政治因素之一的梵蒂岡及其教廷，一向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柱，幾世紀以來一直充當着看守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的典獄吏。在第一次世

^① Canon是天主教主教府諮議員，即主教議會(Chapter)之議員。

——譯者

界大战期間，正当捷克与斯洛伐克民族爲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而進行着生死鬥爭之際，梵蒂岡却支持着中歐諸強^①。等到奧匈帝國滅亡之後，它又以全力支持已經被打垮了的封建勢力，企圖借各種幌子來恢復奧匈帝國。

在所有這些企圖都遭到失敗之後，梵蒂岡及其教廷又勾結了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部分和地主們，來共同反对正在爲社会解放而鬥爭着的勞動人民。爲了幫助捷克斯洛伐克的資產階級破壞工人階級和整個勞動人民的團結，一九二五年主教團曾經頒佈了告教徒書，以開除教籍來威脅那些參加革命工会組織的工人。在整個第一共和國時期，特別是在工人階級爲生存和社会正義而進行着最艱苦的鬥爭的時期，教廷始終遵守這種反動政策。

梵蒂岡及其教廷所採取的支持資本主義的政策，使他們走上公開支持世界法西斯主義的道路。梵蒂岡認爲，法西斯主義是反对社会主義及一切進步運動的有力的武器。這一點不但爲梵蒂岡与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所締結的條約^②所証明，而且也爲梵蒂岡在這些政权進行掠奪戰爭時期給予它們的政治上的支持所証明。在斯洛伐克，漢林納粹分子和赫林卡法西斯人民党的顛覆政策曾受到梵蒂岡的全力支持。這種陰謀活動——特別是斯洛伐克天主教教會會極公開地參加過這種活動——結合捷克斯洛伐克上層資產階級的賣國政策，就共同促成了一九三八年和

① 按指當時的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及奧托曼帝國的同盟。

——譯者

②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教皇庇護十一世与墨索里尼簽訂拉特蘭條約，一九三三年六月，帕賽利紅衣主教（現在的教皇庇護十二世）与希特勒簽訂了互助協定，——譯者

一九三九年的第一共和國的滅亡。戰犯約瑟夫·狄索之被任命爲羅馬教皇御侍，並被封以孟錫諾爾^①尊號的事實，只不過是梵蒂岡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滅亡上及其接踵而至的厄運中所犯罪行的進一步的証明。

在德國佔領期間——我國各民族在歷史上最艱難和最恐怖的時期——梵蒂岡對法西斯勢力的罪惡意圖給予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在第一共和國期間，梵蒂岡從來沒有按照新建立起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疆界，來修正各主教區的界綫——雖然根據一九二八年的協定，他們是有責任來加以修正的；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被佔領後不久，梵蒂岡就把邊區的教會行政組織合併到德國主教區內，因而承認了德國法西斯佔領者兼併邊境地區的罪惡行爲。這種公開支持捷克與斯洛伐克人民的首要敵人的政策，也就是佔領期間捷克與斯洛伐克天主教會的政策。斯洛伐克天主教會，乃是法西斯的所謂“斯洛伐克國”的主要支柱，它對因給希特勒德國以罪惡的軍事支持而招致的斯洛伐克人民的重大犧牲和浩大的經濟損失，負有主要責任。捷克天主教會曾經全力支持德國佔領者。當愛國的一般教士同其他各階層的勞動人民一起用種種抵抗方法來與佔領者的萬惡統治進行鬥爭的時候，教會當局却發出通令，贊同佔領者所勒令施行的星期日工作制，命令各教區的信徒參加收集廢鐵供戰爭之用，並自動派遣神學學生到德國去服強迫勞役。他們對於捷克人民，無論是一般居民還是教士的被劫走或被消滅，從未表示過隻字的抗議。相反的，在格得立克被刺

① Monsignor 係對大主教的尊稱。——譯者

之後，教會却頒發了告教徒書，命令信徒服從並支持佔領者，並且贊同當時正在發生的大屠殺行為。在薩斯姆克的納粹秘密警察所設立的教士集中營裏，教會還替納粹秘密警察執行監督的任務。

被告雪拉、庫拉契和波卡爾曾充任納粹秘密警察的情報員。被告雪拉向納粹秘密警察告發了教士多西德拉，因此，雪拉應對於多西德拉之被捕和被關入集中營負責。在格得立克死後，雪拉就把阿羅木茨地區的希臘正教神甫和信徒的名單交給了納粹秘密警察，以便納粹秘密警察能夠消滅他們。經教會幾個高級僧侶的推薦，梵蒂岡委派了曾經出賣過幾十名捷克人並使其中許多人遭受殺害的前納粹情報員弗朗茲·孚納·波勃任高級教職。被告契加克在一九四四年曾以教會代表的資格，參加了叛逆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教會進而為這個佔領者的組織徵募過盟員。在一九四三年，甚至在一九四五年，當法西斯佔領的末日已經是明顯和不可避免的時候，教會還頒發過告教徒書，呼籲支持納粹統治，並與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這實際上是針對着我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在蘇聯解放軍反法西斯戰爭匪幫的勝利鬥爭的最後階段中，教會的代表們曾接受大劊子手卡爾·赫爾曼·弗蘭克的任務：與西方列強進行有關由英美軍隊進佔捷克各省的談判，以此來剝奪我國人民從資本主義桎梏下獲得解放的可能。捷奸格盧比和皮納爾特在教會代表的贊同下，攜帶弗蘭克的函件飛抵西方。這些叛徒們陰謀談判的詳情，都由被告雅羅里密克記載於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檔案裏。

無敵的紅軍之擊潰帝國主義法西斯軍隊，給我國各民族帶來了解放，並使勞動人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掌握了

政權和走上了新的歷史的道路——一條享有一切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自由的廣闊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解放了的祖國國土上所成立的第一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綱領在科息斯頒佈了，這個綱領保證了所有基本的自由，特別包括了傳教、信仰和舉行宗教儀式的自由。這種廣泛的宗教信仰自由，也體現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的新憲法中。這個憲法保障了信仰自由、公開或私自表示任何宗教信仰的自由和舉行任何教派宗教儀式的自由。關於教堂和宗教團體的經濟保證的條例，保證由國庫提供教士和教堂以物質上的保證。新刑法也保障了信徒及其所進行的宗教活動。同時，政府的實際政策也保證了所有這些法律條文的實現。因此，與人民及人民的利益休戚相關的廣大信徒和一般教士都愈益堅決地擁護人民民主制度，並且忘我地參加了共和國的建設。

天主教會當局則恰與天主教信徒中勞動人民的態度相反，它一開始就對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抱着敵對的態度。這種態度和梵蒂岡的敵對政策是一致的，而梵蒂岡則在其為反對蘇聯及世界進步運動的鬥爭而對之寄以全部希望的法西斯和納粹勢力被消滅以後，就公然站在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這一邊，成為美帝國主義的奴僕。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會這種與人民民主制度為敵的政策，也是由於它自己純粹的物質上的利益關係而使然的。教會的廣大地產曾逃避了第一共和國所施行的不徹底的土地改革；因此，在土地改革完成後，例如布拉格的樞機會議廳竟仍然佔有一萬七千八百六十一公頃的土地，阿羅木茨的樞機會議廳約佔有三萬三千公頃的土地。又如在審判馬斯蒂拉克及其同謀者時所揭露的、曾經充當敵人間諜中心的修道院和修

会也佔有七万五千八百四十三公頃的土地和林產。此外，一九三四年斯特拉霍夫修道院还以用相当低的價錢買來的杜勒爾名畫“舊約宴”換取了五千二百七十五公頃的森林和耕地。甚至在一九四五年，天主教教会總共佔有地產達三十一万九千公頃之多。

被告斯維茨在他的供詞中曾坦白地供認：“保存教堂的这些財產，也是教会的主要任務之一。”

因此，人民民主制度基本原則之一——“耕者有其田”的實現，引起了擁有土地的上層神職人員對人民民主制度的仇恨。這就是梵蒂岡及其教廷之所以在其敵對活動中與敵視人民民主制度的小團體、與曾經鑽進前二月民族陣綫各政黨中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殘餘分子、與在戰爭期間和法西斯合作後來又畏罪逃往國外的賣國者們勾結在一起的原因。

被告修道院院長奧帕塞克，根據從他身上查獲的文件，乃是梵蒂岡最親信的代理人之一，關於他在一九四五年與教皇庇護十二世的晤談，曾作如下的供述：

“……從這一觀點出發，在我把政府綱領所規定的政治、社會及經濟措施指給教皇看時，特別着重指出那些危害上層神職人員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事項。教皇則使我了解到，在反對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領土上，我們也是不會孤立無援的。實際上，教皇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那次晤談時所給我的暗示，一直到反動政客們發動旨在反對我們人民民主政府的經濟與社會措施的第一次運動並受到我們公開而有效的支持時，我才体会到。直到一九四六年的選舉運動中我們指使天主教徒反對共產黨而擁護前天主教人民黨和前斯洛伐克民主黨

的反動勢力時，我才完全了解……”

因此，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當包括千百萬的天主教徒在內的勞動人民正在奮不顧身地進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教會卻使用各種破壞手段，極力阻撓及破壞各種經濟和社會的進步，以期顛覆人民的政權，使資本主義制度在捷克斯洛伐克復辟。教會利用教堂和講壇來進行破壞活動，唆使人民不信任新法律、不信任政府和人民民主制度。在被佔領期間，教會曾贊同為佔領者進行的星期日和假日工作制；而現在，教會却用傳單、告教徒書和祈禱文等來反對医治戰爭創傷的志願工作隊和有利於人民民主經濟的重要的星期日和假日工作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教會利用了各種各樣的組織，特別是“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來反對國有化，反對新的“教育法”和土地改革覆查。這個具有破壞性的所謂“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头子，就是被告斯維茨。在反對人民民主制度的鬥爭中，教會曾與已滲入許多經濟和政治部門中的反動資產階級分子勾結在一起，以期從中進行破壞活動。教會的反國有化與反土地改革覆查的運動，主要是通過天主教人民黨中領導前二月事件^①的反動代表來進行的。在一九四六年的選舉運動中，教會不僅在財政方面，還通過祈禱文和告教徒書來支持天主教人民黨。在斯洛伐克，教會曾與民主黨締結一項選舉前的協定，以期恢復赫林卡法西斯人民黨的舊黨員們在民主黨組織內部的活動。後來的發

①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聯合政府中國家社會黨、天主教人民黨、斯洛伐克民主黨的反動分子完全暴露出反動面目，企圖利用一九四七年大旱災所引起的困難，製造反革命政變，但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的聯合革命粉碎了反動派的陰謀。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組成了由哥特瓦爾德提名的新政府。——譯者

展暴露了這個協定的叛逆性質，其最終目的，乃是藉斯洛伐克的反動勢力來顛覆人民民主制度。

最大的破壞活動乃是教會發動的反对新農業法的運動。教會將地主、農業資本家和教會自己的物質利益置之於農民的切身利益之上。旨在反对土地改革和反对新農業法的運動，曾在一九四六年主教會議上詳細討論過，並被通過。為此目的，他們曾下令，濫用講壇來進行宣傳，並發佈指示，命神甫們在佈道時要用嚴厲的教會懲罰來威脅所有向教會要求土地的人們。被告雅羅里密克曾把一份秘密獲得的新農業法草案，轉給駐布拉格的聖使館。聖使館隨即向我政府提出反对這個法案的抗議。这就粗暴地違反了國際法中關於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

一九四八年初，正当反動派準備叛亂的時候，教會曾參與叛亂計劃的準備工作，並且打算公然站在叛亂分子這一邊來反对人民。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的主教會議上，教會通過決議，既不承認，更不接受政府对教會地產所採取的措施。根據抄獲的文件獲知，會議還討論了一個建議案，命令主教煽動信徒來反对政府，並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共和國發出開除教籍令。直至二月事件時，教會還頒佈過支持反動叛亂分子的告教徒書。

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中勞動人民的勝利和在建設方面的成就，打消了資產階級反動派企圖用它在國內的力量使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切妄想。復興起來的民族陣綫將叛徒和破壞分子从經濟和政治部門中消除出去，因而也就使教會沒有利用合法的場合來对共和國建設進行破壞和怠工活動的可能。

在擁護國家建設的廣大信徒的壓力下，教會早在一九

四八年春天在民族陣綫中央行動委員會的神職人員委員會中，曾與政府進行談判。然而，一九四八年六月教會又中止了這一談判；而於一九四九年初，全權大使伏羅林納傳達了梵蒂岡的直接命令後，談判遂告完全決裂。後來獲悉，實際上，教會根本就不願意與政府締結什麼協定。而且，梵蒂岡和教會也早就選擇好了使談判破裂的時機。在布達佩斯人民法庭上對拉斯羅·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審判過程中即暴露了它的真正意圖。提交法庭的文件證據揭露了外國帝國主義集團和梵蒂岡所擬定關於在人民民主國家內組織破壞活動的計劃。

顯然，捷克斯洛伐克教會的行動乃是帝國主義列強和梵蒂岡反對各人民民主國家的重大的陰謀計劃的一部分。而教會與政府所進行的全部談判，只不過是掩飾他們準備進行破壞活動的一種手法罷了。

早在一九四七年，羅馬教廷以及作為其積極幫兇的被告們就改組了“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被告斯維茨受命領導該會。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後，他立即周密地把該會組織成為一個分佈極廣的陰謀活動網，以期把所有的教區都包括在這個會的範圍內。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在這陰謀活動網之上設置了一個秘書處，對外把它稱為“佈道部”，以前曾在法國受過陰謀反共的方法這一方面的訓練的被告曼德爾被任命為這個作為教士及其助手們整個間諜破壞活動的樞紐而建立起來的秘書處的處長。“佈道部”設有秘密信差，並備有汽車，以便與各教區保持聯系。它還具有印刷設備，來印製非法書籍、小冊子、傳單以及告教徒書等。外國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書籍都可以從國外獲得。全部活動經費，概由教會藉修葺教堂為名向信徒們捐募得來的基金中支

取。分設在各教區的支部均由梵蒂岡的老間諜們領導。“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秘密小組，也逐漸在大多數教區內建立起來了。這些小組在青年方面負有特殊的任務，要在青年中間散佈破壞性的和道德墮落的影响，目的在破壞人民民主的秩序與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聯盟中青年人的團結。

被告斯維茨和曼德爾以及由他們所領導的陰謀活動網的破壞活動的結果，可以由其同謀者維索維茲的隨營司鐸胡弗案件來說明。胡弗的小組曾散佈大量帶有譏謗性的非法傳單，發恐嚇信給機關工作人員和國家保安部隊人員，並搜集武器。在阿羅木茨地區，帕孚尼和阿德米茲隨營司鐸的擾亂小組也進行了同樣的活動；該組除散發傳單外，還進行恐怖分子的訓練和間諜活動。在霍多尼附近的多尼·勃羅諾維茲的本堂司鐸勃利塞克組織了一個由一批誤入歧途的青年們組成的小組。這個小組完全根據“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指示，策劃謀殺霍多尼地區保安部隊隊員阿路瓦·狄茲卡。謀殺是由這個小組的一個組員和一個法國特務機關派來的恐怖分子共同進行的。

差不多所有在這裏的被告都與此外的破壞組織有联系，或則與帝國主義特務中心的間諜有联系。被告庫拉契勾結了國家保安部隊隊員、叛徒雅安·皮特博克，組織了因恐怖活動和叛國罪而判處死刑的賣國賊休多巴、本查、班達以及其他許多叛徒的潛逃。被告波卡爾曾和雅羅里密克與從事散發非法傳單的、名為“我們來了”的非法組織共同準備過一次暴動，並支持謀殺茲拉姆少校的美國“反間諜情報機關”的特務米蘭·卓克。被告奧帕塞克和雅羅里密克與約瑟夫·保羅、波古斯拉夫·庫卡爾以及江狄契卡博士的一些擾亂治安的小組有联系，通過這些人的媒介作用，他們領導

了由前“奧來”天主教青年會會員所組成的恐怖集團的活動，他們在策劃一個武裝暴動。作為這個地下活動的領導人的江狄契卡就是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進行破壞活動的領導成員之一。江狄契卡被捕後，當時還未被揭發的奧帕塞克和雅維里密克又勾結了江狄契卡的繼任人霍斯狄契卡博士，繼續他們的罪惡活動。後來，霍斯狄契卡因領導顛覆陰謀而被法庭判了罪。奧帕塞克又通過了霍斯狄契卡及其匪徒華格納博士結識了曾經策劃殺害利托麥里澤城五個公職人員的美國“反間諜情報機關”特務加塞克。加塞克曾帶領奧帕塞克逃出國境。

羅馬教廷的另一個罪惡活動，乃是破壞捷克斯洛伐克勞動人民的國家保險事業。這可以由普勒羅夫地方的“教士疾病救濟基金”案來證明。被告雪拉和斯維茨以及教會中的其他負責人，盜用救濟基金達數百萬克朗^①之巨。他們計劃把這筆從國家中央保險公司騙來的救濟基金用來從事破壞活動。

經過這些準備活動後，教會於一九四九年春，在與政府談判決裂之後，即進行大規模的破壞活動，以擾亂共和國內部的安全，挑撥信徒們積極反對政府，並從而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進行顛覆活動創造有利條件。早自一九四八年夏天，教會即通過其廣佈於各地的破壞組織，散發許多帶有煽動性的傳單和非法小冊子，以造成信徒和神職人員中的騷動，並影響他們來與國家對抗。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梵蒂岡的老特務伏羅林納抵達共和國之後，教會發動了一個公開的攻勢。在四五月間，教會

① 捷幣名。——譯者

通过其陰謀組織，每星期發給神職人員們一份新的主教通令，公開地攻擊國家，並煽動神職人員們進行反抗。西方資本家和梵蒂岡的報紙及廣播電台均以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粗暴誹謗來配合主教們所發動的攻勢。六月十九日和二十六日，教會頒發了兩封帶有煽動性的告教徒書，由曼德爾的組織網傳遞至各教區，煽動信徒們積極反對政府。梵蒂岡特務伏羅林納親自巡視了各教區，發動並組織公開的破壞活動。當他抵達斯洛伐克的時候，赫林卡的前人民黨黨員所組成的法西斯地下活動曾企圖掀起暴動。

這個集中進攻的高潮，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和七月十三日頒佈的、教皇庇護十二世親自批准的開除教籍的勅令。根據這一勅令，許多誠實的天主教徒僅僅因為他們參加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被摒棄於教會之外。同時，教會還在教區中頒佈並非法地散發了如何執行開除教籍勅令的指示，以瓦解我國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生活，並破壞我共和國的社會與經濟制度。

但是，所有這些企圖都被我國人民的團結所粉碎了。

與此同時，教會還企圖爭取下層神職人員。在誘騙信徒的企圖遭到失敗以後，教會就對那些忠於人民並拒絕參與破壞活動的神甫們施加壓力並以迫害來威脅他們。一九四九年秋天，教會強迫下層神職人員在一項反對政府所認可的關於教會及宗教團體經濟保護條例的宣言上簽名。

但是，下層神職人員像一般人民一樣，拒絕受教會的利用，不顧一切阻撓地効忠於政府，並領取按新條例所規定的薪金。他們還以公開表示忠誠的示威遊行來表明他們對勞動人民和對政府的忠誠，例如一九五〇年夏天在維利加德以及其他許多重要的宗教場合所舉行的効忠人民的神甫示

威遊行就是如此。

在其所有發動大規模破壞活動的企圖遭到失敗以後，教會按照梵蒂岡的指令改變了鬥爭方法，轉而加緊利用各種修會來破壞人民民主制度。一九四九年夏，在布拉格的贖世主修道院所舉行的長老會議上擬定了以下的綱領：拒絕服從政府；絕對服從教會長老；進行反政府的宣傳；禁止神甫們由政府聘任去神學院教書；以個人的接觸、佈道，通過非法組織來鼓動信徒顛覆人民民主制度。在邊境上的修道院則成為偷越國境的叛徒、間諜和恐怖分子們的棲身之處。這在茲諾伊莫(雪米克)的多密尼克修道院院長的審訊中已經得到了証實。

修道院中的長老們，特別是被告雅羅里密克，曾在各個隱秘的地方把院產、名畫以及珠寶等物匿藏起來，以供他們作為破壞活動的基金。布拉格國家法院在對修道院長奧格斯丁·馬加爾卡及其同謀犯的審判中曾揭露：他們企圖在修道院牆後假造“奇蹟”，來哄騙愚昧的信徒，使他們相信，推翻人民民主政權乃是神的意旨。在為時更早的一次審判中就已經判明，進行間諜活動乃是梵蒂岡授予教會的主要任務之一。

間諜中心就是先後為里特、福爾尼、伏羅林納和德·利華等主教所領導的教皇聖使館。該間諜中心專門搜集並整理從“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僧俗羣衆小組中獲得的間諜報告；梵蒂岡廣播電台就利用了主要由被告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庫拉契和波卡爾所供給的那些捏造和誣蔑性的報告，來猛烈攻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他們的政府和人民民主制度。這個中心的首要特務分子，就是被告斯維茨、曼德爾、波卡爾、姆特非以及曾因叛國罪和間諜罪而受審並判

刑的前耶穌會的錫爾根修士等。被告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以及修會中的其他首腦們，都把他們的間諜報告直接呈遞給他們在羅馬的上司。

這些報告包括有關工廠的興建和擴建、生產情況、二年計劃與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經濟命脈、勞動力、對外貿易等情報，和關於保安系統的組織以及軍事和保安性質的重要情報。所有這些，爲了國防利益都是必須嚴守秘密的。

這些報告的性質明顯地証實了他們是幫助準備對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侵略戰爭的；而教會正是把賭注下在這樣的戰爭上，來實現他們顛覆人民民主政權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復資產階級統治的計劃。

這些報告是通過外國的，特別是意大利和法國的外交使節，轉送到國外去的。這些間諜報告不但送到梵蒂岡而且还直接送到其他帝國主義的間諜中心。被告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斯維茨、庫拉契、曼德爾和波卡爾和西方國家持有或不持有外交護照的特務保持聯系。例如，他們與法國大使館前任武官菲力普將軍、使館官員比耶夫人、意大利公使館新聞參贊斯坦達多博士、比利時的所謂“新聞記者”伊維斯·波讓、英國新聞記者戈德弗雷·李亞斯及其他人均有關係。

當所有這些爲梵蒂岡所指使、由教會實施、而由各被告直接執行的各種罪惡活動都遭到失敗以後，梵蒂岡又使用了一種新的、甚至更爲陰險的方法來反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民主制度。當梵蒂岡特務機關潛伏在教會中的出色的間諜分子相繼被破獲後，梵蒂岡即用所謂的授權制，亦即授以全權委任書的辦法，來建立一個新的間諜破壞組織。這種授權制（全權委任書）是梵蒂岡在一九四九年末頒佈的，書上註明“嚴守教皇機密”的字樣，來保證梵蒂岡的罪惡政策

会受到绝对秘密的对待。由於这授权制的關係，各主教區中的教权就轉移到一個从梵蒂岡最可靠的奴僕中选拔出來的新的秘密教会所掌握。此外，这些秘密授权書还包含对領導反人民民主制度運動的一些明確指示。例如，被告雪拉博士便秘密地被任為阿羅木茨大主教，在阿羅木茨的托馬歇克博士也被秘密地任命為主教，被告契加克与秘密被任命為主教的馬托歇克都同時被授以布拉格大主教的職权，專門負責領導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運動。同時，又有許多副本堂和神長們都被授权在他的教區內行使主教的权力。羅馬教皇的这种秘密授权的方法（亦即在“嚴守教皇机密”的條件下來頒佈）和实施这种手段時所使用的異乎尋常的詭計，都使其破壞和叛變的目標暴露得非常明顯。

各被告的罪惡活動，尤其是他們在被破獲了的梵蒂岡地下組織中所担任的要職，都証實了被告們与教会殘餘勢力勾結在一起，成為反对國際和平進步的陣綫、反对勞動人民光輝的社會主義遠景的國際反動陰謀中的首要分子。而且為了達到这些目的，他們打算不擇手段，甚至幫助準備帝國主義戰爭，來反对自己的祖國。

各被告的有關材料：

一、斯坦尼斯拉夫·雪拉

神學博士，沙弗拉根主教兼阿羅木茨大主教區的副主教，陰謀活動中的首要分子。早在佔領期間，他就開始了反國家、反人民的叛逆活動。佔領期間，在阿羅木茨大主教普列江博士的知悉与同意下，他充当了納粹秘密警察的正式情報員。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間，他一直供給納粹秘密警察的官員班克爾和勃蘭池以情報。因此，他對於本堂司鐸多西德拉、希臘正教教会的一些神甫以及其他許多人的喪

失自由，尤其是对於这些人在納粹秘密警察魔掌中遭受物質損失这一事实，都应負共同的責任。

解放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間，他在阿羅木茨与另一個納粹秘密警察隊情報員利奧波爾·波斯皮西爾博士取得協議，彼此掩護在佔領期間的罪惡行爲，以逃避懲罰。根據這一個協議，被告雪拉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阿羅木茨特別人民法庭的審訊上曾做了偽証。當時，他故意編造了一些有利於波斯皮西爾博士的謊話，並故意隱瞞後者在佔領期間的罪惡活動情況。同時，在他自己被審訊時，他還進而勸誘別人爲他的罪惡行動作偽証。

一九四六年，駐布拉格的聖使館秘書福爾尼來訪雪拉，請他替被捕的附敌分子普勒羅夫的漢尼克夫婦說情。爲了達到不起訴的目的，他允爲出头奔走。但是，後來由於無法探知漢尼克夫婦案到底在什麼地方審理，而未能實現他原來的目的。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雪拉企圖阻撓條頓騎士修會財產的收歸國有。他与該修會的婦女分会修長、修道院院長威特克商談，陰謀更改會名。他進而与條頓騎士修會修長沙斯基商談，有意將該修會應該被沒收的財產併入教會產業之內。

一九四七年，雪拉又在阿羅木茨命令弗拉納教授及其爪牙出來組織並指示神甫噤使信徒反对當時正在擬訂中的教育法案和新土地法。

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勝利後，雪拉又在阿羅木茨參與建立阿羅木茨總主教區的一個陰謀組織，就是所謂的“佈道部”，也就是布拉格陰謀組織網——“佈道部”的一個分支，其任務在於：用種種非法手段去影響輿論；用宗教信條作護

符，打進經濟政治生活中；在人民羣衆中人爲地煽起不滿情緒，維持一種長期的、不穩定的局勢，以便在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支援下實行政變，使資本主義復辟。這個組織曾在雪拉的幫助下散發非法印刷品、告教徒書、傳單及小冊子等。這些東西的內容都是要煽動神職人員及信徒來執行上述任務。當反動派和教會進行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運動時，“佈道部”曾翻印並散發過叛逆性的開除教籍勅令以及許多附加於該項勅令的指令。

被告雪拉對忠於教會的神甫，和對那些從教會自身的利益看來是不可靠的神甫們，都列有名單。對於前者，他任之以教區中的要職，給以優厚的生活待遇；對於後者，則極力阻撓他們參加人民民主國家的建設，並且還爲了他們的愛國行爲，曾企圖對他們加以迫害。一九四九年末，在梵蒂岡的間諜及破壞活動網改組以後，雪拉一躍而爲梵蒂岡駐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秘密特務之一。職業間諜兼梵蒂岡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執行人的教皇聖使館秘書德·利華曾授權給雪拉，雪拉因而非法地接受了阿羅木茨大主教職務的全權。根據同一指令，托馬歇克博士也秘密地被任爲阿羅木茨總主教區的主教。於是，他便在梵蒂岡的命令和他所接受的授權書的基礎上，藉授予許多神長們以類似的授權書，使他們有权在他們的教區內執行主教大權的方法，在阿羅木茨總主教區的教省內發展了間諜和破壞活動網。此外，不顧法律的明文規定，不經政府批准，他又任命了一批新的主教府諮議員。

遠在此以前，被告雪拉便參加了教會的間諜活動。他曾從布萊士教授處獲得了許多有關國家教區委員會與教區行動委員會秘密會議和機密指示的報告，並曾支持“佈道部”

搜集間諜情報的工作。“佈道部”的秘密信差修士德孚夏克博士在雪拉的知悉與同意下，將所搜集並經過整理的間諜情報轉送給駐布拉格的聖使館。

一九四七年，身為阿羅木茨總主教區副主教的雪拉，對於瞞騙普勒羅夫“教士疾病救濟基金”財產的事件，不僅書面表示明確的贊同，而且還親自參與其事。被告斯維茨及其他教會首腦均參加了這次騙局，盜竊了為數達數百萬克朗的教會特殊救濟金，結果使國家中央保險公司和下層神職人員都遭受物質上的損失。

二、雅安·奧帕塞克

布列夫諾夫的本篤修道院院長，曾在羅馬各神學院中受訓三年。這一訓練使他成為梵蒂岡的忠實奴僕和極端兇惡的間諜。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奧帕塞克在被任為院長之後，曾親自去羅馬，並謁見過一次教皇。在这次謁見時，被告曾將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特別是有關國防設施的情況的報告呈遞給教皇。據他自己供認，教皇曾向他保證過，在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決不使捷克斯洛伐克教會處於孤立無援狀態。在这次晉謁羅馬的過程中，奧帕塞克又謁見了仇視我共和國的梵蒂岡顯要人物塔狄尼、孟丁尼、帕塞多和紅衣大主教密卡拉等。他把報告給教皇的秘密情報同樣地洩露給他們，並從他們那裏取得有關教會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進行破壞活動的指示和指令。

一九四七年，他以布拉格大主教代表的資格參加了波蘭的聖·阿德勃特聖典，並成為利用教會聖典來進行反動陰謀計劃的當事人之一。同時，他還利用護送聖·阿德勃特遺骨道經捷克斯洛伐克之便，沿途進行以破壞為目的之佈

道宣傳，企圖煽惑我國人民來反對人民民主制度。

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後，被告更變本加厲地參加了叛國陰謀及間諜活動。他與法國大使館，與建築師蘭格，與布爾諾的神甫保羅相勾結，共同佈置了前國會議員、賣國賊休多巴的潛逃事件，以便其在國外組織反共和國的人民民主政權的叛國活動。一九四八年秋，奧帕塞克又與休多巴派遣來負責聯繫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反政府分子的聯絡員弗利波將軍建立了關係。由於弗利波的請求，奧帕塞克又與山前“奧拉”天主教青年體育會會員所組織的反政府集團領導人江狄契卡建立了關係。他把弗利波從國外帶來的指示轉送給江狄契卡，並安排二人的會晤。他就這樣在一個國外組織龐大的叛國陰謀中充當了聯絡員。在這個陰謀中，他完成了重要的使命。一九四九年夏，在他最後一次晉謁梵蒂岡之後，奧帕塞克又將利普卡和真克爾的指令轉送至布拉格，並且檢查了賣國賊克利米克是否遵照捷克斯洛伐克教會的指示，在國外進行叛國活動。江狄契卡被逮捕之後，奧帕塞克通過華格納博士與反共和國陰謀組織領導人之一的霍斯狄契卡建立了關係。奧帕塞克又曾幫助因叛逆活動而被通緝的修道院院長伏西赫潛逃國外，自己則設法通過華格納博士和恐怖分子加塞克的幫助離開了本國。

奧帕塞克和教會其他的叛國陰謀參加者一樣，曾唆使信徒們進行反對共和國的破壞活動，並從同案被告波卡爾、庫拉契和曼德爾處取得許多反政府的小冊子和煽動性的告教徒書。他一方面散發，另一方面還親自在講壇上宣讀這些東西，並且勒令各地也照辦。

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參加了在布拉格贖世主修道院中所舉行的長老會議，並和其他到會者共同草擬了有關各修

道院進行叛國與間諜活動的指示及諭令。後來，他又把這次會議的情況寫成了報告，送給他的上級教會負責人。

早在一九四五年，奧帕塞克在羅馬即奉本篤教會首席院長菲得列·德·斯多琴簡之命，搜集各種情報資料，並轉送至羅馬。根據此項命令，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從附敵分子席諾斯特、被告庫拉契、波卡爾和雅羅里密克以及其他一些僧俗人士處搜集到了情報。這些政治、經濟報告中包括有：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情勢的詳細情報、政府機密設施、二年計劃和五年計劃、對外貿易以及其他事項等。從國家最高利益出發，這些情報は應該對外國嚴守秘密的。但是，奧帕塞克卻將這些情報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並於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九年晉謁梵蒂岡時親自呈上。

在這幾次晉謁梵蒂岡時，奧帕塞克故意將捏造的和誣蔑性的情報交給梵蒂岡無線電台廣播發言人卡勒爾·弗爾特修士，以便他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瘋狂和煽動性的廣播攻勢。

在此期間，他又將一些誣蔑性的間諜報告，直接送給駐布拉格的聖使館，並將有關教會政策及其反政府鬥爭的情報交給一個自稱是新聞記者而實際是比利時間諜的伊弗斯·波讓。通過波讓的關係，他將政治和軍事方面的，特別是對共和國國防極為重要的有關工業建設的情報，轉送給在英國活動的捷奸帕羅特卡和布魯沙克兩人。他所收到的這些已經寫好而待轉送的報告，都是藉神學生哥夫通之助，從以羅特勒克為首的、主要活動於摩拉維亞的間諜小組那裏獲得的。

奧帕塞克所進行的這些活動規模很大，而且就他本人的地位及其所可能引起的後果來看，他的活動方式是特別

兇惡的。

三、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

神學博士，斯特拉霍夫的勃孟斯特修道院院長，勃孟斯特修會的副主教兼該修會領導人。雅羅里密克在羅馬學習時，曾受梵蒂岡反人民政策的教育和間諜訓練。

在佔領期間，他曾與賣國賊格盧比和皮納爾特及其他附敵分子等保持密切的聯繫。關於卡爾·格爾曼·弗蘭克派遣格盧比與皮納爾特所率領的代表團在戰爭結束的前夕飛抵西綏，企圖再度出賣共和國的使命一事，他全部知悉。有關這次旅行的記錄，由他匿藏在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檔案中了。

自解放以來，他一直是梵蒂岡反動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積極執行人之一。在教會其他首要分子的授意下，他曾設法逃避新農業法案，並與一些修道院院長相勾結，共謀阻撓對他們財產的沒收。當台普拉修道院的德籍教士們被驅逐出境時，他曾與修道院長老兼勃孟斯特修會總修長努茨訂約，納粹修士們一旦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時，再將寺院及其全部財產歸還給他們。此外，他在佈道時還反對參加義務勞動的星期日工作隊，主張重新恢復業已被停止了的教堂假日，藉此來阻撓彌補在佔領期間所受的創傷並阻撓社會主義的建設。

在教會的陰謀活動中，雅羅里密克起過很重要的作用。早在一九四八年春，他就曾經與一些修道院院長，特別是與後來被叛處叛國罪的馬加爾卡和泰若夫斯基訂約，彼此同意修道院修士們利用朝聖、教堂聯歡節以及其他宗教性的羣衆慶典等機會，在信徒中間散佈對政府的不信任，並在他們佈道時，煽起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他接受了所有唆使信徒

和神職人員反對政府的告教徒書和反政府的小冊子，並命令各教堂宣讀這些東西。一九四九年夏，他曾在斯特拉霍夫教堂內佈道，反對人民民主制度。後來，他又將這一佈道稿油印出來，作為煽動性小冊子來散發。同時，他又号召信徒們去收聽梵蒂岡誘使人們反對共和國的廣播。一九四九年夏，在靠近斯多德的克里索維非法舉行的一次神甫會議上，他製訂了所謂忠誠宣誓書，通過“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組織分發給所有的神甫們，讓他們在這宣誓書上簽名，表示他們對國家的仇視和對教會的忠誠。雅羅里密克曾親自在講壇上向聖會宣讀這個宣誓書。他還散發從各破壞組織得來的其他的煽動性小冊子。他與叛徒休多巴一直以書信保持聯繫，他通過休多巴，從一些逃亡的叛徒那裏獲得對共和國進行破壞活動的指示和諭令。然後，再由他將這些指示傳遞給江狄契卡地下組織中的主要分子、聾啞學校校長諾法克修士。就在這次以顛覆人民民主政權為目的的罪惡活動失敗後，雅羅里密克仍繼續進行着他的煽動性活動。被告和在他唆使下的其他修道院長老們，曾將修道院珠寶、名畫以及其他各種珍貴物品匿藏在許多秘密的地方，以使用來作為繼續進行其破壞活動的費用。

從一九四五年起，雅羅里密克即與梵蒂岡的間諜網相勾結，經常轉送有關我國政治、經濟生活的各種報告。這些報告，都是在他們親身會晤時直接交給對方的，特別是交給勃孟斯特修會總修長努茨本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他把從前任部長加拉處獲得的一份有關土地改革的政府機密會議報告交給了努茨。此外，雅羅里密克還將同樣的報告交給教廷聖使里特。一九四九年夏，雅羅里密克又交給弗利波將軍許多份告教徒書，其中有捏造的、誣蔑性的關於迫害羅馬

教會的謊言。他經法國大使館館員比耶夫人的手，由法國外交函件絡繹將許多間諜報告轉送給法國情報特務休多巴。在這些報告中，他洩露了有關政治、經濟情況，特別是農業生產和貿易部門情報的重要事實；而這些事實，從我們國家的利益着想，都是應該嚴守秘密的。

四、約瑟夫·契加克

神學博士，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議會大主教。曾在羅馬攻讀神學。佔領期間，他是納粹組織“反布爾什維克聯盟”中央委員會委員。他曾積極地執行其職務範圍內的一切工作，並強迫神職人員儘可能地積極參加該聯盟的活動。佔領當局曾因他的活動授以聖·萬塞斯拉斯金鷹勳章。

他參加教會反共和國的陰謀的行為在於保存大批誣譏性和煽動性的小冊子、傳單和告教徒書等；並利用在樞機會議廳中的職權，收集這些底稿，又將其付印。他曾募集資金，以供給“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進行破壞活動。當梵蒂岡的間諜及破壞網改組後，他擔任了這個組織中的極其重要的職務。一九五〇年五月，他由秘密授權書的任命，和秘密授命為主教的馬托歇克共同領導布拉格總主教區の間諜破壞網。

在這之前，契加克在梵蒂岡間諜網中擔任的是聯絡工作。他從各種各樣的人手裏替教廷接受情報資料，並通過聖·亞瑟拉修道院的修女交給聖使館，以便轉送梵蒂岡。他對梵蒂岡的忠誠和馴服使他發了私財而變成了一個百萬富翁。他把所有錢財都投到地產上和證券交易上，並儲蓄了現款。後來，他甚至於侵吞教會募集的救濟金，把它們存到銀行裏個人的戶頭上，來增加他從信徒們工作中所榨取的財富。

五、奧特卡·斯維茨

神學博士，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諮議員。曾在羅馬就學，因而成了梵蒂岡的忠實信徒。一九四七年一月，他成了“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首腦。在他的領導下，這個組織成了教會在反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制度鬥爭中的工具。“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並不從事宗教事務，却組織了大規模的破壞活動。它以募集教堂修理費為藉口，從信徒們身上榨取錢財，建立辦公處，給工作人員發薪，並設置印刷非法刊物的技術設備；這樣，一個備有專門信差和摩托化交通工具的完整的秘密機關便建立起來了。斯維茨在這個職位上與破壞網的組織領導人被告曼德爾密切地合作。他參加過許多次非法的會議，經常在會上煽動與會者反抗人民民主制度，並責成神職人員物色一些對共和國心懷不滿的人，並招募他們從事破壞活動。從一九四八年夏到他被捕時為止，他參加了翻印非法小冊子，特別是翻印秘密傳單和告教徒書等的工作。翻印這些東西的目的，在於煽動神職人員和信徒們起來反對政府，並為宗教叛亂準備基礎。

被告斯維茨從一九二〇年起到他被捕時為止，一直將間諜報告供給駐布拉格的聖使館。作為這項工作的報酬，他於一九二九年被任為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諮議員，從而變成了七千公頃主教會地產的共同收益者。解放後，他的間諜活動變本加厲了。他每週向聖使館彙報兩次，並供給聖使及其官員們有關重要的政治情報，有關工業、二年計劃和五年計劃的經濟報告以及軍事性質的，特別是有關國家保安部隊和陸軍中官佐的實力與人員調配等的報告。斯維茨更進一步以隨營司鐸的身份，潛入我們極其重要的國防工廠裏面，搜集有關該廠的生產情況與工作強度等情報，轉送給

聖使館。被告知道，聖使館在教會最高級代表人物中間安插有間諜分子，而他自己乃是一個龐大組織中的一環。他的間諜網中包括有神職人員及非教徒。在二月事件之前，他從這些非教徒中間，特別是從當時的天主教人民黨總書記克利米克博士、聖萬塞斯拉斯聯盟主席揚德博士、前社會福利部部長格魯帕博士等人處接受情報。

斯維茨還把情報供給意大利公使館的新聞參贊斯坦達多博士；並從這人處獲悉，這些情報は專供意大利情報機關用的。前在蘇聯進行間諜工作的耶穌會會員可拉可維奇，因被揭露而逃往斯洛伐克，並在該地組織了大規模的破壞工作網。他又被迫逃出斯洛伐克而到布拉格來找藏身之所。被告斯維茨又為他與聖使館建立了聯繫，並在其他一些人的幫助下，使他逃往國外。

由於對人民民主制度的仇恨，他甚至不恥於欺詐行為。為了使勞動人民最偉大成就之一的中央保險公司遭受鉅大的損失，被告身為普勒羅夫“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之一，對該公司的特別救濟金採取了欺詐的手段，並藉教會中其他高級教士之助，將該基金全部盜竊。由於這種欺詐行為，再加上負責官員的貪污和瀆職，承擔“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國家中央保險公司和受保險的下層神職人員竟遭受了為數達四百萬克朗的鉅大損失。

六、雅羅斯拉夫·庫拉契

神學博士，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諮議員，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教士聯合會理事。在羅馬四年求學期間，他曾受反人民、反民主的梵蒂岡傳統政策之教育。

從一九四〇年至佔領結束，庫拉契一直充當納粹秘密警察的情報員。納粹秘密警察根據他給納粹秘密警官奧

帕豪塞的情報，來監督教會與納粹分子的合作。他是奧帕豪塞的執行人，通過他的媒介作用，奧帕豪塞才能對布拉格總主教區的神職人員發生影響。納粹秘密警察曾在被告的參與下，在查斯姆克設立了一個教士拘留營。庫拉契又以波希米亞聯合股份印刷公司董事會副董事長的資格，與納粹分子甚至在政治上合作。他以這一身份強使席諾斯特、編輯霍蘭卡、教士艾都阿德·勃羅依、斐迪南·庫拉等人給“人民報”撰寫擁護納粹的文章。叛徒們企圖通過這些頌揚納粹主義與誣蔑英勇的蘇聯——她的勝利鬥爭乃是我國求得解放的唯一希望——的可惡的文字宣傳，有意識地破壞人民的團結，敗壞人民的道德意識。

解放後，庫拉契曾利用一切機會煽動教徒們起來反對政府，並極力支持二月事件前天主教人民黨領導人物中的反動派，力圖瓦解民族陣綫，並對科息斯政府綱領實行怠工。

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勝利結束後，被告又參加散發煽動性的小冊子和傳單的活動，煽動信徒們反對政府為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條件的措施和法令。庫拉契積極參加被告斯維茨和曼德爾所領導的“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工作。他搜羅了一羣人來有意識地散播外國廣播電台所捏造的、誣蔑性的消息。

庫拉契曾與國家保安部隊中的叛徒雅安·皮特博克合作，佈置大批非法潛越國境的工作，並為此目的而偽造各種證件。皮特博克直接參加被處叛國罪和間諜罪的叛徒休多巴、本查、赫爾和奧巴達勒克等的叛國活動。被告庫拉契本人後來也準備潛逃國外，並且為此目的用欺騙手段匯往羅馬二十五萬克朗，兌換了二十五萬里拉。他用教堂基金去支

持那些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清洗運動中被人民撤職的反動分子們。這樣，他就濫用了爲宗教事業而用的專款。

自一九四七年夏至一九四九年，他从雅安·皮特博克处獲得了有關保安措施和採取這些措施的原因、國防措施和对國防上幾個重要地方的保衛工作的情報，也就是說，从保安觀點看來，都是極端秘密的情報。此外，庫拉契又曾獲取關於我們的國民經濟，特別是關於因進口原料而發生困難的部門的情報。他將這些情報一方面交給聖使館，另一方面交給被告奧帕塞克，後來又交給意大利間諜斯坦達多博士，或通過他轉交給在羅馬的叛徒約瑟夫·班斯狄塞克修士。他給班斯狄塞克修士還送去了各種各樣有關捷克斯洛伐克情況的誣譏和捏造出來的報告，作爲梵蒂岡廣播電台对我國發動兇惡宣傳攻勢的依據。被告也提供班斯狄塞克一張忠於政府与人民的教士名單，以便梵蒂岡來處罰他們。

七、安东尼·曼德爾

神學博士，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四年在羅馬求學。他曾在羅馬“東方學院”受過与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作鬥爭以及專門对苏联進行間諜工作的訓練達二年之久。受訓以後，他便在一九四八年三月被任命爲所謂總主教區“天主教行動委員會”的組織幹事，又兼該會執行秘書處，即所謂“佈道部”的領導人。這一個過去在被告斯維茨領導下的間諜破壞中心，由於曼德爾的佈置，在組織上達到了更完善的境地。在這項工作上，曼德爾应用了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曾奉派去法國熟悉以叛賣活動作爲反共方法時所獲得的各種經驗。

“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是按照了法國的範例，由青年、婦女、工人、農民等小組系統組織起來的。該會通過這些小

組，在宗教的掩飾下滲入到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部門中，同時還建立起許多破壞小組，作為有組織的宗教暴動和反對政府活動的中心，以便最後實現顛覆國家制度的陰謀。曼德爾在所有教區裏面都設立了分會。他召集這些分會領導人開秘密會議，授意他們，無論如何要把天主教青年從進步青年中離間出來，並把他們訓練成為教會政策的忠實執行者。為了煽動信徒們反對人民民主制度，曼德爾曾在“佈道部”設法翻印了大批非法的、煽動性的小冊子、傳單以及告教徒書等。他又建立了一個非法的秘密交通站，藉助這個交通站將這些印刷品分發至各監牧區。他並從法國方面取得反共文件，將它們分發到各小組中。在小組長的秘密會議上，他們考查破壞工作的效果，並做出進一步活動的指示。

同時，曼德爾又將“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許多小組擴展成為一個間諜組織。他把在秘密會議上收到的有關政治、經濟和保安方面的情報，加以整理，寫成報告，交給他的上司，以便進一步轉呈梵蒂岡。他特別作了一個關於極重要的保安措施的詳細報告。曼德爾曾與所謂天主教新聞處的編輯班納特卡共同籌謀非法潛逃國外的事情。通過後來作為間諜被控告且被判刑的律師克里塞克的關係，曼德爾又與英國新聞記者戈德弗雷·李亞斯建立了聯繫，並答應供給他以間諜情報。此外，由前天主教婦女聯合會工作人員茲丹卡·洛勃可維索娃的介紹，他又認識了另一個外國新聞記者，並和他作了同樣的約定。

八、雅安·波卡爾

神學博士，大主教的一等秘書。一九四三年佔領期間曾充納粹秘密警察官員奧帕豪塞的情報員，按時供給他有關居民對德國當局及偽政府所採取的措施的反應和有關教會

高級人士的報告；並以其代理人的資格，在宗教界活動。作為他對納粹秘密警察服務的報酬，他被任命為獲利甚丰的布拉格第二區聖·斯蒂芬監牧區的管理人。

解放後，波卡爾仍與曾潛伏於二月事件前的國家社會黨及天主教人民黨中的反動政客中的顯要人物保持聯系。關於反動分子們準備發動政變，將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從政府中清除出去的計劃，他是事先就知道的。他還知道，一九四八年二月反動部長們的向政府辭職，在於使一個文官內閣繼任，好來篡奪整個政權，並將其交給反動派掌握。他曾發誓，保證教會將支持這些反動政客們，反對進步的立法活動，特別是關於土地改革修正法與教育統一法的運動。

二月事件勝利後，他便參加了教會當局的破壞活動。他抄出告教徒書，並將其轉交給破壞活動的組織中心“佈道部”，以供其翻印與散發。一九四九年六月，波卡爾親自將十份這種煽動人民積極反抗政府的告教徒書分發給索科洛夫的修道院，並附有指示，說要將此項告教徒書分發到各監牧區，並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在各教堂中宣讀。

一九四八年，他從一個名叫利布什·什塔斯娜的熟人那裏獲悉，此人在與一非法小組“我們來了”合作。於是波卡爾也正式加入該小組，進行組織非法向國外潛逃的和準備叛國政變的工作。特別是，他也知道這個小組支持過並掩護過曾經謀殺茲拉姆少校和準備進一步暗殺其他政治活動家的美國情報機關特務米蘭·卓克。一九四八年秋，波卡爾佈置了什塔斯娜的向國外潛逃，並給了她一萬克朗又五百元美元作為旅費。當她抵達國外後，波卡爾又通過意大利公使館寄給她三百美元。此後，他又在黑市上以每塊五百克朗售出了四百美元。這一千二百美元，是他從美國本篤會修士們

那裏得來的。它們是在這些修士們到捷克斯洛伐克來時私自帶進來的。波卡爾通過意大利公使館和聖使館的關係，一直和她保持着非法的通訊來往。此外，他又與其他煽動小組人員發生聯系，做他們與教會之間的聯絡員。

從一九三七年起，波卡爾就已經成為梵蒂岡情報組織中的一分子。一九四六年，他糾合一批有反動傾向的神職人員和非教徒，創立了自己的間諜組織。波卡爾將他所獲得的一切情報，都轉送給駐布拉格的教皇聖使館。他曾將幾份有關重要國家機密的國防部和內政部的某些措施的報告送給秘書德·利華，後來又送去一張愛國教士的名單，以便梵蒂岡可以對他們採取相應的對策。

被告一九四八年的羅馬之行，是他執行間諜任務的一個便利機會。這一次，被告曾把許多政治與經濟性質的間諜報告交給梵蒂岡間諜約瑟夫·班斯狄塞克。他又供給了梵蒂岡無線電台廣播員、賣國賊弗爾特許多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誣蔑性的廣播攻勢的材料。波卡爾又利用回程，從一個巴西修會會員那裏帶來兩封信，給後來因係罪惡的班達匪幫一分子而被判刑的神甫帕爾爾·古茨科。信中包括有給該匪幫進行恐怖活動的一些指令。

九、伐茨拉夫·姆特非

薩列斯的教士，曾在都靈研究神學。從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被梵蒂岡在布拉格間諜中心教皇聖使館僱傭為間諜。他的職務是將梵蒂岡各特務分子交來的間諜報告加以翻譯。這些政治、經濟和保安性質的報告，諸如國家機關的秘密通知、政治指示、保安措施等等概由秘書德·利華加以整理，然後在被告的幫助下，作為外交郵件遞送到梵蒂岡。

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〇年初，姆特非開始進行佈置潛越國境的活動。例如，他曾通過華狄斯的修士戴斯馬斯，佈置了格特魯達·米克奧華和孚拉·沙可伐二人的非法潛逃事件。又在德·利華的幫助下，被告使保加利亞的一個公民明哲夫博士得以非法潛逃。在其被捕前，他還佈置了外交部官員勃拉其博士的潛逃。被告一貫通過教皇聖使館的外交信使，從潛逃國外的叛徒處接受指示，並將它們轉交給國內破壞組織中的特務們，以此來支持反對政府的叛逆活動。

姆特非在受僱於聖使館的整個期間中唯一的差事就是從事間諜活動。

由於下列行為：

一、所有布拉格、阿羅木茨及其他地方的被告均曾在上述時期中互相勾結，並勾結其他罪犯，力謀摧毀人民民主制度和在憲法保障下的共和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並且為達到這一目的，而直接與外國勢力相勾結；特別是：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雅安·奧帕塞克、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奧特卡·斯維茨博士以及安東尼·曼德爾博士等，都是在特別嚴重的情況下犯有上述罪行的；

二、所有在布拉格、阿羅木茨、羅馬和其他地方的被告均曾在上述時期內互相勾結，並勾結其他罪犯，企圖竊取國家機密，並將其洩露給某一外國勢力；並且為達到這一目的，而與外國勢力建立了直接的聯繫；事實上，被告等也確曾竊取國家機密，並確曾將其洩露給某一外國勢力；特別是被告雅安·奧帕塞克、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奧特卡·斯維茨博士以及伐茨拉夫·姆特非等均係作為一個專門盜竊國家機密的組織成員來犯有上述罪行的；被告雅安·奧帕塞克和奧特卡·斯維茨博士二人所犯罪行，均

涉及極端重要的國家機密；被告雅安·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斯維茨博士及伐茨拉夫·姆特非等人之犯有上述罪行，均爲時甚長，範圍極廣，所採取的方式亦至爲險惡，被告伐茨拉夫·姆特非並會从中取得金錢報酬；

三、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雅羅斯拉夫·庫拉契博士和雅安·波卡爾博士等於德國佔領期間，曾在布拉格或在阿羅木茨充當納粹秘密警察的情報員，特別是充當納粹秘密警察官員班克爾·勃蘭池和奧帕豪塞的情報員，並由於與這些納粹秘密警察官員狼狽爲奸，而使他人的生命、健康與人身安全遭受嚴重的危害；其所犯罪行，由於當時佔領期間的情況和納粹秘密警察的性質，而益增加其危害性；

四、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和奧特卡·斯維茨博士曾在阿羅木茨、普勒羅夫和布拉格等地以詐騙手段侵吞“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特別是以財產過戶作爲藉口，故意欺騙行政當局，結果使國家中央保險公司蒙受損失達四百萬克朗之鉅；

五、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於一九四六年在阿羅木茨；

甲、被法庭傳作証人時曾作僞証；

乙、曾以狡猾手段勸誘別人作僞証；

因此；

一、全體被告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二款、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均犯有叛國罪，

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雅安·奧帕塞克、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奧特卡·斯維茨博士和安东尼·曼德爾博士等所犯罪行並適用同号法令第一條第三款

第五項之規定；

二、所有被告均犯有第五條第一款所規定之間諜罪行，

被告雅安·奧帕塞克、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奧特卡·斯維茨博士、安东尼·曼德爾博士和伐茨拉夫·姆特非等所犯罪行並適用於第五條第二款第三項之規定；

被告雅安·奧帕塞克和奧特卡·斯維茨博士並適用於同款第四項之規定；

被告雅安·奧帕塞克、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奧特卡·斯維茨博士和伐茨拉夫·姆特非還適用於第 231/48 号法令的第五項規定；

三、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雅羅里密克·庫拉契博士和雅安·波卡爾博士曾在特別危險的情況下，惡毒地進行公開的暴亂，觸犯了一八五二年^①刑法第八十七條之規定；

四、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奧特卡·斯維茨博士曾犯有117/1852号法令的第一九七、二〇〇、二〇三各條所規定之欺詐罪和共謀欺詐罪；

因此彼等應受如下之懲處：

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雅安·奧帕塞克、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奧特卡·斯維茨博士、安东尼·曼德爾博士應按第 231/48 号法令的第一條第三款之規定予以懲處，

被告伐茨拉夫·姆特非應按同号法令第五條第二款之規定予以懲處，

^① 年份疑有誤。——譯者

被告雅安·契加克博士、加羅斯拉夫·庫拉契博士和雅安·波卡爾博士应按同號法令第一條第一款之規定予以懲處，

對所有被告均適用第 117/1852 號法令第三十四條之規定；

對所有被告均適用第 231/48 號法令第四七、四八、五二各條之規定。

我建議：

一、將這一案件在布拉格國家法院進行公審，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第十一款與第二十條第一款之規定，該院有權審理這一案件；

二、在公審時所有証人和鑑定人均應出席作証，與本建議有關之各文件亦應全部提出。

檢察長 波谷米爾·塞格勒博士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布拉格

審訊經過

(对天主教高級教士中九名叛徒和間諜的公審，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布拉格國家法院正式開庭。國家法院的審判委員會由五人組成，其中包括：審判委員會主席雅羅斯拉夫·諾伐克博士、民選審判員雅安·柏蘭納茨基和雅密拉·諾孚特納二人、職業審判員加羅·柏得納博士和茨丹聶克·卡拉勃博士二人。列席公審的助理審判員有：民選審判員弗蘭梯歇克·多歇克和職業審判員斐迪南·勃列哈博士。代表檢察署參加公審的有：卡拉爾·契雪克博士和雅安·費西博士二人。法院書記員伐茨拉夫·卡馬辛博士和孚拉狄斯拉夫·勃林達博士二人。)

主席：我宣佈，根據關於保衛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法律，被控告為叛國犯及間諜犯的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及其同謀犯的公審，在布拉格國家法院正式開庭。我对全体被告都出庭表示滿意。下列人員已被指定為各被告的辯護人：約瑟夫·斯拉伊斯博士為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的辯護人；伊爾其·維雪克博士為雅安·奧帕塞克的辯護人；雅安·赫得利契卡博士為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的辯護人；弗蘭梯歇克·伏維爾博士為約瑟夫·契加克博士的辯護人；雅羅斯拉夫·托西博士為奧特卡·斯維茨博士的辯護人；伏拉其米爾·馬丁博士為雅羅斯拉夫·庫拉契博

士的辯護人；伏拉其米爾·切索夫斯基博士為安東尼·曼德爾博士的辯護人；約瑟夫·卜茨曼博士為雅安·波卡爾博士的辯護人；伐茨拉夫·辛尼克博士為伐茨拉夫·姆特非的辯護人。

（在各被告的材料和情況經審判委員會主席研究並認可後，檢察長卡拉爾·契雪克博士即宣讀起訴書。）

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受審經過

（休息後，主席開始訊問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

主席：起訴書控告，你不但違犯了關於保衛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法律，而且还違犯了刑法所規定的許多嚴重罪行。我必須向你指出，根據法律規定，認罪乃是減輕處分的一個重要條件。

一九四六年，你曾被阿羅木茨地方特別人民法庭傳訊過，是嗎？

雪拉：是的，我是為了與德國人勾結的事情而被傳訊的。

主席：你可否告訴我們，那是什麼樣的勾結呢？

雪拉：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與其他一些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捷克人一起被納粹秘密警察逮捕而當作人質。我先從阿羅木茨附近的席特班諾夫的轉運營，被押送到德國的達哨。兩星期後，大約是九月二十八日，我們又全部被轉押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但於同年十一月底，我就被釋放了。

主席：你知道，你是為什麼被釋放的嗎？

雪拉：他們什麼也沒有跟我說，只命令我去辦公室領取火車票。他們只告訴我，回阿羅木茨後，必須向納粹秘密警

察彙報。這點我照办了。

檢察長：被告，你可否告訴我們，自从被釋放後，經過多長時間你才被任命爲沙弗拉根主教？

雪拉：我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日被任命的。

檢察長：在那時，大主教是否已經知道你與納粹秘密警察相勾結呢？

雪拉：知道的……

主席：請繼續往下說。

雪拉：在回到阿羅木茨三天後，我就給納粹秘密警察作了報告。納粹秘密警察官員班克爾接見了我，告訴我必須每星期去一次，報告我的住处。後來他才告訴我，他是納粹秘密警察教會事務管理部的負責人，他很高興找到了一個經常和他保持聯繫的人。我告訴他，我得將這事報告大主教。後來，我確實將這事報告了大主教，並且還取得了大主教的同意。於是我繼續去見納粹秘密警察。當時已並不限於每星期一次，而是看需要了。有一次，當我給班克爾情報時，他向我索取一份有關“耶穌基督之子”教派的報告。關於這一問題，我曾向神學院教理教授契尼克打听过。

主席：你曾向他解釋過，你爲什麼搜集這種情報和給誰搜集的嗎？

雪拉：我告訴過他，這些情報は給班克爾搜集的。契尼克給我寫了個簡短的報告，我將它譯成德文，交給了班克爾委員。

主席：你爲什麼要把這報告譯成德文呢？

雪拉：班克爾不懂捷克文，所以……

主席：所以你就自動替他効勞？

雪拉：是的。

檢察長：你是否知道，納粹秘密警察研究宗教問題原是爲了便於迫害捷克人民嗎？你與納粹秘密警察相勾結，難道你不認識這是個罪惡機關嗎？

雪拉：這點我是知道的。

主席：你只給過班克爾一個報告嗎？

雪拉：我還給過他別的一些報告。在赫德立克被刺之後，班克爾曾向我了解過關於阿羅木茨大主教區中所有希臘正教教堂所在地的情報。我告訴他，除了阿羅木茨外，還有丘多平和席特班諾夫兩處。

主席：你的報告產生了什麼後果呢？

雪拉：我實際上參加了……反希臘正教教會的運動。許多希臘正教教士因此而被處了死刑，教會本身也被禁止和封閉了。

主席：除了我們剛才所談的以外，你還給過班克爾其他什麼報告呢？

雪拉：關於赫德立克被暗殺一事，班克爾準備在公報上發表一篇給信徒們的宣言，飭令信徒們安份守己，爲德意志帝國効忠。於是，我便與大主教共同擬了個短短的宣言草稿。經大主教同意後，我便將這份草稿交給了班克爾，他表示很滿意。

主席：允許我提一個問題。當時是否準備把宣言當作德國當局的官方文件呢？

雪拉：原來是準備當作一個呼籲維持和平的文件發表的，然後，還準備在講壇上予以宣讀。

主席：誰簽的名呢？誰向人民呼籲的呢？是納粹秘密警察，還是你和大主教呢？

雪拉：大主教。

主席：這裏我們還有關於你的活動的另一証據。你可否解釋一下關於本堂司鐸多西德拉的那件事？

雪拉：有一次，班克爾問我是否認識多西德拉本堂司鐸。接着他又問我多西德拉在什麼地方出生，在什麼地方被任命爲本堂司鐸，屬於那一個監牧區。我給了他這些材料，後來我才知道多西德拉本堂司鐸被逮捕了。

主席：你还和納粹秘密警察其他人員接觸過嗎？

雪拉：繼任班克爾工作的勃蘭池，是由班克爾介紹給我的。我和這位勃蘭池處得更爲友好了。

主席：請你告訴我們，你是怎樣在友好的氣氛中和他來往的呢？

雪拉：在我受命爲主教之後，我就不再去找納粹秘密警察了。班克爾或後來的勃蘭池都在必要時親自來我的辦公處。

主席：在這時，誰去見納粹秘密警察呢？

雪拉：當我離開阿羅木茨時，是大主教的秘書莫席節克博士去的。

主席：你告訴過我們，你與勃蘭池處得很好。我們如何才能体会到这一事实呢？

雪拉：我送他煙，有時送酒，還爲了還席請他吃過一次飯。

主席：一九四六年，由於與納粹秘密警察勾結，你曾被阿羅木茨特別人民法庭傳訊過。你可否告訴我們，爲什麼對你的訴訟後來停止進行了呢？

雪拉：在特別人民法庭受審以後，我請了維可波博士做我的法定代表人，並請他在其能力範圍之內，盡力爲我幫忙。維可波博士接受了我的請求。此後，我對這事就沒

再過問了。維可波曾在信中告訴過我說，他準備與案件中的証人德伏夏克博士和伐西查博士商談這事，並準備請求大主教答應在他自己的寓所中作証。

主席：不管是德伏夏克博士也好，伐西查博士也好，大主教普列江也好，當然都是維護你的囉，對嗎？

雪拉：是的，這是對的。維可波還通知過我，他準備請求天主教人民黨的國會議員列古卡博士設法替我在司法部方面活動。

檢察長：被告！你還記得你與波斯皮西爾娃的談話嗎？

雪拉：記得的。她帶給我一封波斯皮西爾博士從獄中給我的密碼信。這信告訴我，我將在特別人民法庭中受審，波斯皮西爾博士已經被審問過一次關於我的問題了，他還提到了在勃蘭池家中的那次聚會。

檢察長：波斯皮西爾說，你只去過勃蘭池家一次，是實話嗎？

雪拉：我共去過那裏兩次。那大約是一九四三年或一九四四年的聖誕節前後。

檢察長：你去那裏是爲了進行一次友誼性的談話呢，還是納粹秘密警察委員勃蘭池邀請你和波斯皮西爾博士偕夫人去作一次純社交性的聚會？

雪拉：是這樣的。

檢察長：爲了波斯皮西爾案件，你也曾被傳訊過吧？

雪拉：我只在法庭中被審問過這事。僅僅問起我是否認識波斯皮西爾博士、他是什麼樣的人、我在那裏認識他的。

檢察長：正是那些原來可以揭露波斯皮西爾是個納粹秘密警察官員的密友的重要的細節，你却沒有說出來。

雪拉：這點我沒有說。

檢察長：這就是說，你自己也作了偽証。你說是嗎？

雪拉：是的，我作了。

主席：你是否將这事報告了大主教普列江——你不是說過，他同意你與納粹秘密警察勾結嗎？他知道这事嗎？

雪拉：他知道的，還表示贊成。

主席：普列江大主教不但與納粹秘密警察，還與偽政府有些什麼關係？你不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嗎？

雪拉：大主教普列江與偽政府，特別與加哈、克列卿、白倫和赫伐可夫斯基相互問候、祝賀、通電，而這些都由我執筆擬稿的。

（至此，庭上宣讀一疊大主教給偽政府的信件作証。這些信件全部交給被告雪拉加以証實。）

主席：被告，你說在大主教普列江與所謂偽政府官員保持關係期間，你曾替他擬過許多信稿。

雪拉：是的。

主席：我想只引用一句你在納粹教士約瑟夫·韋伯死時，給他起草的吊唁中的最後一句話：“因此，我們表示，我們堅決相信，在上帝的見證下，作為民族與國家忠實僕人的他所貢獻出來的全部偉大的犧牲和他的英勇之死，均將永垂不朽”。

檢察長：被告，你要看看這信上的簽字縮寫嗎？這分明是你的簽字縮寫……。

雪拉：是的，是我的。

檢察長：這韋伯是個德籍教士，死在前綫的，是嗎？

雪拉：他死在東綫。

主席：信件內還有由你草擬的普列江大主教致魯道夫·白倫的道賀信。“閣下榮任首相要職，謹致以至誠之敬禮，並祝成功……”這是你起草的嗎？

雪拉：是的。

主席：還有一封同樣的信，是給所謂外交部長赫伐可夫斯基的，內容大致相同，也是祝賀他的任職。那也是你起草的吧？

雪拉：是我起草的。

主席：有一次你參加了由所謂部長莫拉維茨召集的主教會議，這是怎麼回事情？

雪拉：是大主教派我代表他去的。主要是爲了幫助德國居民逃避紅軍的事情。

檢察長：你知道一些德國難民在我們國家裏的所作所爲嗎？你有沒有聽說過，他們曾將我們的老百姓趕出自己的家園，而且當他們離開的時候，還得答應他們說，無論他們再到什麼地方，一切東西都仍然是屬於他們的？

雪拉：這我知道。

檢察長：然而你仍然研究着怎樣能使這些人更痛快地逗留在我國的辦法。是這樣的嗎？

雪拉：是的。

檢察長：我還得問問被告，是否你和大主教對納粹秘密警察的態度有些特殊？其他教區的情況如何？

雪拉：據我所知，在其他教區中，他們也同樣與納粹秘密警察保持聯繫。譬如：在布拉格總主教區和布爾諾……

檢察長：你知道最先與希特勒締結國際協定的是誰？

雪拉：梵蒂岡。

檢察長：被告，你可否告訴我們，梵蒂岡對慕尼黑會議以及對捷克斯洛伐克被佔領的態度如何？

雪拉：羅馬教皇駐布拉格的聖使被召回了，僞政府的教會事

務一概由柏林處理。

檢察長：這意思就是說，梵蒂岡完全公開地承認了捷克斯洛伐克被佔領的事實。

雪拉：是的。

檢察長：這裏我提出被告雪拉的筆記、一封波斯皮西爾博士從獄中發出的密碼信、一封列古卡議員的信和兩封維可波博士的信。我請求現在認辨這件文件，以証明造成停止對雪拉進行訴訟的訛詐真情。

主席（將筆記出示被告）：被告，這是你的筆記嗎？這些筆記的目的顯然是在於搞清楚，萬一你被傳喚到波斯皮西爾博士訴訟程序中作証時，你應該怎樣說法和說些甚麼。

雪拉：這些都是我的筆記，都是的。

主席：你為什麼要做這些筆記呢？這是準備作偽証用的，是嗎？

雪拉：是的。

主席：檢察長還提出一封波斯皮西爾博士給你的密碼信，他在信中告訴你：“神甫，六月六日”——這當然是一九四六年——“我在審判委員會中被訊問了有關你的問題。我供稱：你只於聖誕節在勃蘭池家中，爲了申請釋放格盧勃尼歇克博士、格羅加和茲拉馬爾博士的事，與他会談過一次。是他邀請你去看他的，他叫他的孩子們出來見你，他們還背誦了一些東西給你聽。隨後，我們就開始討論釋放這三人的事情。你是晚上八點鐘以後到達的，十時左右告辭。當勃蘭池去看你，爲了塞諾維斯的本堂司鐸的事情央求你幫忙，而你对這位納粹秘密警察的意圖斷然表示拒絕照辦的時候，我也在場。如果你

還希望我替你証明什麼事情，請書面或口頭告訴我的妻子。”

另一封是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維可波博士的來信。（主席在說明其內容後，開始宣讀）……“今天我又得替國家審判委員會整理一份檢察署的文件副本，這文件是要從會議事項裏面抽出來，而且必須立刻轉交給檢察長，因為若在現階段中將此事交給政治代表委員會辦理，就會使這事易於在公眾中間傳播開來，而這是極不恰當的。該文件已呈交檢察長，由於所交的只不過是文件的副本，所以不會把事情弄糟的。”

維可波博士的第二封信是同年九月十八日寫的。我認為毋須將全文讀出，而只引以下一段：“這案件在現時看來已經大不相同了。剩下來的証據將決定下一步的情況。勃蘭池的供詞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在讀着你的辯護狀一樣。”

爲了結束被告在佔領期間的活動情況的介紹，我將引用阿羅木茨特別人民法庭對斯坦尼斯拉夫·涅拉博士的訴訟案的檔案。（主席說明檔案的內容。）這裏首先是波斯皮西爾博士在阿羅木茨法庭審判委員會中的供詞。我摘引如下：“……一九四三年聖誕節前後，勃蘭池請吃飯，沙弗拉根主教雪拉和我的妻子均被邀請參加。雪拉於八點鐘前到達，十點鐘後離開。”其次，我將摘引李奧普·蘭格的供詞：“……我參加了宗教事務管理部領導人根萊特納和班克爾二人關於雪拉的討論會。根萊特納表示贊同，且稱：納粹秘密警察頭子對這些情報表示非常滿意。”最後還有海英里奇·高錫林的供詞，這裏我們僅注意到下面的嚴重情況：“班克爾告

訴过我，雪拉報道給他的不僅有關於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事情，還有關於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教會以及其他各教派的情況。阿羅木茨的納粹秘密警察本來不知道希臘正教各監牧區的所在地；因此，要不是雪拉博士供給了有關的必要情報，納粹秘密警察是無法執行其反希臘正教教會的全部行動的。”以上便是案卷的主要內容。

檢察長：被告，你能否告訴我，在你供給納粹秘密警察有關“耶穌基督”會、希臘正教教會以及其他情報時，你是否已經知道納粹秘密警察是一個罪惡組織，任何人只要落到它手裏，就有生命的危險呢？

雪拉：我知道的。（听衆中激起了一陣騷擾和憤怒。）

主席：請安靜。我們現在談談你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以後的活動。羅馬天主教教會上層神職人員對人民民主政權抱着什麼態度呢？

雪拉：一九四五年後，教會對我國一直是採取敵對態度的。這種態度，特別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後，變得更加露骨了。從我自己的活動和大主教普列江以及在主教會議上我所知道的其他主教們在這方面的活動中，我認識到了這一點。普列江大主教死後，我以教區會議代理人的資格直接參加了煽動活動。

主席：在這段時期內，還發生了關於“教士疾病救濟金”的詐騙陰謀案。你在这次陰謀中幹了些什麼？

雪拉：“教士疾病救濟金”的辦公處設於普勒羅夫，正式代表是卡普修士。大約在一九四七年底，經常參加“教士疾病救濟金”會議的樞機會議廳芬克修士來找我，告訴我尚在計劃中的勾當。

主席：這勾當是怎樣執行的呢？是爲了什麼目的呢？

雪拉：我們企圖阻止救濟金被接收而變成中央疾病保險公司的財產。雖然這件事情幾乎是違犯了尚在擬定中的新法令的，但當時芬克修士告訴我說，卡普修士曾向他們保證，“疾病基金”管理委員會和所有的主教們都同意這樣做。

主席：你知道這陰謀是準備怎樣實現的嗎？

雪拉：將錢財分散到各個教區中。

主席：爲的是什麼呢？

雪拉：以購置一所別墅爲名，計劃由各權力人將這筆錢分期付出，再代表“天主教教士聯合會”，用“聯合會”的戶名，將該款存入聯合儲備銀行中。以後準備用這筆錢在別契弗依的台普里斯郊區爲“聯合會”購置一所別墅。

主席：這別墅是屬於誰的呢？

雪拉：屬於“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

主席：換句話說，這是準備用“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錢來購置“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產業，這實際上是什麼呢？

雪拉：是欺詐。

主席：再談談你以後的活動。被告，你能否告訴我們，剛解放後，你在教區公署佈置了些什麼有關產業的事情呢？

雪拉：那是件有關條頓騎士修會產業的事情。修長沙斯基前來請求大主教普列江替他轉交一封請求保護教會財產的信給聖使館。當時，阿羅木茨樞機會議廳已經獲得消息，知道該項產業將被沒收；所以，我們就設法挽救。

檢察長：這個條頓騎士修會是個德國修會吧？

雪拉：是的。

檢察長：因此，它的全部財產都在沒收之列，是嗎？

雪拉：当然是在沒收之列。

主席：被告，你前次曾提及，你曾經替聖使館草擬过若干文件。你和聖使館中的那些人員相識呢？

雪拉：首先是教皇聖使里特，还有秘書福爾尼主教、伏羅林納主教、德·利華及遜西。

主席：現在談談你參與秘密散發關於開除教籍的勅令的這一問題。这些勅令怎樣会到你手中的呢？也就是怎樣会到阿羅木茨大主教官署來的呢？

雪拉：是通过聖使館秘密轉來的。大主教馬托卡又和多密尼克会会士達西克、大主教秘書利茲卡博士及普拉歇克等共同起草了一份註文。这道勅令和註文都發出了，其內容實際上就是將所有積極与共產党合作，參加人民民主共和國建設的人逐出教会。

主席：这道勅令和註文是怎樣傳遞的呢？

雪拉：是由“佈道部”的秘密信差散發的，他們將这些东西分散到阿羅木茨教區的各監牧區中。

檢察長：这道勅令對我們共和國是敌對的嗎？

雪拉：当然是的。

主席：阿羅木茨与布拉格之間也有秘密信差嗎？

雪拉：有的，那就是當時的聖·莫理斯的教士德孚夏克博士。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僥倖逃脫了逮捕。

主席：你与阿羅木茨的“佈道部”有勾結嗎？

雪拉：我得說……“佈道部”乃是現任大主教馬托卡在他上任後所創立的，就設在他的寓所內。

主席：“佈道部”有些什麼活動呢？

雪拉：都是擾亂治安的活動。但是“佈道部”並不直接隸屬於

我，而是受大主教領導的。

主席：你从利茲卡和莫席節克处接到的報告是怎麼回事？

雪拉：这些報告都是由大主教直接交給我的。有一次，莫席節克博士从大主教处帶來了三份非法傳單到樞机会議廳來。

主席：这些都是秘密傳單嗎？

雪拉：是的。

檢察長：你對於禁止神職人員从事政治活動和禁止他們參加教堂委員會的反映如何？

雪拉：唯大主教之命是听。

檢察長：你現在又如何看法呢？

雪拉：那当然是对公民自由权的一种限制囉……

檢察長：那末，你与納粹秘密警察的勾結又是什麼性質的活動呢？

雪拉：那是教会的政治活動。

檢察長：當時沒有人禁止嗎？

雪拉：沒有。

檢察長：大主教也贊同嗎？

雪拉：是，他知道的。

檢察長：但是，与人民民主國家，与人民合作是被禁止的吧？

雪拉：是的。

檢察長：你知道，在一九四八年後，你們總主教區中有許多神甫都進行过反政府的叛逆活動嗎？

雪拉：知道的。

檢察長：他們中間是否有人因此而被開除教籍，或因此而遭受被開除教籍的威脅呢？

雪拉：他們都已受到了國家法院的懲罰。

檢察長：可是，他們並沒有受到開除教籍的懲罰吧？

雪拉：沒有。

主席：你曾給過“佈道部”一些什麼樣的報告呢？

雪拉：我只給大主教報告，沒有給過“佈道部”。

主席：駐布拉格聖使館由秘密信使送給你一些指示。那都是關於什麼事情的呢？

雪拉：一九四八年六月，現任大主教馬托卡命令已故的阿羅木茨議會首領卡里克博士和在議會中佔第二把交椅的我一同去見他。他通知我，梵蒂岡有意叫阿羅木茨的總主教府議會放棄自由選舉主教的權利。大主教當時聲稱，他曾與伏羅林納主教談過這事。伏羅林納向他說明了羅馬教皇的意圖。

主席：為什麼梵蒂岡要總主教府議會放棄自由選舉主教的權利呢？

雪拉：大主教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理由。據我看來，梵蒂岡是想徹底解決一下這個問題，因為阿羅木茨的總主教府議會享受這特權已經有七百多年。如果議會放棄這一特權，那麼教皇就可以隨意任命大主教了。

主席：這意思就是：叫你們放棄這一基本權利，以便教皇能指定一個他認為合適的人來作你們的大主教。

雪拉：是的。

主席：你還接到過梵蒂岡的其他指示沒有？

雪拉：大約在十月底，大主教馬托卡告訴我，他將親自委任一批新的主教府諮議員。

主席：那是違法的，沒有事先取得政府的許可吧？

雪拉：就是這樣的。

主席：這批主教府諮議員就是：布瑞希、格盧勃尼歇克、德孚

夏克、錫克門德、伐西查、吉爾可、克里伐克和庫必歇克。
雪拉：是的，都对。

主席：你說馬托卡大主教還給過你一些關於某些貫徹主教會議決議的指示。這些指示都是關於一些什麼事情的呢？

雪拉：這些指示是關於神長的權力的。

主席：在沒有談權力問題之前，法庭方面還有什麼問題嗎？
檢察長和辯護人有問題沒有？

（被告辯護人對“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詳細情況提出了詢問。）

（休息後，主席開始就秘密授權制的問題訊問被告。）

主席：被告，你可否說明秘密授權書是怎樣發佈的？

雪拉：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大主教在一次彙報中告訴我說：將採取步驟，以便授予某些神長們以秘密的全權。他說，根據主教團的一項決議，為了使神長們能各自管理監牧區與代牧區起見，應該秘密地授予他們全權，實際上，這就等於行使一部分主教權。

主席：你贊成這種辦法嗎？

雪拉：我贊成的。後來秘書利茲卡又奉大主教之命，草擬了一個秘密授權的方案；並將這方案交給我，我補充和修改了一些細節。於是全權委任書便在今年初經大主教批准分發至各主教區了。

主席：你是否採取過進一步的措施以防你本人或大主教馬托卡萬一因反政府活動而被逮捕呢？

雪拉：大主教馬托卡根據梵蒂岡的指示，任命我為他的代理人，以防萬一他本人不能管理主教區。

主席：這又根據什麼呢？

雪拉：根據教皇特別委任的辦法。

主席：還根據……

雪拉：還根據授權的辦法。在六月五日以後，我從大主教馬托卡處接到此項特別的全權委任書。從此，我就秘密地背着政府而秘密受命管理阿羅木茨總主教區了。

主席：這是完全根據梵蒂岡的指示而作的麼？

雪拉：是的。

主席：如果我了解得不錯的話，你們的目的——其實不僅是你們的，也是整個教會的目的——在於利用全權，建立一個秘密地下教會，以便在教會的叛逆活動被破獲的情況下，能使這些反政府活動照舊繼續下去。

雪拉：就是這樣的。

主席：被告，在這種情況下，你是否就當了阿羅木茨的秘密大主教呢？

雪拉：是的。

主席：你知道這秘密全權的用意嗎？

雪拉：用意就是你所談到的。我接受了那委任書。

（於是審判委員會主席問檢察長或審判委員們是否還有問題詢問被告，檢察長將抄獲得來的秘密全權委任書交被告審閱。被告本人證實這些文件就是上面提到的秘密全權委任書。）

（在檢察長提交法庭的秘密全權委任書經審查並經被告本人證實後，主席說明：第一個秘密全權委任書委任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為秘密大主教。委任書上有大主教馬托卡的親筆簽名。與全權委任書封在一起的還有一封羅馬教廷國務大臣一九五〇年的第二四

三二號來信，委任書之後註有：“教皇機密，一九五〇年三月，梵蒂岡發”的附言。此項一九五〇年三月的“教皇機密”附件中列舉了許多有關特別全權的詳細指示，簽字人是多密尼古斯·塔狄尼。）

主席：這人是誰？

雪拉：塔狄尼是羅馬教廷國務部第一國務大臣。

主席：我們這裏還有另外一份關於在聖·息利爾和美以美神學院任教授的主教安東尼·塞蘭尼克博士的全權委任書。簽名是“約瑟夫·加羅魯斯”，也就是馬托卡大主教。原來的附文是由德·利華主教簽署的，附文後面有“教皇絕密”字樣和有關的訓令。委任書上載有一九五〇年三月梵蒂岡發出的國務部同樣的編號，附件的簽字人也是“多密尼古斯·塔狄尼”。這些被視為絕對秘密的全權委任書所以被發出的原因，是為了要使教會地下組織在當地的教會當局一旦被逮捕後，能藉此等文件之助而繼續進行其破壞與間諜活動。對嗎？

雪拉：這是對的。

主席：你承認你屬於這地下教會組織嗎？

雪拉：我承認。

檢察長：被告，你能否說明：為什麼在一個主教區之內，要指定那麼多的代理人呢？一個不就夠了嗎？

雪拉：這意思是，如果我被逮捕了，可以有第二個代理人來代替我的職位，如果他也被逮捕了，第三個人再來代替。

檢察長：這就是說，任命三個代理人，作為非法叛逆組織的三個候補領導人。

雪拉：是的。

檢察長：這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具有三個候補領導人的完整的地下組織。是嗎？

雪拉：是的，我們就是這麼打算的。

檢察長：我還得問一個問題。被告，我還想知道，爲什麼雪茨卡本堂司鐸被你從吉利可夫調到可斯特列克去了呢？

雪拉：他充當秘密信差，他懷疑他的行動已經受保安當局的監視了。

檢察長：我這裏還有一些文件提交法庭，以便被告對此表示意見。這些文件是從被告藏匿在教堂中的秘密地點搜出來的。

（主席宣讀從教堂內所搜出來的被告所藏匿的許多文件和筆記。被告証實了這些文件，解釋了文件的內容，且承認他知道“佈道部”的性質，乃是個地下間諜組織。）

主席：還有什麼問題要問被告嗎？

辯護人斯拉伊斯博士：你認識了你所進行的可耻活動沒有？現在你一切都已經考慮過了，你的意見如何？你對你的行爲悔恨嗎？

雪拉：直到我的案件被審查和我被訊問時爲止——在阿羅木茨和在布拉格——我才認識到我的全盤行動。當我還在當總主教區的副主教時，我全然沒有瞭解到這一層。現在我真正看清楚了，我深深地悔恨使我犯罪的一切反人民民主共和國的行爲。

檢察長：我建議傳訊前阿羅木茨律師阿露瓦·維可波博士作証。讓他証明：被告雪拉爲了企圖逃脫在佔領期間所作所爲的責任，而要弄的欺詐手段。

証人阿露瓦·維可波博士的供詞

（經過當庭商議後，法庭接受檢察長的建議，傳訊前阿羅木茨的律師阿露瓦·維可波博士出庭作証。）

主席：請証人維可波博士入席。

（証人入席。主席在依法予以警誡及其他例行的程序完畢後，開始審訊。）

主席：你認識被告雪拉有多久了？

維可波：我從一九三八年起就認識雪拉主教。解放後，我為一些法律事務去訪問普列江大主教時，又遇到了他。一九四六年夏，雪拉以叛國罪被控告而在阿羅木茨特別人民法庭受審時，曾請我作他的代表人。他將被捕的阿羅木茨納粹秘密警察分子關於他的供詞告訴了我。他和我逐項研究了各項供詞；納粹秘密警察分子在供詞中証實了雪拉和他們有密切的關係，並証實了他和他們教會事務管理部也有联系。

主席：雪拉博士在那時詳細談過什麼沒有？

維可波：他向我指出，他曾應某些納粹秘密警察分子的請求，供給過他們情報，特別是供給班克爾和勃蘭池。他說過，班克爾和勃蘭池常去他家訪問，尤其是勃蘭池對他表示極友好的態度。

主席：由此看來，你將如何說明他与納粹秘密警察的勾結呢？

維可波：我得承認，他們之間是有密切關係的，凡是班克爾或勃蘭池所需要知道的情報，雪拉都替他們搜集，並供給他們。

主席：那末，從你供詞中所以得出結論：被告雪拉實際上乃

是一個情報員。你知道雪拉曾作過有關神職人員的專門報告嗎？

維可波：雪拉告訴过我：當某一問題涉及教會時，特別是當考慮要將一項特殊任務交給某一神職人員，而不知道這人是否可靠時，納粹秘密警察的官員總先徵求他的意見。此外，雪拉博士又曾報道過有關個別神職人員對德國態度的情報。

陪審員：你所證的“可靠”是指什麼而言？

維可波：指對德國的忠誠。

主席：繼續說下去。

維可波：我和雪拉博士還共同審查了這些納粹秘密警察分子其他的供詞。他們供出，雪拉博士曾將普羅斯傑夫的某些宗教團體的情況報告給他們。

主席：總起來說，被告雪拉曾親自向你表示過，他與納粹秘密警察有勾結？

維可波：是的。

主席：此後，你就在特別人民法庭中包辦了整個案件？

維可波：是的。

主席：隨後，你有沒有用過任何其他方法來影響訴訟的進行呢？

維可波：我曾經用不正確的方式干涉過審訊。那就是在進行審訊時，我曾獲知有關檔案內容的情報，而這些檔案內容在那一階段對外還是秘密的。

主席：你還個別地去訪問過各位証人，請他們在作証時給雪拉說好話，是嗎？

維可波：是的。我曾與多西德拉本堂司鐸談過，我又曾在大主教還沒有被傳作証人時，與列古卡去拜訪過大主教。

主席：你是否將你所採取的這些步驟告訴過雪拉？

維可波：我照例用書信告訴他。

主席：對於証人維可波博士的証詞，被告雪拉有什麼解釋嗎？

雪拉：並無異議。這証詞是正確的。

主席：還有什麼問題要詢問証人嗎？証人可以退席了。

（主席審閱特別人民法庭第 L. S. 180/48 號關於李奧普·波斯皮西爾博士刑事案件的檔案內容，被告雪拉曾在該案中被傳作証。）

（主席又審閱被告當時的証詞內容。）

主席：被告，關於這件事，你的証詞是真實的嗎？

雪拉：那時，我並沒有供出全部我所應該說的。

主席：那就是說，你作了偽証……

雪拉：是的，作了偽証。

主席：你這樣做，只是爲了要使波斯皮西爾獲得釋放嗎？

雪拉：是的。

主席：我查出，最初對波斯皮西爾案件的審訊結果是宣告他無罪。只是在該案重審時——第二次審訊時——波斯皮西爾博士才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被判明犯有叛國、盜竊財產、戰時直接與某一外國勢力勾結和充當阿羅木茨納粹秘密警察情報員等罪行。此外，他還因爲身爲捷克斯洛伐克後備軍官，替德國保安機關進行間諜工作，而被判罪。

（主席又審查阿羅木茨特別人民法庭第 L. S. 168/1948 號關於柳德米拉·波斯皮西洛娃案件、第 L. S. 34/48 號關於李奧普·勃蘭池訴訟案件的檔案內容。）

主席：被告雪拉的訊問到此結束。我沒有別的問題了。你可

以坐下。

被告約瑟夫·契加克博士受審經過

主席：被告約瑟夫·契加克博士入席（被告入席）。

主席：你听了起訴書。認罪嗎？

契加克：我認罪。我已經完全認識到我的叛逆行爲了。

主席：在我們還沒有開始詳細審訊以前，請先將簡單情況談一下。

契加克：我執行過替白倫大主教傳遞間諜報告給駐布拉格羅馬教皇聖使館的任務。我知道，這工作的目的在於顛覆人民民主政權。

主席：你用什麼方式傳遞這些間諜報告呢？

契加克：大主教秘書帕恰在聖·維特斯天主堂的聖器室內將信件交給我。我總是親自將這些信件攜往聖·亞瑟拉修道院，交給一個偵班的修女。然後再由修女們將這些報告直接送到聖使館。

主席：爲什麼你單單上聖·亞瑟拉修道院去呢？

契加克：因爲這修道院就在聖使館對面。

主席：那末你爲什麼不肯自己去那裏呢？

契加克：我這樣做法，爲的是不暴露我的活動。

主席：那都是些什麼信件呢？

契加克：內容我不知道。

主席：爲什麼要這樣秘密地傳遞呢？大主教爲什麼不在郵局裏寄這些信件呢？

契加克：大主教白倫曾經告訴我，這都是些秘密報告，但是我並不知道它們的內容。

主席：誰派你作秘密信差的呢？你怎麼知道這些報告是屬於

間諜性質的呢？

契加克：我和大主教最後的一次談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那一次，除了一些旁的事情外，大主教告訴我，他需要我擔任與聖使館秘密聯絡的工作。他說，他所以找我，是因為他相信我能將這些報告安妥地送到。我曾向大主教保證過，我將滿足他每一個願望，盡力不負他的囑託。

主席：什麼原因促使你去進行破壞活動的呢？

契加克：我對人民民主政權抱着敵對態度。

主席：關於這方面，你是否可以告訴我們，你在佔領期間所抱的態度？

契加克：在佔領期間，我是“反布爾什維克聯盟”執行機構中的一個積極分子。在這項任務中，我曾提出要參加聯盟所舉行的座談會。我代表教會中的高級教士，布班聶茨的本堂司鐸維卡代表神職人員，茲孚里納隨營司鐸代表隨營司鐸們，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息克修士代表修士們參加座談會。

檢察長：被告，你能否告訴我們，佔領者對你所進行的反布爾什維克活動的評價如何？

契加克：佔領者方面對我所進行活動的讚賞，表現在他們授予我聖·萬塞斯拉斯金鷹勳章的事實上。

（檢察長將從被告家中繳獲的勳章交給被告看。）

檢察長：就是這勳章吧？

契加克：是的……我認識這獎章就是我所得的聖·萬塞斯拉斯金鷹勳章。

主席：你除了是那個聯盟的一分子外，在投降期間你還用其他方法表示過你對法西斯政權的擁護嗎？

契加克：梵蒂岡支持希特勒政权的事实，对我的態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爲了这一原因，我还在对僞政府的忠誠宣言上簽过名。

主席：但是，你自然沒有对人民民主政府表示过你的忠誠。再談談你在一九四五年後的活動情況吧。

契加克：我对人民民主政府的敌对，是与教会及各教会团体爲了維持它們在國內的特权地位而進行的鬥爭有關係的。而这一鬥爭，又是和各政党的反動部長們企圖將共產黨从政府中排斥出去的事实分不開的。後一陰謀是在選舉國民立憲大会前夕出現的。當時，在選舉以前，總主教議會的領袖約瑟夫·素克普博士曾召集了一次議會會議。所有當時議會的人員都參加了这一會議。會議上主要的事情就是確定宗教界应積極參加支持反動黨派的運動，並且關於這一點，他曾建議从教堂經費中提出十萬克朗來，專供人民黨做爲選舉運動的經費。這建議未經辯論便全体一致通過了。

主席：這是你一九四六年的活動情況。請繼續談你以後的活動。

契加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後，我对人民民主政权的敌对更加厲害了。这主要是因爲我身爲教会中的一個高級教士，感覺到人民民主政权对教会所有的經濟和財產顯然是有害無利的。

主席：實際上，這就是說，你所關心的只是教会的財產，是嗎？

契加克：（猶疑地）是的，我們關心的只是我們的經濟基礎。

主席：在你確知人民民主政权就是要消滅大宗私有財產以後，你依靠什麼來進行破壞活動呢？

契加克：我承認，根據梵蒂岡的一貫政策，教會的目標在於努力實現顛覆人民民主政權，以求在我們國內恢復資本主義統治。

主席：你在这項活動中担任什麼工作呢？

契加克：我指示与我接觸的神職人員進行破壞活動，唆使他們閱讀樞機會議廳發出的告教徒書和非法傳單，將其中的訓諭在人民羣衆中廣爲散佈，並煽動他們反對現有的政權。

主席：你知道告教徒書的內容嗎？

契加克：知道的。它們的內容是反對政府和人民民主政權。我還設法獲取過各種小冊子、傳單之類的東西，將它們作爲文件搜集起來，放在一隻鐵箱中，寄存在我管家的房間裏。有時，我還將修道院管理人塞柏博士或司儀神長尼科登帶到聖·維特斯修道院聖器室中來的傳單攜帶出來。

主席：你还从非教徒那裏獲得過傳單嗎？

契加克：在四月底，有一個名叫柏格羅娃的女職員來行懺悔禮。她告訴我，當局曾詢問過她關於她把非法傳單給她兄弟的事情。這時，我就要求這位女士把這樣的傳單給我帶一份來。兩星期後，在行第二次懺悔禮時，她果然帶來給我了。那是張反政府的傳單。

檢察長：神甫有在行懺悔禮時搜集非法傳單的責任嗎？

契加克：我承認我犯了罪……

主席：在你管家的屋裏所藏的鐵箱中，除了傳單之外還有別的文件嗎？

契加克：其中還有所謂特別授權書，這些授權書及附件都是由羅馬教廷送給駐布拉格教皇聖使館，再由聖使館轉

給白倫大主教的。

主席：是送到主教區，還是只送給大主教本人的？

契加克：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主教寫信給我，信內附上那特別授權書及其附件，並告訴我說，根據這特別授權書，他任命我為他的全權代理人，遇到發生他不能管理教區的情況時，我可以直接與教會及羅馬教廷保持聯繫。

主席：沒有其他目的了嗎？

契加克：根據所給的指示，應該用這種方法來指揮反人民民主政權的地下活動。

主席：這樣說來，根據這項秘密授權書，你已經被委任為布拉格的秘密大主教啦？

契加克：是的。在遇到大主教白倫博士被告發並被逮捕時，我就立刻擔任主教區的秘密管理人，並根據特別授權書上所附的指令，管理一切事項。

主席：授權書上有一句附言，你還記得嗎？

契加克：那是“教皇機密”，在極其嚴厲的教會懲罰威脅下，一切嚴守秘密。大主教還在信尾上添寫：“我希望你能接受我所交代給你的任務，如有上述情況發生時，你必須遵照授權書上的指示，負責領導主教區，起來反對人民民主政權。”大主教還在信上說：根據秘密授權書的指示，應當選出兩個神甫來，其中的第二個他秘密地指派了布拉格沙弗拉根主教馬托歇克博士。並叫我親自去通知他。

主席：你還幹了些什麼？

契加克：我把自己關在書齋裏面，不讓任何人來打擾，專心一致地用四開標準信紙將特別授權書及其附件抄寫下

來。同時，派了個神職人員帶信給修士馬托歇克博士，請他來看我一次，因為我急需和他談話。馬托歇克來時，我就把特別授權書和大主教的信一起給他看了。並將授權書借給他，讓他帶回去。他也照樣地抄錄了下來，然後將原件退還給我。我將它封在一個信封裏，歸還給了大主教。副本我却放在一個信封裏，藏在我所說的那隻鐵箱裏。

主席：關於這一事情還有什麼問題要問被告的麼？

檢察長：我還有個問題，不是關於這一事情，而是對於為被告所特有的另一件事。你曾從被告波卡爾博士那裏接到過一筆款子，是嗎？

契加克：是的，波卡爾曾交給我三萬五千克朗，並告訴我这筆款子是从布拉格的兄弟慈善修道院得來的，專替施主們作一千個彌撒費用的。

主席：這些錢你都幹什麼花了呢？

契加克：我將錢藏在秘密保險箱中。一九四九年，副主教又交給我五萬克朗，作為替施主們作一千個彌撒的費用，並告訴我这筆錢是从布拉格二區聖·伊格納特斯修道院得來的。他告訴我，他將親自來主持這些彌撒禮，有任何持有證件準備作彌撒的人，他就把錢送給他。

主席：但這筆款子中有一部分作了其他的用途，是嗎？

契加克：有一次，波卡爾要我從這筆彌撒專款中抽出四萬克朗來，因為他需要錢去購置一輛汽車。

主席：把用作彌撒的款子拿來買汽車，這是对的嗎？

契加克：當然……這是不对的……我也抱怨着哩！

主席：那末還有存摺的事呢？

契加克：是的，還有。我常親自到塞索維斯去作彌撒，那裏有

療養院和教堂。那裏有許多信徒送給我一些錢作慈善事業之用。我收下了這些錢……把它當作我自己的錢一樣，和其他的儲蓄金存在一起，用我自己的名字存入我的私人戶頭上。

主席：這錢既不是你的，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契加克：這錢本來是作慈善事業用的。但當我需要時，我就從中取出。

主席：這筆錢大約有多少呢？

契加克：直到最近，約有五萬克朗。

主席：其中有多少用作慈善事業了呢……

契加克：……大約五千克朗……

檢察長：被告，你採取這樣的手段，豈不是太惡劣了嗎？你的財產情況如何？

契加克：從一九三二年就任聖·維特斯修道院院長起，我就從總主教府議會產業中獲得大筆收入。平均每月約有一萬克朗。

檢察長：好，那就是說從一九三二年開始，單是你一個人每月就收入一萬克朗。

契加克：……後來在一九三六年，我就用這筆錢在斯勃拉夫區的辛特斯買了一所農場，附有牲口及各種設備，面積大約為六十尺度^①。

主席：價錢呢？

契加克：價錢，講整數，大約是十七萬克朗，後來因為我又添置了一些田地，又花了五萬克朗。

主席：那末一共有二十二萬克朗了。

① 一尺度(Measure)相當於〇·二公頃的面積。——譯者

契加克：是的。次年，在同一區的塞索維克我又花十九万五千克朗買了一所人家出售的住宅，所以一共是四十一万克朗。

主席：按战前的幣值折合起來，這是筆很可觀的財產啦。

契加克：但在战後一年內，主要由於我知道將要實行新土地改革了，所以就將這兩項產業都賣掉了。但還在息華里有一所別墅……而且我有些現款，此外，還有存在我戶头上的我从教堂得來的收入。

主席：你能大致說得出你全部財產的總值嗎？

契加克：对不起，這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主席：你記不得了嗎？

契加克：在我家發現的存款，包括已凍結的和未凍結的資金，總共約五十五万克朗。

主席：你对你的供詞還有什麼補充沒有？

契加克：我相信，我已將我的全部罪行招認出來了。就是我那對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敵視態度促使我犯罪的。我現在才完全明瞭，我是有罪的，我不應該這樣做，同時，我還認識到，我對人民也犯了罪。

檢察長：被告，這一切，你在犯罪之前就該認識到了的，那末你現在就不至於站在這裏啦。

（主席問審判員們、檢察長及辯護人是否還有問題準備詢問被告。沒有其他問題。）

（晚間，主席宣告休庭，次日再行續審。）

被告雅羅斯拉夫·庫拉契博士受審經過

主席：現在開始上次休庭後的審訊。被告雅羅斯拉夫·庫拉契入席。

(被告入席。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審訊。)

主席：你除了小学和八年中学之外，还經過入學考試進過一年布拉格大主教神學院和四年羅馬教皇大學，是嗎？你寓所裏的傢具大約值五十萬克朗，對嗎？這包括十間屋子裏的傢具，是嗎？此外，你還有三十萬克朗的現款。對嗎？

庫拉契：對的。

主席：被告，我有責任向你指出，認罪是減刑的最好辦法。如果你犯了罪，就該悔過認罪。你明白唸給你們聽的起訴書嗎？認罪嗎？

庫拉契：是的，我認罪。我承認我參加了反對國家的間諜及破壞活動。

主席：你怎樣參加間諜工作的？

庫拉契：我是從意大利駐布拉格公使館新聞參贊阿德·斯坦達多博士那裏接受間諜工作的。我與他的結識，是在一九四七年夏末由主教府諮議員斯維茨給我介紹的。兩星期後，斯坦達多到我寓所來訪問，談話中他告訴我，他對各種經濟和政治報告以及有關國家與教會間關係的發展情況都感興趣。我答應與他合作。斯坦達多告訴我，每兩星期有個專門信使，將意大利公使館所收集的情報資料送到羅馬。這資料是送呈與梵蒂岡有聯系的羅馬特務機關的。

檢察長：你履行你的諾言了嗎？

庫拉契：是的，履行了。從那時起，我就盡力替斯坦達多搜集各種情報。這些報告是我在不同的時期內交給他的。我曾從國家保安部隊人員雅安·皮特博克那裏獲得情

報。雅安·皮特博克是我在幼年時代認識的。皮特博克曾供給过我很多有關國家保安部隊的情報，諸如何時、何地、在何種情況下開始戒嚴以及各部建築物中所採取的保安措施的詳細情況等。因為他是個保安隊員，所以他对这些情况都非常熟悉。皮特博克还供給过我一些有關我們的工業原料和經濟要害等情報。我把用这种方法得來的情報都直接交給了斯坦達多。同時，我还供給他各種譏諷政府、共和國和共產黨的報告。我知道，这些報告都是被外國廣播電台作為宣傳材料用來攻擊我們國家的。

檢察長：有時你也收听这种廣播嗎？

庫拉契：我听过。

檢察長：他們說的是實話嗎？

庫拉契：不是的。

主席：从你自己的觀點和教廷的觀點出發，你对我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如何看法？

庫拉契：我的態度是否定的。

主席：原因何在？

庫拉契：主席先生，我已經決定老實招認了。在第一共和國期間，我曾設法抵制从苏联傳播到我國來的社會主義思想，並曾利用每個机会來譏諷苏联。我知道，社會主義的建設將使我們失去權利，失去在國內的勢力和我們已經享受了幾百年之久的各種特權。尤其是，我相信，我們將失去教會的財產和我們的財富。這是我們所絕對不能容許的。

主席：那末這就是你 and 整個教廷的態度啦！教會在我國的破壞活動是誰領導和主持的呢？

庫拉契：我們的活動是由教皇聖使館指導的。該館在專為此種目的而召集的主教會議上，指示各主教對人民民主共和國作進一步的鬥爭。而聖使館則是受梵蒂岡指示的。

主席：你以間諜和破壞活動來反對人民民主政權，那末在佔領期間，你對我國人民為自由而鬥爭的態度怎樣呢？

庫拉契：我承認，那時我奉行的是納粹思想。

主席：你與納粹秘密警察勾結的情況如何？

庫拉契：我承認，我曾參加過迫害神職人員的工作，並執行了納粹秘密警察教會事務管理部負責人奧帕豪塞的指示。

主席：你經常和他接觸嗎？

庫拉契：根據我的筆記，我一共訪過他七十二次。

主席：你把我們的神職人員情況都報告給他了吧？

庫拉契：報告了，主席先生。在這一方面，我承認我的罪惡還在於鼓勵別人在報紙上撰寫擁護納粹主義的文章。那時，我是捷克斯洛伐克聯合印刷股份公司董事會的副董事長。在任職期間，我曾請求“人民報”編輯席諾斯特和該報新聞記者雪蘭卡以及阿諾斯脫維斯的本堂司鐸斐迪南·庫拉撰寫擁護納粹政權的文章。

主席：他們對你的建議反應如何？

庫拉契：他們接受了，並寫了好幾篇文章。特別是庫拉寫得最多，後來，他還為這件事被判處了五年徒刑。

主席：是的。編輯席諾斯特也因親納粹的叛逆活動，而被布拉格國家法院判處了徒刑。

檢察長：被告，當你與奧帕豪塞勾結，當你與納粹匪徒勾結的時候，你知道許多下層神職人員被納粹秘密警察逮

捕的事情嗎？

庫拉契：我知道。

檢察長：你知道，他們在集中營裏遭受酷刑並且死在裏面的事情嗎？

庫拉契：是的，我知道這一點。

檢察長：既然這樣，你却還和納粹秘密警察勾結？

庫拉契：（小聲地）是的。（听衆中引起了一陣騷動。）

主席：請安靜。現在請談一下你在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活動。

庫拉契：一九四五年的革命以後，我們的活動目標在於反對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我們純粹是打算保持我們的權勢。因此，我們和二月事件前的天主教人民黨反動代表協力合作，並盡一切力量支持他們。

主席：你是怎樣活動的？我的意思是指你所進行對抗的方法。

庫拉契：我們曾採用過各種方法。我們利用每一個機會唆使信徒們反對人民民主制度。我承認，甚至於講壇也利用來為這一目的服務。我們要為國內的經濟、政治大變革創造條件。起初，我們指望一九四六年的大選。教會根據梵蒂岡的命令和指示，企圖操縱並影響這次大選。因此，聖·維特斯議會曾捐獻給天主教人民黨十萬克朗作為該黨的選舉活動費。

檢察長：被告，十萬克朗是筆很大的款子。這筆款子是从哪裏得來的？

庫拉契：這筆款子是从教區議會財產的利息中支出的。

檢察長：教區議會的財產有多少？

庫拉契：大約有六千公頃耕地和一千多公頃的林產。

檢察長：享受這些財產的有多少人？

庫拉契：只有議會的十二個議員。

主席：一九四六年，用這種方法支持天主教人民黨反動代表的只有聖·維特斯議會一個組織嗎？

庫拉契：據我所知，整個教會都在經濟上支持過這個黨派，而且數目也相當可觀。

主席：根據一九四六年選舉的結果，我們知道，這種支持並沒有起什麼作用，但是後來你們怎麼辦呢？

庫拉契：這次雖然失敗了，但是我們並沒有灰心，而要繼續對抗。

主席：用什麼方式呢？

庫拉契：我們散佈謠言說，馬上就要變天了。因此，我們在各種佈道的場合中誣譏和譏謗人民民主政權。主要的佈道者都是“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聯絡網中的人員，其中包括：主教府諮議員斯維茨博士、息維斯特·勃雷托教士和亞多夫·卡依帕教士。為了配合“天主教行動會”的行動，我自己也竭力影響我所接觸到的人。我們的反對是在宗教的掩飾下進行的。我們用全力支持反動黨派的鬥爭，並給以援助。

主席：誰領導教會的破壞活動呢？

庫拉契：這個活動的領導人是白倫大主教以及其他高級教士；而幕後乃是教皇聖使館和梵蒂岡。

主席：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以後，教會的活動如何？退出鬥爭了嗎？

庫拉契：沒有退出；正好相反。

主席：那末，你們是如何活動的呢？解釋這一點。

庫拉契：白倫大主教及其他高級教士首先發佈秘密傳單。這些傳單還被分送到所有的監牧區去，作為神職人員如

何進行活動的指示。

主席：你能把你所收到的秘密傳單的內容總結一下嗎？

庫拉契：這些傳單的內容確實是千篇一律的。它們一成不變地指責人民民主制度和政府。

主席：教會在其煽動活動中還施用了別的手段嗎？

庫拉契：二月事件後，“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死灰復燃。白倫大主教任命斯維茨博士為該會的領導人，隨營司鐸曼德爾為該會的秘書。該會活動的目的在於爭取信徒聽從教會政策。此外，還有聖餐會煽動信徒，特別是煽動青年反對人民民主。我們的意圖是希望這些信徒們再去影響更廣大的羣眾。為着支持這種目的，我自己也曾使用過各種破壞手段，並曾利用過外國所廣播的各種誣譏謠言。

檢察長：通過這些活動，你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庫拉契：我的目的是要推翻人民民主制度。

檢察長：你以為你們有足夠的力量來推翻人民民主制度嗎？

庫拉契：不，我們沒有。我們還得仰仗國外的援助。

檢察長：那就是說，你們指望戰爭嗎？

庫拉契：是的。

檢察長：叫西方的帝國主義來反對我國的人民嗎？

庫拉契：是的。

檢察長：你贊成嗎？

庫拉契：檢察長先生，我確實是盼望戰爭的。

主席：你曾經提到許多與你發生聯繫的人。那末，把雅安·皮特博克的詳細情況再談一下吧。

庫拉契：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以後，從國家的立場看來，雅安·皮特博克是不可靠的，因此被撤職了。我記得，他

爲了想當國會議員，曾費了很大的力。當他在天主教人民黨中工作時，他曾與議員本查博士和班達相勾結。他曾私下對我說過，當他在布列諾夫監牧區時，曾經偽造過證件。他曾叫我去看過他所偽造的證件。他把這些偽造的證件供給偷越國境的人們，並且秘密地對我說過，這些人之中首先就是本查和班達，此外還有議員休多巴，也許還有議員都卡切克。但是這些人的情況我都不太清楚。

主席：現在談一下你進一步的活動。馬托歇克的被秘密任命爲主教是怎麼回事？

庫拉契：我知道這件事，因爲我本人曾參與此事。教會中都知道馬托歇克之與人民民主制度爲敵，忠實於梵蒂岡的。因此，一九四九年九月，教皇聖使就迅速地秘密任命他爲主教。我記得，當教皇聖使的代表伏羅林納離開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曾問我是否認識馬托歇克，此人是否可靠。我回答說，我認識馬托歇克，他現在是、而且將來還會是忠實於梵蒂岡的。

檢察長：我們怎樣來了解這句話呢？它是說，可以委託他去進行任何可能危害共和國的破壞活動嗎？

庫拉契：是的，我的意思就是這樣的。

主席：你和羅馬有什麼關係？

庫拉契：除了與斯坦達多保持聯繫外，我還經常與羅馬的捷克斯洛伐克神學院院長班斯狄塞克博士通信。由於斯坦達多的幫助，我給他寄過六封信，這些信件都是由斯坦達多托外交信使給他轉去的。這些信的內容都是破壞性的，其中包括有關我國政治和宗教情況的歪曲事實的報告。此外，我還用走私方法給班斯狄塞克帶去二

十五万克朗。

主席：怎樣走私的？爲什麼要走私呢？

庫拉契：因爲我害怕可能被逮捕，所以我想非法地離開共和國。這筆款子是通过我一個熟人走私的，他是個水果商，名叫伏蒂克。

主席：這就是你一旦非法潛逃國外後的一種經濟依靠吧！其餘的財產又怎麼辦呢？這裏還保存了些什麼東西？

庫拉契：我還有五萬克朗的現款，存在神學生雷納那裏，一萬五千克朗和一段法衣料子存在神學生勃拉文克那裏，一些金德克^①和我財產中的四十張珍貴的名畫存在聖·維特斯的聖器室裏。

主席：我就此結束被告的訊問。法庭方面還有什麼問題嗎？檢察長還有要問的話嗎？

檢察長：被告，你的活動是：充當情報員和納粹秘密警察的特務、散發非法傳單、勾通破壞分子和間諜、藏匿財產、走私貨幣。根據以上事實，你是一貫仇視人民民主制度，仇視勞動人民的。

庫拉契：（默然）。

檢察長：爲了你自己的財產和安逸，爲了教會的財產，你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在反對共和國與共和國的人民。對嗎？

庫拉契：不幸得很——這是對的。

主席：還有別的問題嗎？辯護人有話要問被告嗎？

辯護人卜茨曼博士（被告波卡爾的辯護人）：被告庫拉契，波

^① 德克（Ducat）是意大利威尼斯金幣。——譯者

卡爾是由你送到納粹秘密警察機關裏去的。你能談一談事情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嗎？

主席：這件事將在訊問被告波卡爾時再談；因為這事也與被告庫拉契有牽連，所以，到那時他也可以表示意見。

沒有別的問題了。我宣佈休庭。

被告雅安·波卡爾博士受審經過

主席：現在我們將繼續審訊。被告雅安·波卡爾博士入席。

（主席在依法予以警誡及其他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審訊。）

主席：你承認檢察長所控告你的罪行嗎？

波卡爾：我完全承認。

主席：你的罪惡活動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

波卡爾：是在納粹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初期開始的。我們都知道梵蒂岡積極擁護納粹和法西斯政權的態度，所以我們都簽名宣誓效忠於希特勒，並竭力完成偽政府的一切指令。我坦白地承認，我本人在佔領期間就是納粹秘密警察的一個同謀者。

主席：這是怎麼發生的呢？

波卡爾：大約是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在樞機會議廳中認識了納粹秘密警察教會管理部的負責人奧帕豪塞。隨後，奧帕豪塞通過庫拉契博士作媒介，叫我去匹塞克大廈拜訪他。庫拉契是樞機會議廳和納粹秘密警察之間的聯絡員。當我到達那裏時，奧帕豪塞問了我許多問題，諸如偽政府統治下的人民對偽政府的命令所抱的態度如何，或偽政府統治下的人民是否滿意等等。他還問了我一些教會人士的情況，同時我又告訴了他一些關於

修道院的情況。

主席：你與奧帕豪塞接觸有多久？

波卡爾：直到一九四四年秋天，主席先生。

主席：你總是主動地供給他情報的吧？

波卡爾：不是的，大部分是他叫我供給的。有時，我也主動地報道他一些消息。

主席：你曾向納粹秘密警察提出過一些建議吧。這事你還記得嗎？

波卡爾：我還記得的。我曾向奧帕豪塞建議過，如果德國要頒佈一些特別法令的話，那末應當首先通過教廷。這樣做，不但可以使頒佈的法令在人民中間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且對德國也是有利的。

主席：你協助他做納粹秘密警察的工作，指示他納粹秘密警察怎樣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你跟納粹秘密警察的合作得到甚麼報酬呢？

波卡爾：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我被任命為布拉格聖·斯蒂芬監牧區的管理人。

主席：那就是說，這個監牧區是布拉格市最富裕的監牧區囉。除了你和你們議會或大主教而外，還有誰和納粹秘密警察有聯繫呢？

波卡爾：和我同樣與納粹秘密警察往來的有當時的主教府秘書庫拉契博士，教區會議代理人奧帕特尼博士也曾被召去過幾次。後來，還有馬梯斯騎士修會修長，德籍神甫弗蘭茲·波勃。因為波勃曾被任命為樞機會議廳的顧問，所以我也經常與他接觸。因此，他也常參加在我辦公室裏所舉行的樞機會議廳會議。

檢察長：波勃博士在擔任樞機會議廳顧問的同時，還充當納

粹秘密警察的情報員。这事确实嗎？

波卡爾：确实的。他被任命樞机会議廳的顧問，以便他可以知道樞机会議廳所討論的一切問題。

檢察長：所以，你爲了討好於納粹秘密警察，給予他們更多的幫助，就在樞机会議廳裏聘用了一個便衣情報員。

波卡爾：納粹秘密警察叫我這樣办的。

檢察長：你也樂得討好。

波卡爾：是的。

檢察長：我建議当庭宣讀波勃一案的刑事案卷，以便把他与納粹秘密警察勾結的性質弄清楚。

（沒有休庭而經過商討後，主席摘引案卷中的幾段，逐字宣讀如下：）

“从一九四三年起，我就在修会中替梵蒂岡情報機關工作。另外一個供給教皇情報的人，是主教府諮議員斯維茨，他通过駐布拉格的教皇聖使館傳遞情報。一九四三年，当我寄居羅馬時，時常与許多梵蒂岡顯要的代表人物談話，諸如梵蒂岡國務部特种事務處首長孟丁尼主教、修会部主任兼梵蒂岡中歐情報機關負責人紅衣大主教拉·甫馬、耶穌會會員來帕以及其他許多人。這些人都極公開地宣稱，梵蒂岡希望在德國管轄下的各國神職人員都自動走上支持納粹的道路。同時，梵蒂岡也採取其他办法給予在德國管轄區內的神職人員以同樣性質的指示。”

檢察長：被告，你對於這文件作何解釋？梵蒂岡曾給你明確的指示，叫你去勾結納粹嗎？

波卡爾：是的，我以前也曾說過，我們都知道梵蒂岡積極擁護法西斯政權的態度。這是正確的。

主席：被告，弗蘭茲·波勃關於你曾這樣供稱：“前紅衣大主教卡斯巴爾的私人秘書，即現在的樞机会議廳秘書波卡爾也曾被奧帕豪塞召來進行合作。波卡爾曾多次供給奧帕豪塞秘密報告，奧帕豪塞將報告拍成照像後，再退還給波卡爾。當然，我並不知道奧帕豪塞用什麼方式召見波卡爾的。奧帕豪塞自己稱，他曾答應很快地給波卡爾找一個顯貴的職位，答應讓他做聖·維特斯主教府諮議員；而且波卡爾對這件事也完全同意。”

檢察長：被告波卡爾，他曾經答應過你做主教府諮議員嗎？
波卡爾：他曾提過這件事。

主席：弗蘭茲·波勃的供詞中又說：“奧帕豪塞以對待我的方式對待羅馬教廷中的高級人員。他主要勾結布拉格總主教區主教府秘書，即主教府諮議員庫拉契。庫拉契是捷克人，是納粹秘密警察的心腹。庫拉契與奧帕豪塞結交的方式與我的相同。庫拉契經常一星期訪奧帕豪塞一次，甚或至於好幾次，事實上，他是納粹秘密警察與總主教區樞机会議廳間的聯絡員。”所以，關於庫拉契博士，波勃實際上說了同樣的話。

波卡爾：跟我所說的一樣。

主席：波勃又供稱：他必須根據奧帕豪塞的指示探听什麼事情，向奧帕豪塞報告他所要詳細瞭解的情報，或在必要時替他搜集情報。他还供稱：“奧帕豪塞談到庫拉契時說道，庫拉契想當布拉格大主教，又說，庫拉契當大主教對他很合適。”現在，我們來訊問波卡爾博士的其他活動。起訴書控告你犯有間諜罪行。你把這一方面的活動談一下。

波卡爾：從一九三七年，在我當紅衣大主教卡斯巴爾的秘

書時，我就開始給梵蒂岡作間諜報告。我常常把我的報告交給當時梵蒂岡駐布拉格的代表。一九四六年以後，白倫博士被任命爲大主教時，我一方面給他送報告，一方面給教皇聖使送報告。

主席：都是些什麼報告呢？

波卡爾：絕大部分是政治報告。

主席：就你替梵蒂岡間諜機關和白倫博士所搜集的報告，舉出個實例來。

波卡爾：一九四七年，我從教育部參事那裏獲得有關弗蘭茲·波勃活動的全部刑事案卷。我將這份案卷送給白倫博士和教皇聖使看了之後，又將它送了回去。此外，還有一份關於軍事方面的重要報告，其中包括有關內務部和國防部某些機密措施的情報，我將這報告交給梵蒂岡間諜機關，轉給德·利華主教。

主席：你與梵蒂岡教皇聖使的關係，僅限於供給他間諜報告嗎？

波卡爾：就是這樣的。我不是向教皇聖使呈遞我自己的間諜報告，就是替白倫大主教傳遞包括這種報告的密封信件。

主席：你能把供給你情報的人名告訴我們嗎？

波卡爾：供給我情報的人有天主教人民黨的總書記克利米博士、前部長斯拉米克的秘書皮查契克、愛莫斯修道院院長伏西赫、雅羅里密克院長、奧帕塞克院長、斯維茨主教、主教府秘書多納和庫拉契。

主席：關於你替梵蒂岡或白倫大主教進行間諜活動方面，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波卡爾：我已經說過，早在一九三七年，我就知道作這種間

諜工作是爲梵蒂岡的利益服務的。就是这种思想促使我繼續進行这种活動的。

主席：梵蒂岡比你的祖國和你祖國的人民還要親密些嗎？

波卡爾：今天我後悔了。但這是事實。

檢察長：你知道，你的報告怎樣被梵蒂岡利用的嗎？

波卡爾：梵蒂岡利用這些情報在廣播中散佈荒謬絕倫的謠言。我還得考慮到，我這些包含有國家機密的報告是要被轉送到敵人間諜機關裏去的。

檢察長：你知道，我們共和國的敵人根據這些報告幹什麼嗎？你知道，他們派遣企圖破壞我國建設的破壞分子到我們國內來嗎？你知道這些嗎？

波卡爾：（輕聲地）我知道。

檢察長：我向法庭建議，把被告收聽梵蒂岡廣播時親手做的筆記拿出來讓大家看看。這是第六十二號証件。我還建議，把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梵蒂岡無線電台的廣播報告宣讀出來。

主席：我來認証波卡爾親手所寫的、關於故意的外國廣播筆記的第六十二號証件。我請被告本人看一下。我們現在有一份打字的副本。你說這是否正確無誤？的確是你的筆記嗎？

波卡爾：是的，主席先生，這是我的筆記。

主席：你現在可以審閱一下副本，看是否與你的筆記相符合。

波卡爾：（停了片刻）是的，這副本與我所寫的筆記相符。

主席：我們這裏還有一疊捷克文的梵蒂岡廣播報告。從這些廣播報告中，我可以知道你供給梵蒂岡一些什麼資料。這些廣播報告都是些誣毀性的謠言和荒謬的言詞。現

在，我把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的有關捷克斯洛伐克的梵蒂岡廣播報告摘引下來，作為一個例子：“年齡才過十歲的孩子們就想殺盡所有的神甫，因為暫時他們還危害不了教士，所以就受人指使向神甫臉上吐唾沫。”
有人在你臉上吐過唾沫嗎？

波卡爾：沒有碰見過。

主席：國內有沒有人，和梵蒂岡所叫囂的那樣，由於是個神職人員而受到迫害嗎？

波卡爾：完全沒有，主席先生。

主席：那末，這都是些什麼廣播報告呢？

波卡爾：這些都是謊話，不幸我也幫着說了。

主席：你知道還有誰與梵蒂岡間諜機關，也就是與教皇聖使館有聯繫呢？

波卡爾：我確知有白倫博士和斯維茨博士。還有各修會和各聖部代表，都按期供給教皇聖使館間諜報告。我曾經好幾次在聖使館裏親眼看到這些教會高級人士與聖使代表們聚會密談。

主席：除了間諜活動之外，還有破壞活動。把你在這方面的活動談一下。

波卡爾：我必須承認，教會利用一切機會，企圖在信徒中散佈對人民民主制度的懷疑。

主席：教會方面採取這種態度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波卡爾：我不能否認，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們替自己的權勢、自己的經濟地位和財產擔心。

主席：白倫大主教都和那些政客們來往？

波卡爾：據我所知，他的主要顧問是帕爾·真克爾。白倫博士經常和他商談。此外，白倫大主教還與以下各位部

長有勾結：斯特蘭斯基、加拉、普羅恰斯卡和斯拉米克。我身為他的秘書，知道白倫大主教與他們共同陰謀反對人民民主制度，而且还利用反對人民民主制度的工具“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白倫大主教任命斯維茨博士為“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領導人，又委任曼德爾博士為他的助手。

主席：你知道，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前，白倫大主教與反革命分子有什麼關係嗎？

波卡爾：據我所知，白倫大主教拉這些關係的主要原因，在於使他們的政策能與前國社黨的部長們、天主教人民黨和斯洛伐克民主黨的各部長們的目標取得一致。白倫大主教還利用了這些關係居間說項。我還記得一個具體的例子，當叛徒狄索受審時，白倫大主教曾拜訪過這些部長，並請求他們，要是狄索博士被叛處死刑，那末是否可以繳些罰金，改為徒刑。

檢察長：主席先生，請讓我提一個問題。被告，你說：“狄索是叛徒”，那末你自己又是什麼呢？

波卡爾：現在我自己已經明白了。

檢察長：謝謝你，主席先生。我滿意了。

主席：你知道，二月事件前不久，帕爾·真克爾拜訪過白倫大主教的事情嗎？

波卡爾：是的，我還記得，大約在二月事件的前兩天，白倫大主教叫我替他請真克爾到他的大主教公館來。真克爾到達之後，與大主教單獨晤談了有二十分鐘之久。事後，白倫大主教告訴我說，他與真克爾所討論的是有關保存教會學校和如何使教會財產免於被分配的問題。白倫大主教從真克爾那裏獲知，各反動部長們準備辭

職，正如大主教白倫告訴我的，這件事將被總統貝奈斯博士利用作為組織文官內閣的機會。

主席：你本人、白倫大主教和教會對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的態度如何呢？

波卡爾：主席先生，我不贊同二月事件，正如教會不贊同一樣，因為我們的希望與所發生的事實恰巧相反。我們曾希望國內政治經濟情況有所轉變。我承認，作為教會參與合作的結果，也作為白倫大主教與真克爾部長以及其他部長們所討論的結果，我們曾希望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但當這些都沒有實現時，我們全然失望了。

檢察長：我建議，國家法院公佈主教會議的會議記錄，也就是第十八號証件，以證明教會用上述方式與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情況。

主席：根據檢察長的建議，現在將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在布拉格大主教公館召開的、由大主教白倫擔任主席的並有捷克斯洛伐克各主教和高級教士參與的特別宗教大會的會議記錄摘引如下：“一年半以前，擁護羅馬教廷的各報編輯部均已应邀發表了關於教會財產的意義和使命的文章。然而，構成一次新的土地改革的‘土地改革修正法案’終於付諸實行，大批的教會林產和農田正式被沒收了。這一切都是未與羅馬教廷或羅馬聖使商討而實行的，因而是非法的。有關產業的使用人均已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抗議，並向該政府所轄法院提起訴訟。主教會議因教皇陛下聖使曾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及其法院提出照會一事，而表示感謝。主教會議還表示感謝的是，沒收產業的決議無論怎樣都不會被承認的，因為任何有關教會產業的轉讓，悉聽命於教皇。”

可見得，你雖然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但是你並不承認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

波卡爾：正如你所說的，主席先生。

主席：我們還得從這些會議記錄來看：“尼綏主教建議向人民呼籲；然而主教會議不能採納這一建議，因為人民已經被引導至另一個方向去了，甚至連天主教徒也胆敢要求教會的財產。”從這些記錄中再看：“根據技術部長哥帕基所供給的情報，已經可以預料到政府將製定一個關於教會財產的具體規定。因此，會議決定，沒有獲得教皇的贊同和決定，不管用什麼方式進行的，也不管取得多少代價，絕對不能容許轉移任何教會財產或接受這種轉移。”這就是說，你同意並贊成教皇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內政。最後，記錄的結論中還說：“主席報告了關於對沒收教會財產一事提出制裁的建議。我要求向布拉格宣佈一項禁令，將國會議員們逐出教會。讓我們用犧牲精神來教導人民，以備萬一受到審判。”這就是文件的主要內容。尤其，這是你決心不承認共和國法律的証據。

檢察長：這也是教會對反動派暴動企圖的一種支持。

波卡爾：我承認，有這樣的意圖。

主席：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後，教會又怎樣實行反對我們的政策呢？

波卡爾：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後，教會在政府中再也沒有靠山了，於是開始印發各種煽動性的小冊子、備忘錄和傳單。我曾同意過這種行動，就如同我同意教皇聖使的一切事務一樣。我曾親自抄錄過各種告教徒書和傳單。我常常將草稿和副本一同呈交白倫大主教審查。

主席：你個人是否也參加了白倫大主教印發非法印刷品的行動？

波卡爾：我參加了散發工作。這種印刷品用來在人民中散佈不安情緒，破壞他們的團結，從而助長了竭力改變國內的政治、經濟局面的企圖。這些煽動性的印刷品是散發到各監牧區去的。這項工作是曼德爾博士領導的。後來，斯維茨博士買了兩輛機器腳踏車，指定了兩個樞機會議廳僱員，專門到各代牧區去散發這些非法印刷品。印刷品都不用郵差遞送，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進行的是破壞活動。

主席：你知道你獨自幹的或者你與之勾結的別的教會人員的活動的後果嗎？

波卡爾：從一九四九年六月起，我才完全瞭解，我進行了破壞活動。我明知這一點，但我仍然進行着這種活動。

主席：你們用什麼方法來達到你們在國內實現政治、經濟大變革的目的呢？

波卡爾：我承認，我們指望佔領軍的支援……

檢察長：這樣，戰爭就可以替你們奪回財產啦？

波卡爾：（沉默）。

檢察長：還有個問題。一九四九年教廷與政府進行談判以後，教廷又企圖使談判決裂，這到底是偶然的事呢，還是故意的？

波卡爾：有一個特別的目的，一個比僅限於在捷克斯洛伐克範圍內的一種孤立的活動更要廣泛的目的。

檢察長：被告，你是教會代表團的一員。現在，問題已經很明顯了，這代表團與政府商談協定，只不過是一種掩飾而已。我想，你們方面所選擇的與政府談判決裂的時機，

也决非偶然的吧。

波卡爾：在代表团中，我並非具有决定性的一員。但我承認，
這曾是一個彼此互相配合的運動的一部分。

檢察長：主席先生，關於這一點，我沒有問題了。

主席：繼續談你以後的活動。

波卡爾：一九四八年，當我還在羅馬時，巴西會的一個神甫
到尼旁姆恩來拜訪我，請我帶兩封未封口的信件給布
拉格的帕衛爾·古茨科本堂司鐸。

主席：你又如何處理這兩封信呢？

波卡爾：我將這兩封信交給了古茨科本堂司鐸。

檢察長：古茨科是班達黨的領導人物，你知道嗎？

波卡爾：我後來才知道古茨科是個班達黨徒，並為此而被判
罪了。

主席：繼續談下去。

波卡爾：我還承認，我知道一個非法小組的存在和他們所舉
行的會議，其中有一個組員就是美國“反間諜情報機
關”的特務米蘭·卓克。我與利布什·什塔斯娜有過往
來，並在她寓所中舉行過會議。從一九四五年開始，我
就與利布什·什塔斯娜很熟了，常常去她的寓所。從她
那裏，我還獲知，這小組曾發行過非法雜誌“我們來了”，
其任務在於破壞人民的團結。

主席：你怎樣處理這些雜誌的呢？

波卡爾：除了大主教白倫博士以外，我沒有給過任何人。

（根據檢察長的建議，審判委員會主席說明了這些
雜誌的內容。）

主席：你同意什塔斯娜的非法潛逃嗎？

波卡爾：我同意的。我只問過她，所選擇的路綫是否安全可

靠。我親自給了她五百美元和一万克朗左右的旅費。

主席：你這些錢從哪兒來的呢？

波卡爾：一九四七年，一些捷籍本篤會會員從美國來我國參加在聖·阿德勃特舉行的聖禮時，我曾向他們索取過美元，共獲得了一千二百美元。其中給了什塔斯娜五百美元。後來我又收到她一封很頹喪的信，說她沒有找到職業，無法謀生，我又給了她三百元。其餘的四百元，我賣給了瑪麗·克林漢洛娃了，每元價為五百克朗。這樣我就獲得了二十萬克朗。

主席：利布什·什塔斯娜到達外國後，你和她有過什麼關係？

波卡爾：藉意大利公使館之助，我與她保持通信聯系。起初，有些特務從共和國逃跑，以後又回來了。這些人就為我建立了通訊路綫。我去找意大利公使館的參贊皮諾基並通過意大利公使館傳遞信件，是以後的事情。

主席：對於你的供詞，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波卡爾：我還在外交部與勃拉其博士接觸過。七月或八月，我在塞林宮外遇到了勃拉其博士。他告訴我，他正準備潛逃國外，並說在那邊已經謀好了職業。當我將這情形告訴白倫大主教時，他對於勃拉其還能呆在外交部感到十分詫異，因為勃拉其與教皇聖使的經常往來和他的反動見解是不會不被發覺的。我應該說明一下，勃拉其博士曾和德·利華經常往來。當兩星期後德·利華來大主教公館訪問白倫大主教時，我從他口中得知勃拉其博士已經逃往外國了。從德·利華對勃拉其博士的關心這一點來判斷，我認為勃拉其與聖使之間一定有悠久的、密切的關係。

主席：檢察長還有問題嗎？辯護人呢？沒有問題了。被告波卡爾可以坐下。我現在宣告休庭。

被告奧特卡·斯維茨博士受審經過

（休庭後，審判委員會主席開始訊問被告奧特卡·斯維茨博士。主席在依法予以警誡及其他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審訊。）

主席：你認罪嗎？

斯維茨：是的，我認罪。

主席：你的叛道活動屬於什麼性質的？先簡單地談一下，以後再詳細地敘述。

斯維茨：我承認，我參加了間諜與破壞活動。我進行這些活動是為梵蒂岡服務的。

主席：是什麼原因促使你進行這種活動的呢？

斯維茨：我對人民民主政權和社會主義的仇視和反抗促使我這樣幹的。

主席：你知道嗎，在其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所有人民民主國家的鬥爭中，梵蒂岡勾結了西方的帝國主義、資本家，為的是毀滅人民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而再度建立資本主義？

斯維茨：我知道的。這就是反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

主席：你們用什麼方法來達到這一目的呢？

斯維茨：像大家所知道的，所有西方國家都在準備武裝力量。當然，我並不希望有戰爭。

檢察長：你現在是這麼說，可是你却以行動支持過那些渴望戰爭的人。

主席：你的間諜活動有哪一些？

斯維茨：从一九二〇年起，我就傳遞情報給教皇聖使館。我把國內的各种情况轉告了教廷。我所供給的情報，都是有關於教會宗教事務的、教會政策的、政治性的，最近還有關於經濟的情報。我還作了一個有關陸軍和國家保安部隊對現役人員的某些措施的報告。

主席：除了教會方面的情報外，就都是經濟、政治、保安和軍隊方面的報告了，是嗎？

斯維茨：是的。

主席：你為什麼要報告這些與教會毫無關係的事呢？

斯維茨：這些報告是教皇聖使館的头目們向我索取的。里特，是我从一九二七年就認識了的，此外，還有福爾尼、伏維林納、遜西和德·利華。我對他們都作過書面和口頭的報告。

主席：你還記得你在訪問波希米亞西部後所作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報告嗎？

斯維茨：我記得的。一九四七年我和大主教白倫曾一同訪問過比爾森，並參觀了斯可達工廠。我將這事報告了聖使館。

主席：起訴書聲稱，這一次你洩露了廠中工人的數目、是否所有廠房都開工、它們是否開滿工以及生產些什麼東西等等。

斯維茨：關於工人數目的事，我還可以記得。可能我在報告中寫過這些數字。細節我記不得了。

主席：你還報告過梵蒂岡——也許是通過教皇聖使館的——關於政府與教會談判的進展情況吧？

斯維茨：報告過。我先給聖使館作報告，然後再報告意大利公使館的新聞參贊斯坦達多。斯坦達多是否真正是個

不折不扣的間諜，並沒有人告訴过我；雖然我是應該知道這一點的，因為有一次他囑咐我，叫我不要將曾向他作過報告的事向別人說。

主席：這些情報都是從那裏得來的呢？

斯維茨：我的主要情報來源是神職人員。此外，我也通過我的社會關係獲得報告。

主席：除神職人員外，其他還有什麼人給你情報嗎？

斯維茨：有的，諸如天主教人民黨總書記克利米克博士、“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籌備委員會的幾個理事——江狄契卡博士、格魯帕博士等。此外，我還從羅森納博士、巴特克和其他等人處獲得情報。

主席：在轉送間諜報告的工作中，你曾擔任過傳遞工作沒有？

斯維茨：白倫大主教知道，我經常去聖使館。當他一有報告、信件或類似的東西時，他就交給我。

主席：你知道斯坦達多和伏羅林納主教經常來往嗎？

斯維茨：我記得，有一次伏羅林納主教埋怨說，也許因為斯坦達多呈交報告比他快一些，結果使伏羅林納有時因沒有報告這個或那個而受到責難。

主席：你的間諜報告得到了些什麼報酬呢？

斯維茨：我的報告本身並無報酬，但由於我的請求，前任聖使塞拉錫主教曾出頭在教會中奔走，使我得以成為聖·維特斯主教府諮議員。

主席：你還幹了些什麼其他反對人民民主政權的事呢？

斯維茨：我在“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中工作。我充當大主教白倫的代表並且是該會的理事。“天主教行動會”準備分成不同的社團和小組，用這樣的方式打入許多有相

同傾向的居民區中，目的是爲反抗勢力奠定基礎。

主席：反抗人民民主制度和政府嗎？

斯維茨：是的。

主席：除了當大主教的代表外，你還在“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中進行了些什麼別的活動呢？

斯維茨：首先，當時有必要從事這一組織的準備工作。幹這個，我主要的是需要錢。許多年前，大約在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五年，大主教就設置了聖·瑪麗捐稅。

主席：這種捐稅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

斯維茨：這種捐稅主要是爲修理邊境地區教堂建築物用的。

主席：但實際上是做什麼用了呢？

斯維茨：作了“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基金，設立了辦公處，買了一輛汽車和兩輛機器腳踏車。後來，工作人員的薪金也從這筆款中開支了。

主席：要汽車和兩輛機器腳踏車幹什麼用？

斯維茨：爲了送信。

主席：這些信差到各代牧區、副監牧區和監牧區散發些什麼呢？

斯維茨：告教徒書和非法傳單。

主席：這些告教徒書是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呢，還是屬於煽動性的呢？

斯維茨：我承認是屬於煽動性的。

主席：你知道曼德爾博士在“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中的任務是什麼？

斯維茨：大主教讓曼德爾做一切不告訴別人的事。

主席：這些都是什麼事情呢？

斯維茨：如散發告教徒書和旨在反國家、反政府的傳單等。

主席：你還知道關於“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其他破壞活動嗎？那些活動你自己畢竟也參加了的。

斯維茨：一九四八年，我參加了兩次神職人員會議。第一次會議規定了在婦女、青年以及其他小組中進行活動的任務。第二次會議，白倫大主教也出席的，將“天主教行動會”的官員們介紹給神職人員。他們在談話中聲稱，每個神職人員都有責任在他自己管轄區內去爭取一些忠實的非教徒，以便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支配他們。

主席：爲了進行破壞活動，“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採取了什麼手段呢？

斯維茨：我以前已經說過了，是告教徒書和非法傳單。我曾經親自將兩封告教徒書傳遞給聖使館。

主席：這些告教徒書和非法傳單的目的是什麼呢？

斯維茨：目的在引起政變。

檢察長：引起政變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斯維茨：我承認，資本主義制度對我們的權勢慾望是較有利的。

檢察長：你認爲，我國已經替自己選擇了人民民主並且現在已經當家做了主人的人民還會甘心屈服嗎？

斯維茨：肯定是不會的。

檢察長：那末，你們準備幹什麼呢？

斯維茨：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

檢察長：謝謝你，主席先生，我滿意了。

主席：你熟悉可拉可維奇這一名字嗎？

斯維茨：熟悉的。

主席：你什麼時候見過他？

斯維茨：一九四七年九月或十月，可拉可維奇來到我處，請

求我替他安排去教皇聖使館拜見福爾尼主教。

主席：你如何处理的呢？

斯維茨：我設法使他們得以会晤。

主席：他告訴过你什麼沒有？

斯維茨：他說，他是从克羅地亞逃出來的，道經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斯洛伐克叛國軍，後又進入俄羅斯，在那裏逗留約一個月。後來，他又回到我們國內，設法參加了第一批到羅馬去的学生隊伍，到新開放的尼波穆塞南去。

主席：当你和他來往時，你知道他是個間諜嗎？

斯維茨：坦白地說，我是這麼懷疑的。

檢察長：就爲了這緣故，你才幫助他潛逃吧？

斯維茨：我照老办法幫助他進入了聖使館。

主席：現在談談關於你的其他的罪行。你是怎樣參與“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騙局的？

斯維茨：我是代表布拉格總主教區參加的，曾爲詐騙轉移款子的事而簽過名。這次訛詐行爲的內幕是將這筆基金的錢買了一所屬於基金的房屋。這樣做，是爲了使特別救濟基金免於被國家中央保險公司吞併。

檢察長：除了顛覆和間諜活動外，你还費了很多的精力去“挽救”財產，是嗎？你与教会中的其他人是从誰的手裏“挽救”這筆財產呢？

斯維茨：我承認，實際上我是从我們自己的國家手裏“挽救”財產。

主席：現在且待我宣讀一份有關被告行動的證明文件中的幾段。首先，這裏有一份總主教區“佈道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給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中央書記處的備忘

錄。其內容是關於對某些未經政府處理，也就是說尚在秘密階段中的立法案的審閱問題。

次一文件是克來偉維斯監牧區公署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致“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有關反對教育法案的運動和濫用教堂的備忘錄。

(宣讀)：“今年五月，我們將尚在制定中的新教育法案給天主教徒們帶來的危難，在監牧區中對信徒們作了解釋。我們叫信徒們在致總理、副總理以及國民議會主席團的呼籲書上簽了名。第一個消息是在講壇上宣佈的，呼籲書是放在聖器室內以待簽名的。伐爾伐茨·克列普斯修士簽了名。”

另一個文件是阿羅木茨的恩立爾會和美以美會的聯合會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給“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

(宣讀)：“這裏在阿羅木茨，我們欣悉，由於摩拉維亞事件和在盧塞納宮前的羣衆遊行的結果，新教育法案的製定已被暫時延緩了一下。如果可能的話，我們請你打听一下，教育法案委員會的委員都是些什麼人，你們是否和他們接觸過，或他們能否被掌握、被影響。”

此外，還有些文件可以說明普勒羅夫“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訛詐案。這些文件包括利托麥里澤的主教托洛查博士和契斯克·布德索維塞主教公署給“教士疾病救濟基金”委員會理事的信。這些信件批准購置台普里斯的弗可孚別墅的訛詐計劃。這裏還有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阿羅木茨樞機會議廳的備忘錄。

(宣讀)：“樞機會議廳通知，四十萬二千九百四十八克朗的款子已轉到集中所有現金的尤尼塔斯的活期

存款上了。”

檢察長：被告，这是你在“教士疾病救濟基金”訛詐案中的所作所爲吧？这四十万二千九百四十八克朗。

斯維茨：是的。

辯護人托西博士：說起“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事。你有沒有參加“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管理委員會呢？別墅的購買和款子的轉移是會議上表決的嗎？顯然，你也參加簽訂合同的。

斯維茨：最後一次會議我並沒有出席。我承認一切罪行。当款子撥到樞机会議廳時，我立刻就將它轉到由尼塔斯的戶頭上了。

主席：請問，還有問題嗎？我宣告休庭幾分鐘。

（斯維茨的訊問就此結束。）

被告安东尼·曼德爾受審經過

（休息片刻後，主席進行被告安东尼·曼德爾博士的訊問。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審訊。）

主席：你認罪嗎？

曼德爾：我認罪。我的叛逆活動是我被捕的原因。

主席：簡單地談一下你的活動。首先，你在那裏受教育的？

曼德爾：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在羅馬學習。一九四五年十月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在克拉盧匹的伏爾特夫担任隨營司鐸之職，就在那裏呆了兩年。直到一九四八年，我開始担任布拉格總主教區“天主教行動會”的秘書職務。

主席：誰任命你的？

曼德爾：白倫大主教。

主席：你能否告訴我們，“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是怎樣與你的間諜與破壞活動相聯系起來的？

曼德爾：是的。我得坦白地承認這一點。“天主教行動會”是梵蒂岡用來達成其目的的手段之一，它是為梵蒂岡的利益而服務的情報網。這種佈置也同樣存在於其他國家中，它受主教會議指導，並受梵蒂岡的集中領導。

主席：為什麼大主教白倫偏要委託你領導“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呢？

曼德爾：他當然瞭解我對教會的忠誠和我對國內所發生的政治事件所採取的敵對態度；再者，他也認為我是能幹的。

主席：你怎樣參加間諜和破壞活動呢？

曼德爾：一九四八年一月，大主教白倫派我去法國，為的是叫我熟悉一下法國“天主教行動會”在反共鬥爭中所採取的方式和策略。在法國，我曾談過一些關於“天主教行動會”的問題。我認為，我們的工作條件很好。我還非法地替布拉格的友人帶了幾封信到巴黎。

主席：在巴黎你都取得了一些什麼經驗呢？

曼德爾：我所獲得的經驗是關於“天主教行動會”及其在反社會主義鬥爭中對不同問題所採取的辦法，特別是在組織工作方面。

主席：“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在我國境內的任務是什麼呢？抱了什麼目的呢？

曼德爾：除了其他活動外，其目的首先在於爭取信徒們支持教會，從而轉為一個破壞組織；其次，至少從我這方面來說，還進行間諜活動。

主席：你身為“天主教行動會”的領導，關於你一方面的破壞

活動和另一方面的間諜活動，是如何進行工作的呢？

曼德爾：在我接手办布拉格“天主教行動会”時，我的办公處在布拉格二區伏西爾斯卡街五号。此後，那裏就成爲所謂聖·瑪麗捐稅的組織及發展地了。这聖·瑪麗捐稅是由信徒們捐募的，用來作爲各主教區的宗教費用；然而，这筆款子的一部分却移來作爲建立“天主教行動会”組織網之用了。

主席：你實際上是如何進行工作的呢？

曼德爾：我們在阿羅木茨的一個會議上決定了適當的辦法。這會議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舉行了。

主席：這會議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呢？

曼德爾：這會議的主要問題是關於建立各教區間的聯系，交換情報和經驗的建議。我們特別對青年感到興趣，這些青年就是我們要替教會爭取的對象。在阿羅木茨會議後，又在布拉格、布爾諾、熱拉岱茨·克拉羅夫、布德索維塞和利托麥里澤舉行了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我們交換了經驗，討論了一些非法傳單中的指示，對於神職人員的行動以及其對國家的態度進行了監視，又討論了非法傳單所起的作用以及怎樣進行反對星期日工作隊等等。關於這些會議，我都向大主教白倫作了報告，以備其日後工作之需。

主席：你還在“梵蒂岡天主教行動会”中進行了些什麼別的活動呢？

曼德爾：除了在會上的活動外，我還竭力影響青年們。在各屆會議的間隙期間，我親自到布拉格主教區的各監牧區去巡視，舉行非法小組會，並囑使他們仇視人民民主政權。同時，我又發動設立更多的小組。

主席：你提到在布拉格舉行过一次會議。那次會議有誰參加？

曼德爾：在这次布拉格會議上，我所邀請的是从執行教會政策的觀點看來我認為是可靠的以及我知道他們對人民民主制度抱有敵對態度的一些神父。

主席：在其他被告中有那幾個參加了呢？

曼德爾：只有主教府諮議員斯維茨。

主席：這會議討論了些什麼呢？

曼德爾：我作了主要的報告。我再一次号召建立所謂小組系統，並證明將陸續供那些從事破壞活動的神甫們以必要的資料。

主席：你怎樣繼續你的活動呢？

曼德爾：我直接或藉斯維茨的幫助與白倫大主教接觸，從他那裏獲得各種非法傳單的草稿。每當我接到一張傳單時，我就在辦公處把它翻印出來，再分散到各監牧區。這些傳單的內容是反對我國的代表。

主席：除了你的工作人員外，還有誰來幫助你進行這個活動呢？

曼德爾：還有羅森納博士，但他僅僅在這一件事情上幫助过我。

主席：傳單中還有什麼指示嗎？

曼德爾：有的，其內容是叫把傳單在講壇上宣讀出來給忠實的信徒們听。目的是要影響信徒們，並爲了主教團的事業而把他們爭取過來。

主席：你怎樣散發這些非法傳單的呢？

曼德爾：根據白倫大主教的指示，一九四九年春，我設置了一個秘密郵遞組織。原來的郵遞組織僅包括東西兩區，

由辦公處的兩個工作人員馬列克和巴特克擔任散發傳單的工作。後來，我們又從聖·瑪麗捐稅基金中提出錢來，購買了兩輛機器腳踏車。因此，我們的僱員就能將傳單散發到所有單位了。

主席：你的上司和白倫大主教知道你製定這計劃和購買機器腳踏車來散發印刷品的事嗎？

曼德爾：他知道的，因為這是得到他的同意後才執行的。

主席：除了這些傳單外，你還散發過其他譏諷性的傳單吧？

曼德爾：是的，我們還散發了相當多的非法傳單和反社會主義的小冊子。

當我在法國時，我訂購了大批有關“天主教行動會”的工作和鬥爭的書籍，同時還訂購了關於反社會主義鬥爭的書籍。在處理這些書籍的工作中，有翻譯員馬利昂·雷赫幫助我。他在辦公室中管理法文通訊的來往，並幫助我將書籍發送給各修道院和神學院。

主席：你用什麼方法來進行間諜活動的呢？

曼德爾：我利用神甫們的集會和我的旅行來獲取各種秘密情報。我把報告都交給了白倫大主教。

主席：大主教要這些情報的目的是什麼呢？

曼德爾：他與教皇聖使有聯繫。這樣，他就能將這些情報供給梵蒂岡。

主席：你給白倫大主教的都是那類性質的情報呢？一共有多少？

曼德爾：我給過他相當多的報告。報告本身敘述我們的破壞工作在各單位中的效果，主教們的活動在信徒中所起的作用，還報告過所觀察到的居民情緒。此外，我還獲得過有關國民委員會所採取的幾項措施的情報；這些

措施，从國家利益的觀點看來，是机密的，甚至是絕密的。

主席：在你寓所沒收到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個便條，是關於某項保安工作佈置的間諜情報。請你前來看一下，這是不是你的便條。

曼德爾：（審閱文件後）：是的，這是我寫的便條，其中所說的報告已由我交給了白倫博士。

檢察長：還有誰替白倫博士進行間諜工作呢？

曼德爾：白倫博士与編輯班納特卡，还与瑞士天主教救濟會的理事格拉塞以及前駐捷克斯洛伐克的荷蘭新聞記者安娜·都倫堪普等有联系。這些人都經常与其他國家有接觸。班納特卡曾秘密告訴过我，有個外國人在邊境上因携帶間諜報告而被逮捕的事。

主席：關於你的間諜活動，你還有什麼要說的沒有？

曼德爾：我曾与“泰晤士報”的新聞記者戈德弗雷·李亞斯和一個“合衆社”的美國新聞記者往來过；我知道，他們都是從事間諜工作的。我給过他們各種報告和非法傳單。我曾經向美國新聞記者指出，外國無線電台將非法的情報消息廣播得太快，這樣会把我們与外國電台有联系一事暴露得過於明顯，因而引起保安当局對我們行動的注意。

主席：關於斯維茨的叛逆活動，你知道些什麼？

曼德爾：他本人參加了我的叛逆活動，他是我的頂头上司，且領導整個的活動。

檢察長：爲了補充被告的供詞，我在此提出一個直接有關“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組織活動的文件。

（將文件呈交主席。）

主席：這文件的標題是“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行動會’工作方案”。你知道嗎？

（遞給被告審閱。）

曼德爾：知道的，這計劃是關於“天主教行動會”的。從這上面可以看出梵蒂岡的間諜意圖。其內容包括四點：建立關係、獲得材料、工作系統和組織方法。

檢察官：我還可以提交國家法院一疊由曼德爾辦公處所翻印和散發的非法的破壞性的印刷品。（將一疊文件呈交法庭。）

主席：被告，這些印刷品和傳單都是你辦公處製造出來的嗎？審閱一下，這是否是由你散發的。（將一疊文件遞給被告，被告一一審閱。）

曼德爾：這些是煽動性的傳單和由“佈道部”發出的告教徒書。除去最近的少數幾份是在我被捕以後才散發的以外，所有這些都是我經手散發的。（歸還文件。）

主席：我審查這些傳單的內容，都是譏諷性和煽動性的。為了維持公共秩序起見，不能將他們逐字宣讀。因此，我將摘引有代表性的幾段。從一份有關懺悔禮的、標題為“決疑”的傳單，我說明如下：

（宣讀對答詞）：“來行懺悔禮的人承認自己是個共產黨員。懺悔師應該查明其原因。如果這人是個完全信仰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員，就不能給他行懺悔禮。

“這懺悔師還應該訂立行懺悔禮的條件，要求犯罪者說服她或他的丈夫或妻子、兒子或女兒放棄其共產黨員的身份。”

另外一張傳單實際上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在特爾納發舉行的主教和高級教士會議記錄的增訂版

(宣讀):“爲了要說明開除教籍的性質和駁斥他人的異議,這裏由高級教士們擬定了一個佈道文,以供神職人員之用,其中關於宗教懲罰的意義应向信徒們作明確的解釋。在這些宗教懲罰中大家應該提出最重要和最通用的那幾項來。”

另一張傳單標題爲“基督的親愛的兄弟們,和平是屬於你們的”。值得注意的是:它提到了個別神甫应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所作的誓言。傳單中引用了誓言中原來的話,但同時又嚴厲地諭告每個神甫都有責任書面或口头对誓言提出保留。

檢察長:被告庫拉契,当你向希特勒宣誓時,你有什麼保留嗎?

庫拉契:完全沒有。

檢察長:那時你倒毫無保留地宣了誓。对希特勒你应允了一切。

辯護人:在你被監禁的時期內,你考慮过你這些活動嗎?

曼德爾:考慮过的。我犯了罪,在主教的唆使下,我从事了間諜和破壞活動。我現在懊悔了。

檢察長:爲了描繪出全部活動,还爲了要說明在被告曼德爾和斯維茨領導下的“天主教行動會”各小組活動的最終結果,我建議宣讀國家法院關於古弗及其同謀者、哥斯狄克及其同謀者和維特斯卡及其同謀者諸犯罪恐怖集團案卷做爲証件。在這些案件中,“天主教行動小組”是犯罪恐怖甚至暗殺等行動的活動中心。

(主席与審判委員會的其他人員商議。)

主席:經過当庭商討,法院決定接受檢察長的建議。

主席:根據檢察長的建議,我注意到國家法院檔案第 Or I

3/48 号安东尼·古弗及其同謀者的案件；安东尼·古弗是維俾維茲羅馬天主教監牧區的司鐸，根據案卷的內容，他是破壞活動組織的首領。這組織散佈大批譏謗性的傳單；供給組織成員以武器，以便武力奪取政權之用；又送恫嚇信給機關職員和人民民主政權的擁護者。該組織由一個青年小組領導，在古弗的指揮下，在監牧區中集會。

下面一個是國家法院檔案的第 Or II b 328/49 号關於雅安·哥斯狄克及其同謀者的罪行案件。這小組自稱為“喬治修桶匠”，是在隨營司鐸弗蘭狄塞克·帕孚尼和弗蘭狄塞克·阿德米茲的勢力影響下成立的。這非法組織也翻印且散發破壞性和叛逆性的傳單。這組織中的人員搜集武器，並且進行恐怖活動的訓練。此外，這非法組織還從事間諜活動。

法院所准許引用的進一步的証據，乃是國家法院第 Or I/VII 25/50 号關於雅羅斯拉夫·維特斯卡及其同謀者案卷的內容。在靠近各多尼的多尼·波強諾維茲地方，本堂司鐸雅羅密爾·勃利塞克是所謂“天主教青年小組”的首領。該教士在“天主教青年小組”中進行教育的結果是：使一個年十七歲的組員與一個專門從事恐怖活動而被派至共和國的法國特務雅羅斯拉夫·維特斯卡共謀，殺害了各多尼的國家保安部隊人員。

檢察長：國家法院剛才宣讀過的罪行案卷內容，清楚地說明了在以“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原則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小組內所施行教育的結果，便是謀殺其職責在保衛勞動人民的人們。

曼德爾：（默然）。

主席：還有問題嗎？沒有了。我宣告休庭，明早八時再開庭。

（被告曼德爾的訊問在此結束。）

被告伐茨拉夫·姆特非受審經過

主席：我們將進行對下一被告伐茨拉夫·姆特非的訊問。現在請被告入席。

（被告入席。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審訊。）

主席：被告，談談你的活動情況吧：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當教皇聖使館翻譯員的？

姆特非：一九四九年七月，在給梵蒂岡作情報工作的我的前任阿路瓦·茲姆茲利克神甫被逮捕以後，我應教皇聖使館代表奧特維·德·利華的邀請，便擔任起我的職務來了。

主席：你知道你現在為什麼站在法庭前面嗎？

姆特非：是的，我知道的，我也無意抵賴——我是因為進行了間諜及破壞活動而站在这裏的。我在教皇聖使館中翻譯政治和經濟性的情報。我將這些報告譯成意大利文，做為外交郵件轉送給梵蒂岡去處理。

主席：為什麼梵蒂岡需要這一類的報告呢？

姆特非：當我與奧特維·德·利華主教相勾結時，我認識到，駐布拉格聖使館和那些駐其他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聖使館一樣，乃是替梵蒂岡從事情報工作的。

主席：就你自己的親身經歷，你知道德·利華在國內有些什麼活動呢？

姆特非：德·利華主教搜集一切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報告，以備梵蒂岡使用。我將這些報告譯成意大利文。德·利華

又親自將意大利文譯成密碼。

主席：爲什麼要譯成意大利文，而不譯成拉丁文呢？

姆特非：因爲處理這些報告的人多半是意大利人。除此而外，因爲我的報告是通過其他外交使館，主要是通過意大利公使館傳遞的。

檢察長：我可否把這點瞭解爲：教皇聖使館和意大利公使館，實際上就是兩個彼此相互幫助的間諜機關？

姆特非：我不瞭解內部情況。但這是可能的。

主席：你能具體證明你所翻譯的情報有那些種類嗎？

姆特非：首先，是教廷反對人民民主制度活動的報告。其次，是有關內部情況、居民情緒等的報告。由於報告數量很大，時間距今又久，我已經記不起所有的報告詳細內容了。我知道，這些報告來自各地，主要是關於經濟問題和保安措施等。其中也包括在鄉村中進行破壞活動的指示，這類活動主要是反對統一農業合作社的。

檢察長：這些報告都與宗教或教會的神職工作有關係嗎？

姆特非：沒有。

主席：你知道供給聖使館資料的情報網的詳細情況嗎？

姆特非：我個人只能確定，那些報告是從各地區來的，多半是從各主教那裏來的。有些主教，我曾在聖使館中親眼看見過。這主要是斯洛伐克的主教們，他們親自呈遞報告。耶穌會省長錫爾根也常去那裏。

主席：你所翻譯的情報都送給誰，或寄給誰呢？

姆特非：所有的報告都是給梵蒂岡國務部的。

檢察長：在你所送出的報告中，有些是捏造的和不真實的。這些報告都幹什麼用呢？

姆特非：它們是用來作梵蒂岡廣播電台和其他西歐國家廣

播機關宣傳之用的。

檢察長：間諜報告呢？

姆特非：我估計這類報告還要送到更高級的機關去。我所譯的報告中，還包括了一些軍事和保安性質的。

主席：這些報告是爲甚麼活動服務的呢？

姆特非：顯然是爲軍事活動服務的。

主席：讓我們接着談吧。在德·利華於一九五〇年三月離開共和國之前，他給過你什麼指示？

姆特非：當要德·利華主教離開共和國國境時，他將這事報告了梵蒂岡，並訪問了幾個外交使館。他將一部分資料運到意大利公使館，餘下的，他命令焚毀了。他還命令燒掉兩本給梵蒂岡拍密碼電報的密碼簿。德·利華叫我不離開教皇聖使館，以免被逮捕，並且叫我別洩露他的活動。他答應以後照顧我，並將通過某使館的幫助，替我安排出國的事。在他離開之前，他給了我一萬克朗，作爲我服務的報酬。

主席：我們可以說，你是在有收益的情況下進行情報工作的囉？你獲得報酬了嗎？

姆特非：獲得的。

主席：起訴書中還控告你犯了協助潛逃的另一罪行。

姆特非：是的。當我的一個來自俄斯特拉發的朋友格特魯達·米克奧華來訪時，她會告訴我說，她要非法出國赴維也納，我答應幫助她。還有個名叫孚拉·蘇可伐的也要與她同行。我曾訪問了前任伐爾梯斯修道院院長、現在兄弟慈善醫院工作的戴斯馬斯修士。他告訴我，偷越國境是可以辦到的，但要花一萬克朗。我將這事告訴了米克奧華和蘇可伐二人。蘇可伐大吃一驚，說她正處於

經濟困難之中，將出賣鋼琴以成行。我又將这事報告了德·利華。

主席：這兩個女人認識德·利華嗎？

姆特非：米克奧華認識德·利華，是經我介紹與他相識的。在一個保加利亞籍的明哲夫博士案件中，她曾去找過德·利華。此後，明哲夫博士也同樣逃跑了。

主席：我現在給你看一些國家保安機關所沒收來的文件。你會替梵蒂岡翻譯過這些文件嗎？（遞給被告一疊文件。）

姆特非：是我翻譯的。這只不過是譯文的一小部分……

主席：我們這裏還有一些。這也同樣是你翻譯的報告吧？（遞給被告另一疊文件。）

姆特非：是我翻譯的。

主席：你認識這相片上的人嗎？（遞給被告相片，被告將兩疊報告退還。）

姆特非：認識的。這就是德·利華主教。我就是替他翻譯間諜報告的。

主席：這張相片是誰的？（遞給被告第二張相片。）

姆特非：這是伏羅林納主教，我跟他工作過幾天。（退還兩張相片。）

主席：我認為，被告伐茨拉夫·姆特非的訊問可以在此結束。法院方面還有什麼問題嗎？

（審判委員會其他人員沒有問題了。）

主席：檢察長還有問題嗎？

檢察長：被告，一九四九年夏到一九五〇年春，在教皇聖使館中的活動是你的主要職業嗎？

姆特非：是的。

檢察長：那末，你就是個職業間諜了，是嗎？

姆特非：我承認是的。

檢察長：被告，除了間諜活動，策反工作及濫用外交郵件等行動外，你知道德·利華還從事過什麼其他非法活動嗎？

姆特非：我不知道。

檢察長：主席先生，爲了証實駐布拉格聖使館在通貨方面的欺詐手段，我提交這些文件，並請審查。

（主席與審判委員會其他人員商議。）

主席：經過當庭商討後，法庭決定接受檢察長的建議。

（主席審閱檢察長所提出的文件。）

主席：這些文件是駐布拉格聖使館由奧特維·德·利華簽署、給阿羅木茨大主教的三封用官方信箋寫的信。我摘引其內容如下：

第一封信的內容是關於教皇聖使館用四個不同的姓名開了四個戶頭，以儲蓄各教區所送來的款項。

第二封信，實際上是張秘密傳單。其中，聖使館說明了國家銀行要求聖使館在財務方面應該遵守國家銀行的規定，特別是關於將錢財轉移給外國人和國外的規定，也就是貨幣規定。在這封信中，聖使館提出，國家銀行的規定僅適用於所謂的“聖·彼得金”^①。其餘的款項和一般數目較大的款項應以最簡單的手續撥到聖使館，這樣可以不通過銀行，並可以不引起注意。

第三封信是確認斯克倫諾夫斯基修士個人在聖使館中儲蓄五十萬克朗。

所提交的第四個文件是阿羅木茨大主教秘書處的

① “聖·彼得金”是天主教徒獻給羅馬教皇的款項。——譯者

備忘錄，照會大批的款項或捐獻給教皇的款項應以最簡單的手續撥到教皇聖使館。

還有問題嗎？辯護人方面有問題嗎？

辯護人：你是被認作教會中的一員的呢，還是附屬於教會的呢？

姆特非：我是個僕人，我得執行命令。

檢察長：被告，如果某人僱你殺人，能因此而說你不是殺人犯嗎？

姆特非：不能。

檢察長：如果有人僱你作間諜，能因此而說你不是個間諜嗎？

姆特非：（遲疑地）不能。

檢察長：主席先生，謝謝你，我沒有問題了。

主席：沒有問題了，被告可以坐下。我宣告休庭。

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受審經過

主席：現在我們進行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的訊問。

（被告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審訊。）

主席：你知道你為什麼被逮捕嗎？

雅羅里密克：因為我違犯了法律。

主席：檢察長控告了你，你瞭解你對國家所犯的全部罪行嗎？

雅羅里密克：我瞭解的。

主席：你的破壞活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從什麼時候起，你就進行反人民民主制度的工作和活動了呢？

雅羅里密克：早自一九四五年，我爲了要不惜任何犧牲地努力保全教會財產及保存一定的勢力，就時常與現政權發生衝突。我們也用散佈假消息的方式爭取信徒們，取得他們的支持，以達到我們上述的目的。在這一意圖方面，我必需承認，我親自在講壇上展開了保全我們財產的公開的鬥爭。爲了要鞏固教會的利益，產業管理人、教會財產所有者、修會、神甫以及非信徒們在我的主持下組成了一個經濟管理委員會。我們企圖用這種方式來影響事情的進程和防止我們財產的國有化。

主席：你在這方面進行了些什麼活動呢？

雅羅里密克：我們曾拉攏一些同情我們的政府官員，並企圖通過駐布拉格的聖使館，利用教皇的權勢進行活動。我們尤其是想利用天主教人民黨的勢力。在一切事件中，我們全根據教皇聖使館的指示和意圖行事。

主席：在這件事情上，教廷的意見怎樣呢？

雅羅里密克：我們奉命保全財產，使其收益不至於減少。教皇聖使告訴過我們，教皇得悉後非常贊許我們的行爲。

主席：你擔任主席的那個諮詢會議是如何進行工作的呢？

雅羅里密克：我們曾設法從“土地改革修正法案”下保存一切可能保存的財產並在“土地改革修正法案”既成爲法律之後，則又至少要影響該法案的實施條例，使教會財產免於被沒收。

主席：里特主教曾在這方面給過你指示吧？

雅羅里密克：是的，我們是按照所指示的意圖行事的。

主席：你向聖使館報告過你的工作進展情況嗎？

雅羅里密克：做過口頭和書面的報告。

主席：這些報告包括了許多國家機密。你知道嗎？

雅羅里密克：我知道的。報告屬於經濟性的，所以實際上，也有情報的意義。

主席：你與人民黨代表保持過密切的關係。他們在這方面怎樣幫助你的呢？

雅羅里密克：我們主要是與斯拉米克主教、加拉和若干黨內的議員聯系的。我們給予人民黨以各種財政上的資助——一九四八年初，我們以所有教會代表們的名義贈送過他們二十五萬克朗——以確定並鞏固我們彼此間的關係。

主席：你以後怎樣進行的呢？一九四七年，你和你的上司努茨開過一次會。

雅羅里密克：一九四七年，我們的修會總修長努茨曾在台普拉修道院院長摩格勒被逐回德國之前，訪問過台普拉修道院和摩格勒。摩格勒院長希望自己日後還能回來。修會總修長努茨對這件事情的反映是，先將修道院的管理權交給我，讓我負責管理。待摩格勒日後回來時，我再行移交。我同意了這點。

主席：你怎麼能想像，這些在佔領期間因納粹行為而罪行昭彰的修道院僧侶們還能回到這裏來呢？

雅羅里密克：這當然有賴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囉。

主席：被告，請你說得更明白些。

雅羅里密克：就是倘若形勢恢復到以前那樣的話。

檢察長：你想人民會自動地允許那些竟連在制服上也佩帶卐字的納粹分子再回到台普拉來嗎？

雅羅里密克：我會認為，通過某種國際協定，這是可能的。

檢察長：被告，你所指的那個國際協定，就和“慕尼黑協定”一樣，是嗎？你認為，我國人民會隨便屈服於一個新“慕

尼黑協定”嗎？

雅羅里密克：我認識了，現在我才認識到，他們決不會允許的。

檢察長：被告，一九四八年一月，你會指望摩格勒院長及其僧侶會隨着新納粹軍隊的復活而捲土重來。這一點，从我呈交主席的証件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檢察長呈交雅羅里密克院長和勃孟斯特修會總修長努茨間的協定。）

主席：檢察長提交了雅羅里密克院長和勃孟斯特修會總修長努茨間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所訂立的協定。這個協定，經我們當庭商討後，準備宣讀作証。該協定的名稱是“關於台普拉修道院的臨時協議”。“第一，台普拉院長彼得·摩格勒閣下將修道院及其一切附屬物移交修會總修長閣下，因為他本人和他的僧侶均將離開此地赴德國。第二，修會總修長得教皇的批准和授權，在台普拉修道院中建立一個捷克斯洛伐克籍的新僧侶團體，得充分享用台普拉一切財產，如建築物與地產等。直到讓渡給主教府諮議員的繼任者時為止，該新團體將成為一切財產的保管人與準所有者；並按照贈送者的意圖，以最經濟的方式、忠誠地進行管理。然而，如果將來因國籍條件與政治疆界發生變化，而使台普拉修道院的僧侶能够並願意從德國回來，該新團體得在友好的情況下，經接受委託的總修長的許可，退出此地。——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於馬利安斯克·拉茲尼。簽署者：斯特拉霍夫修道院院長兼台普拉修道院修長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以及勃孟斯特修會總修長赫帕特斯·努茨。”

(主席將協定交給被告雅羅里密克審閱，加以証實。)

主席：請看這協定。就是這個嗎？反面有簽名。

雅羅里密克：是的，就是這個。

主席：現在告訴我們一些關於你與努茨總修長合作的情形。你曾經替他獲得並遞交給他一些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報告吧？

雅羅里密克：我送給他各種經濟報告和材料，諸如“土地改革修正法案”的成效、關於個別修道院的情況報告、關於神職人員及其對現政權所持態度的報告以及其他類似的報告。我有時給他口頭情報，有時送給他書面報告，後來通過波卡爾主教、錫爾根省長以及其他去羅馬旅行的教會人士的幫助，將報告送去。

主席：後來你就不再用通過聖使館的老辦法了嗎？

雅羅里密克：的確，不用老辦法了。

主席：為什麼不用了呢？將這一點解釋一下。

雅羅里密克：我怕暴露。

主席：據我們所知道的，梵蒂岡無線電台利用許多這樣的報告，來進行誣衊性的廣播。是嗎？

雅羅里密克：是的。

主席：你的上司努茨對你的活動，也許給過些政治性的指示吧？

雅羅里密克：在這方面，我多半是從羅馬回來的那些人那裏獲取口信的。一九四八年，波卡爾主教回來時，曾給过我七萬五千克朗，是努茨總修長送給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

主席：這些錢到底幹什麼用的呢？

雅羅里密克：這件事由波卡爾主教本人來解釋，可能更正確些。

主席：被告波卡爾，到前面來。

（被告波卡爾走到法庭前。）

波卡爾：我和努茨總修長曾為這事訂過一合同，約定他在羅馬付給我三十五萬里拉，以作我們清償各項債務之用，而我在布拉格償還給雅羅里密克院長七萬五千克朗。

主席：這就是個完全非法的貨幣交易。你們如何定克朗與里拉的比值呢？

波卡爾：遠低於官定比值。但我確實是付了款的。

主席：被告波卡爾，你可以坐下。被告雅羅里密克，你對你們教會這些高級教士之間的貨幣欺詐陰謀不曾感到奇怪嗎？

雅羅里密克：這是完全不對的。

主席：你現在可否告訴我們，一九四八年二月後你是怎樣繼續進行破壞活動的？

雅羅里密克：大約從一九四八年年中起，我們的行動愈來愈變得非法了。“土地改革修正法案”的制定，使得我們的地位受到很大的影響，因而激起我們的敵對態度。

主席：關於這件事，你也曾與某外國新聞記者討論過吧。那是怎麼回事？

雅羅里密克：一九四九年，我與美國新聞記者斯密司談過一次話。我告訴了他我對有關開除教籍諭令的執行和教會一般政治觀點的看法。同時，我還指出，我們曾不得不採取非法的行動，並繼續我們反抗現政權的活動。

主席：你還與瑞士人納斯波姆有過同樣的談話，是嗎？

雅羅里密克：是的。本質上是一樣的談話。

主席：繼續談下去。

雅羅里密克：我們是在主教會談上見面商討的，同時還給神職人員和信徒們以指示。在此期間，我們曾因發行被禁的告教徒書，而發生過衝突。

主席：在那時，你開始發行更多的這些煽動性的印刷品了，如告教徒書、傳單和備忘錄等等。

雅羅里密克：是的。

主席：你還記得這些嗎？

雅羅里密克：記得的。

主席：你接到過一部分印刷品，還有一部分是你參與擬定的，並且還宣讀過的。我現在請你審閱一下這些非法印刷品，看它們是否就是那些取得主教們的同意而被翻印和散發出來的印刷品。

（被告雅羅里密克審閱文件。）

主席：請看第一四八號証件。這是什麼文件？誰散發的？

雅羅里密克：這是羅馬教廷所頒佈的關於開除教籍的勅令。日期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是在此地翻印然後散發給各神甫的。

主席：審閱下面第一五〇號的文件吧。

雅羅里密克：這是同樣的教令，目的在於造成信徒們的混亂和不信任。

主席：它們後面還附有以破壞國家的內部組織機構為目的、帶有譏謗性與叛逆性的指示。這些指示就是你們非法散發的，所謂的勅令、傳單和告教徒書。

雅羅里密克：我承認。

檢察長：被告，請看第一五二號証件，看看你通過你的專門信差而秘密散發的其他帶破壞性的印刷品。這些印刷

品与宗教或与信仰有關係嗎？

雅羅里密克：沒有。

主席：你还曾下过令，要在講壇上宣讀这些文件吧？

雅羅里密克：是的。

主席：你也參與草擬了这些非法印刷品嗎？

雅羅里密克：我幫着擬定过一張傳單。

主席：再沒有別的了嗎？

雅羅里密克：就只一張。

主席：你还親自散發过这些非法印刷品嗎？

雅羅里密克：我下令散發过这些印刷品。有一封告教徒書，我曾通过裴克爾先生送給法國大使館武官弗利波將軍。

主席：他怎樣加入你們的小組的呢？这位將軍到底是個什麼人？

雅羅里密克：回想起來，我現在得称他爲情報員、間諜。這也就是他所以對我們的印刷品發生興趣的原因。

主席：現在簡單地說明一下这些非法印刷品的目的与宗旨。

雅羅里密克：它們說明了教会对國家政權站在敌对地位的事实。

主席：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我还要知道散發这些印刷品的目的。

雅羅里密克：是阻止社會主義及其全部思想的深入貫徹。

主席：你对你所看見的文件有什麼話補充嗎？

雅羅里密克：主席先生，我再沒有什麼話可補充的了。

主席：現在繼續談下去。你与議員休多巴曾有过關係。

雅羅里密克：当他逃往國外後，一九四八年七月曾給我过一封信。後來按期有信來。这些信是法國領事館的一個僱

員皮爾小姐交給我的。我也用同樣的方式給過他四封回信。

檢察長：用這種非法方式所傳遞的書信的內容是什麼？

雅羅里密克：它們對現政權是不友好的。

主席：你把這件事只稱為“不友好”而已。

檢察長：像休多巴這樣的人，在國外幹些什麼呢？從這些書信的內容，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雅羅里密克：不幸得很，我得稱之為破壞活動，支持帝國主義的活動。

檢察長：你知道這些國家在全國反對我們共和國嗎？

雅羅里密克：我相信它們希望來一次大變革。

檢察長：哪一種大變革？

雅羅里密克：它的目的是不讓人民民主制度在此長久存在，而使立足於慕尼黑協定前的基礎上的那種制度復辟。

檢察長：被告，你相信我國人民會自動放棄他們的統治嗎？

雅羅里密克：我想不會。公開的武裝衝突也曾被考慮過。

檢察長：這恰巧是你的同謀者休多巴先生所希望的。這就是在起初稱之為對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友好”的態度，是休多巴的態度，也就是你的態度。

主席：我們現在談另一個問題。事實證明，你與各種不同的人藏匿煽動性的資料、非法的告教徒書、破壞性的傳單和其他一些譏謗性的文件。你和誰共同藏匿這些文件的呢？

雅羅里密克：我將這些東西藏在，譬如說，華特洛伐小姐的寓所中，我要將它們保存起來，作為日後的檔案。

主席：請看第一四七到一六〇号文件，這些是否為你所藏匿的。

(交文件給被告審閱。)

雅羅里密克:是的,這些就是。

主席:除了這些文件之外,你還藏匿了些什麼別的?

雅羅里密克:我還藏起了些錢款和幾件有價值的東西,諸如寶貴的古董傢具之類。

主席:你藏在那裏呢?

雅羅里密克:傢具已經搬到我們修會中的一個在塔波的各都辛監牧區去了。

主席:這裏有張古董藝術傢具的像片,係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財產,被你藏匿在各都辛監牧區。還有一份關於發現你藏匿在你兄弟約瑟夫·雅羅里密克處的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金器的文件,請你審閱第一七五和一七六号文件,看它們是否確實。(將文件交被告審閱。)

雅羅里密克:是的,頭一個和第二個這兩個文件全是確實的。

主席:現在繼續談你的罪行。你還沒有將所有的事情都告訴我們吧?

雅羅里密克:現在我想起來了,在革命的前夕,我曾將所收到的文件藏在斯特拉霍夫修道院中。事實是這樣的,在革命的前夕,裴克爾先生首先帶給我一份有關偽政府派人到西方國家旅行的記錄和一部像書本似的納粹秘密警察檔案的一部分。

主席:什麼檔案?

雅羅里密克:這是有關納粹秘密警察情報員檔案的一部分。

檢察長:被告,一個正直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當他手裏拿到一份納粹秘密警察情報員的名單時,他的責任是什麼呢?

雅羅里密克：檢察長先生，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責任應該是趕緊將它交給保安當局。

檢察長：然而，你並沒有這樣做。你也不願意這麼做，因為那名單中也包括了幾位你的同行，他們現在正坐在被告席上。

主席：現在告訴我們，你所知道的由教廷領導的其他破壞活動。

雅羅里密克：諸如委任特爾納發的拉錫克爲主教時，就沒有獲得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許可。然而拉錫克確實受命爲主教了。當時，大主教秘書波卡爾主教曾與我商討，問他是否應該去特爾納發參加授命典禮。我贊成他去。我得承認，這違犯了政府的“教會條例”。

主席：你在國內與你修會中的哪一些修道院院長保持聯繫？

雅羅里密克：主要的有泰若夫斯基和馬加爾卡。我們經常商談修道院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很自然地也扯到政治問題。我們在這一點上，是站在同一條戰綫上的。

主席：你同樣也從他們那裏獲得經濟和政治報告吧？

雅羅里密克：我接到過經濟情報，轉交給修會總修長努茨了。

主席：從你的供詞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從一九四五年起，你就進行大規模的破壞活動。你簡直是保持了你在佔領期間一貫所遵循的路綫和政策。讓我們再往回看看，在偽政府官員中，你和哪些人有關係？

雅羅里密克：除了莫拉維茨以外，事實上和所有的人都有關係，特別是卡爾福斯和皮納特。

主席：你去拜訪過他們嗎？

雅羅里密克：是的，我們彼此都訪問過。

主席：在对偽政府官員的審訊中，談到了許多關於你的事。

格盧比和皮納特很坦白地供認，你們彼此相勾結。你還有什麼可說的嗎？

雅羅里密克：的確有過某些合作。

主席：一九四五年，革命前夕，你與他們共同籌謀過某一項計劃。這記載在你所保存的記錄上。我讓你看看。

雅羅里密克（審閱文件）：這是關於偽政府派人去西方國家總部的記錄。當弗蘭克見德國戰敗了，就竭力使美國和英國軍隊進入本國，以便佔據共和國的一部分。

主席：從你在佔領期間的行動看來，可見蘇聯軍隊的解放共和國對你是全然不利的。所以你欣然參加籌謀與美英軍隊磋商，使他們首先佔領我國的領土，還保證在這裏建立“慕尼黑協定”之前所存在的那種制度和政策。對嗎？

雅羅里密克：實質上是的。

主席：你還希望對你的供詞加以補充嗎？

雅羅里密克：主席先生，我認識到，由於我的行動，我違犯了人民民主共和國法律，我現在必需身受其果。

主席：法庭方面有什麼問題嗎？檢察長？辯護人？

辯護人格德利契卡博士：主席先生，我有個問題。被告，有個時期，你曾受命為大主教，是嗎？

雅羅里密克：有人曾提起過。

辯護人：當最後是由白倫任大主教時，這事恐怕對於你執行梵蒂岡或大主教命令的積極性有些影響吧？

雅羅里密克：在這方面，我始終盡力保持忠誠，從來不與大主教或我的上司站在對立的地位。凡事該我辦的，我都照辦了。

主席：還有問題嗎？（沒有問題。）在結束時，我將宣讀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巴波拉·華特洛伐的供詞。這就是你曾經藏了許多東西在她家裏的那個華特洛伐吧？

雅羅里密克：是的。

主席：華特洛伐供稱：“我與雅羅里密克博士是在聖·瑪麗協會相識的。一九四九年仲夏，當我去拜訪他時，他請我替他保存一些文件。他說那些是重要文件。我知道，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在將來顛覆共和國的現有制度時，他將要用到這些文件，來證明他在教會中所進行的破壞活動；並在這基礎上，要求收回已被充公了的教會財產。他還給过我五萬克朗，囑咐我好好地保存，以備不時之需。最後，我又從雅羅里密克院長處收到代為保存的三件白法衣，從帕特林的修道院的修女們處收到九千克朗以及封在一信封中的二萬克朗。這錢是爲了達到非法目的而用的。”（轉向被告），你對這段供詞有什麼可說的嗎？

雅羅里密克：這些文件是我交給她保存的，此外，還有五萬克朗的款子。

主席：還附帶有一個補充說明吧？

雅羅里密克：這些話我記不清了。

主席：然而華特洛伐却供認得很清楚。這証實了你從事破壞活動的事實。沒有問題了，我宣告休庭，下午一時三十分再繼續。

被告雅安·奧帕塞克受審經過

主席：我們將進行被告雅安·奧帕塞克的訊問。請被告上前來。

(被告入席。)

主席：是被告雅安·奧帕塞克嗎？

奧帕塞克：是的。

主席：你的教名是阿納斯塔修斯嗎？

奧帕塞克：对的。

主席：你是普勒羅夫的本篤修道院院長，前居布拉格布列夫諾夫馬克斯卡街一號。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生於維也納城。獨身，捷克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除了小學以外，你進了八年中學，經入學考試後在布拉格修了兩年神學，又在羅馬研習了三年。

奧帕塞克：对的。

主席：你每月收入多少？

奧帕塞克：每月大約一萬克朗。

主席：在進行審問之前，我有責任向你指出，如果你承認了你的全部破壞活動，對你是比較有利的，因為認罪是減刑的條件。

奧帕塞克：我願意這麼做，並願以懺悔的心情承認我的罪行。我有必要說明一下我的歷史，主要的是我与梵蒂岡的關係。在布拉格修了兩年神學後，我的上司多密尼克·普洛克普院長送我去羅馬研習了三年。我在梵蒂岡學會了為天主教的權勢而鬥爭，仇視社會主義和一切進步事物。

主席：你什麼時候從羅馬學習回來的？

奧帕塞克：是一九三八年。那年我就受命為布列夫諾夫修道院的副院長，後來當我三十四歲時，我升為該院院長了。我不否認，我還會企圖在教會中謀取更高的地位。我親眼見到教皇是個全權統治者，除了那些直接給梵

蒂岡以組織上援助的人外，他在教會中是唯我獨尊的。

因此，我參加了反人民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鬥爭。

檢察長：梵蒂岡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奧帕塞克：是保全梵蒂岡在各國的統治地位——實質上，我們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當我最後一次去羅馬時，我與教廷代表們屢次商談此事。一九四八年春，我在這些會談中發現梵蒂岡在當時也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地相信，一九四八年的二月事件會在捷克斯洛伐克釀成有利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永久變革。然而，這件事失敗了。

主席：你的這一段供詞有什麼具體根據呢？

奧帕塞克：根據我的羅馬之行。從一九四五年起，我曾先後去過羅馬五次。教皇曾經特別接見過我。我與他曾長談過。

主席：這次謁見教皇是怎樣實現的呢？

奧帕塞克：事前，我與教皇顧問們，諸如教會非常事務和政治事務顧問塔狄尼大主教、禮儀部負責人克來門·密卡拉紅衣大主教、尤根·狄塞倫紅衣大主教、國務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負責人之一的巴非勒主教，繼而與修會部秘書帕塞多主教及副秘書拉羅納談過這事。這些晤談使我了解到，梵蒂岡實際上在二戰時期，甚至在二戰以前就在政策上反對蘇聯和各斯拉夫國家。梵蒂岡或教皇本人曾兩次從中促成納粹德國和西方列強兩方面的談判，以便達到組織反蘇聯盟的目的。我相信，一九四一年的那些談判的一部分是通過耶穌會會員來帕的媒介而進行的。這談判並沒有得到結果，我知道他們還通過英國的哈利法克斯勳爵的幫助，進行談判。這是

我从以上那些梵蒂岡官員那裏獲得的情報。

主席：你談到教皇庇護十二世在這種談判中的政治主動性。

奧帕塞克：是的，因為教皇庇護十二世是個純政治性的人物。這是出自他的一貫傳統的；他終身致力於教會外交事業。他曾經當過國務部官員，後來是駐慕尼黑和柏林的特使，又為國務大臣，而現今大部分時間他都以政客的姿態出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庇護十二世並未聘任國務大臣，而親自領導梵蒂岡的政策。當然，他也有顧問囉。

主席：這些顧問都有誰？

奧帕塞克：教皇有一個教會政策問題的特別顧問會議，除此以外，還有許多長期顧問。這些顧問有塔狄尼主教、孟丁尼主教等所謂的官方顧問，此外還有些非官方的顧問，就是我曾提起的耶穌會會員來帕，他在名義上是耶穌會大學的教授。另一個也是德國人，即卡司主教。後者在一九四五年由教皇派至西德去改組前中央黨。

檢察長：據我所瞭解，西德天主教黨是在教皇及其密使的直接領導下改組的？

奧帕塞克：是的，卡司主教就是為了這事而被教皇派去的。

他今天真正成為西德政府和羅馬之間的聯絡員了。

主席：請繼續談下去。你曾提及梵蒂岡和美國之間有某些聯繫。

奧帕塞克：教皇把全部信心都寄託在西方的，亦即美國領導下的西方列強與東方的，亦即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之間的武裝鬥爭。我自己也指望戰爭。

檢察長：梵蒂岡究竟要用你所談到的戰爭來幹什麼呢？

奧帕塞克：梵蒂岡要在梵蒂岡政策的基礎上建立一個中歐國家聯盟，此項政策在意義上與古代的君主專政如出一轍。

主席：你在供詞中說明了，梵蒂岡領導教會向一切進步勢力作鬥爭。具體說來，到底是誰在領導這鬥爭呢？

奧帕塞克：這鬥爭是由梵蒂岡國務部領導的

主席：國務部又根據什麼來決定教會在這一國或那一國中所進行的工作呢？

奧帕塞克：任何一個內行的人都很清楚，這是根據廣泛和全面的間諜資料來決定的。國務部是世界各地情報的匯集中心。我所知道的間諜機構首領之一就是巴非勒主教，另外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斯拉夫國家內耶穌會的情報機關首領是克羅地亞人、耶穌會會員卜西倫，對他我也很了解。

審判員：梵蒂岡怎樣使用這些情報呢？

奧帕塞克：梵蒂岡除用其中一部分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進行鬥爭外，也將它們，特別是軍事性的報告轉送到美國去。這件事是一個羅馬的巴西聯合修會會員、梵蒂岡廣播電台烏克蘭部負責人可古特修士告訴我的。可古特與駐羅馬的美國大使館新聞處的領導人有關係，並將國務部的報告轉遞給他。

檢察長：那就是說，從國務部到美國的銀行家結成了一個與所有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相敵對的陣綫。

主席：讓我們再談談你晉謁羅馬的事。你談一下這事是怎樣發生的。

奧帕塞克：那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間的事。當我到達羅馬時，我首先請耶穌會會員來帕替我約定時間謁見教皇。

在會談中，我呈給了教皇一個關於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經濟、軍事情況的綜合報告，其中特別着重的是天主教會在我國的地位問題。

主席：你怎樣說明這種地位的呢？

奧帕塞克：我說明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改革已經動搖了天主教會的地位，同時也動搖了梵蒂岡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我表示對我們是否可能用什麼方法來恢復原來的狀態一事非常擔心。

主席：庇護十二世對此的反應如何呢？

奧帕塞克：教皇授意，我們在反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決不會是孤立的。

主席：他沒有再給你解釋這句話嗎？

奧帕塞克：沒有。但後來在一九四六年的競選運動中，當梵蒂岡指示主教及我們所有的人要盡全力支持人民黨的反動分子和斯洛伐克民主黨時，我才体会到這句話的含意。

主席：你將有關捷克斯洛伐克情況的報告只呈給教皇一個人了嗎？

奧帕塞克：不。當我正式請求謁見教皇時，我還把報告遞給了我們修會總長德·斯多琴簡。我首次晉謁羅馬時，就是他指導我進行情報活動的。

主席：現在談你的間諜活動。你的報告都是屬於那些種類的？都給了誰？

奧帕塞克：報告主要包括有政治性和經濟性的、有關二年計劃和五年計劃的、對外貿易、居民的反映，後來還有些關於非法組織的報告。我把報告搜集起來，都在幾次晉謁羅馬時交了上去。

主席：你把这些報告都交給了斯多琴簡一個人嗎？

奧帕塞克：不，後來我還給過他的繼任人伯納德·卡林。我給這兩個人一般情況的報告。對別的人如塔欽尼主教、本篤大學神學院院長韋士特修士、首席院長秘書巴許修士、克里曼·密卡拉紅衣大主教、弗蘭狄塞克·許華申堡以及從國內逃跑的雅羅密·馬丘拉修士等人，我只回答他們問我的問題。此外，我還供給梵蒂岡廣播電台發言人以有關捷克斯洛伐克的捏造的報告。

主席：你從梵蒂岡回來時，帶了些什麼消息呢？

奧帕塞克：一九四九年，在我離開羅馬之前，我在寓所中接見了巴西修會的長老莫斯科夫，他請我給在聖·克萊門的希臘正教本堂司鐸格拉伐茨帶信，因在我去時，格拉伐茨曾託我帶給莫斯科夫一個封口的信封。回到布拉格以後，我交給格拉伐茨以莫斯科夫有關梵蒂岡指示希臘正教教會加強反對人民民主制度的信。

主席：你還沒有招供你全部的破壞活動。這些活動，通過文件對法院來說，已經很清楚了。

奧帕塞克：還沒有完全供出。在我前次晉謁羅馬時，我見了雅羅密·馬丘拉修士。他告訴我，他在教皇顧問孟丁尼直接指示之下在梵蒂岡情報機關工作。他將通過弗蘭狄塞克·許華申堡而得到的華盛頓來的報告遞給了梵蒂岡；又通過弗蘭狄塞克·許華申堡將從孟丁尼處得來的軍事報告、情報指示和其他的東西轉交給華盛頓。馬丘拉還請我替利普卡和真克爾帶信給白倫大主教。他給了我一封信，但告訴我不便隨身攜帶。我只得口頭傳達了這封信的內容。

主席：這信的內容是什麼呢？

奧帕塞克：實際上，信的內容是說在利普卡和真克爾所參加的所謂“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會議上，白倫大主教和教廷的反人民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態度得到了承認和讚許了。又說到，在情況轉變後，大主教白倫和天主教會將因其立場而受重賞。

主席：再談談你幾次晉謁羅馬和呈遞給梵蒂岡報告的事。你的情報都從哪裏來的？

奧帕塞克：我有我的情報員。前編輯雅安·席諾斯特口頭給过我政治和經濟情報，此外，他還給我作過七個內容豐富的報告。我在佈道時就利用了這些報告。我還送過一份給伏西爾斯卡街“天主教行動會”辦事處的曼德爾博士，將其翻印並秘密地散發至全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還有呢？

奧帕塞克：我的第二個情報來源是神學生吉利·卡德雷克。我在一九四〇年就與他相識。直到一九四八年他與布列夫諾夫的神學生哥夫通一同潛逃國外了。爲了幫助他們逃跑，我從修會基金中抽出二千元克朗給他們。我的第三個情報員是我的僱員，布列夫諾夫的建築師斯坦尼斯拉夫·蘭格。他是布爾諾的修士保羅的地下破壞小組組員。除此而外，我還從主教府諮議員庫拉契、波卡爾主教及蓋伯里修士那裏獲得情報。

主席：被告波卡爾，你對剛才所聽到的發言有什麼可說的嗎？

波卡爾：是的，那是正確的。

主席：被告庫拉契，你對所聽到的供詞有什麼可說的嗎？

庫拉契：那是真實的。

主席：你談了利普卡和真克爾給白倫大主教信的內容。但

是，你還沒有說用什麼方法將信帶給白倫大主教的呢。

奧帕塞克：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當我從梵蒂岡回來時，我就去大主教公署中拜訪了白倫大主教。從一九四七年以後，我常常去那裏拜訪他的。當我把信交給他時，他欣然收下了。

主席：你常去拜訪白倫大主教嗎？

奧帕塞克：第一次拜訪他是在一九四七年。有一次应邀去訪時，白倫大主教叫我做他的官方代表，去波蘭參加在格尼茲諾舉行的聖·阿德勃特聖典。我於是去了波蘭。

主席：那是什麼時候？

奧帕塞克：一九四七年四月。我在波蘭共呆了兩星期。回來後，曾向大主教彙報了一切。當在波蘭時，我幾乎接觸到了所有聚集在格尼茲諾參加聖典的主教們，我又將波蘭主教們的反動意見報告了白倫大主教。

主席：這是怎麼回事？請詳細說明。

奧帕塞克：首先，紅衣大主教格龍德和沙匹加毫無忌諱地宣稱，這聖典實際上是組織起來反對波蘭人民民主政權的示威。大主教白倫對這報告頗覺高興，且表示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的聖·阿德勃特聖典能採取同樣的做法。

主席：白倫大主教和你這麼隨便談話嗎？

奧帕塞克：大主教白倫和我談話一向都很隨便，從來不隱瞞他對現政權的仇視。他明白地囑咐过我，要遵循教皇的指示。他說，這些指示實際上就是顛覆人民民主制度最理想的指示。

主席：大主教知道你的陰謀活動嗎？

奧帕塞克：他知道的。因為，一方面，梵蒂岡直接把消息告知他；另一方面，駐布拉格教皇聖使館的官員們也告訴他。他告誡过我，叫我在陰謀活動中小心謹慎，因為他所設保安當局已經得悉了。我問他從誰那裏得到這情報的，他告訴我是從經常給他這類情報的神學教員朱利克處得知的。大主教白倫自己也頒發破壞活動的指示。我從“聖·万塞拉聯盟”的主席揚德博士處得知，大主教常親筆草擬傳單、諭令和其他報告等，交給他秘密翻印後，再讓“聖·万塞拉聯盟”散發。我自己也幾次從他那裏收到這樣的陰謀破壞的印刷品。

主席：你怎樣處理這些東西呢？

奧帕塞克：我將這些東西抄下來，把他們釘在布列夫諾夫修道院的大門上。揚德也告訴过我，他常與大主教區的“天主教行動會”的秘書直接商談，這樣，一件事就毋需費兩道手續了。

主席：這才是一種分工的辦法呵。

奧帕塞克：一部分是由揚德做的，另一部分是由伏西爾斯卡街的曼德爾幹的。

主席：被告曼德爾，你聽到有關你本人的供詞了。對嗎？

曼德爾：對的。

主席：你有問題要問或解釋的嗎？

曼德爾：沒有。

主席（對奧帕塞克）：繼續談下去。

奧帕塞克：在大主教指示下所散發的告教徒書和傳單唆使信徒們反對政府，並使神甫們利用講壇，向人民民主政權進行鬥爭。有一次，大主教告訴我，他從駐布拉格聖使館人員處獲得情報和進行反共和國活動的諭令。我

可以肯定，有幾次當我進大主教公署去拜訪大主教時，曾碰見遜西主教從公署中出來。主教府諮議員庫拉契在一九四九年夏季告訴过我，駐布拉格聖使館的領導人德·利華每星期秘密訪大主教一次。

主席：被告庫拉契，你聽見了這話，對嗎？

庫拉契：對的。

主席（對被告奧帕塞克）：你自己是否也和聖使相勾結呢？

奧帕塞克：主席先生，我也同樣和聖使相勾結的。

主席：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奧帕塞克：從一九四五年開始的。我送報告去那裏，但多半是口頭報告的。從我與聖使館負責人員談話中，我認識到他們是領導教會反對人民民主政權的，他們接受梵蒂岡反對政府的諭令，又依次傳下去。

主席：這表示你博得這些人的信任了？

奧帕塞克：我確實得到他們的完全信任。他們从不隱瞞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任務。

主席：在這方面，教會用什麼方式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活動呢？

奧帕塞克：我們教廷的破壞活動，特別是在二月以後，主要是採取發指示和命令給那些在當時對二月事件後政府的社会等措施表示關懷和贊同的下層神職人員。在教會懲罰、開除教籍、停止聖職等威脅下，這些指示禁止任何有利於人民民主政權的活動。以白倫大主教為首的教會所頒發的傳單和指示，強迫神甫們濫用講壇為破壞活動服務，煽動信徒們反抗國家法令，又強迫他們絕對服從主教和梵蒂岡。這是我所參加的破壞鬥爭和工作方法中的一種。我曾親自在布列夫諾夫的聖·瑪

格麗特教堂中宣讀過這些告教徒書和傳單，並指使布列夫諾夫的神甫們也同樣地宣讀這些破壞性的傳單和告教徒書。

主席：你知道所謂“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活動及其目的嗎？

奧帕塞克：我承認，“天主教行動會”活動的目的在於推翻現政權，恢復資本主義。

教皇的“天主教行動會”是一九二六年由教皇庇護十一世建立起來的，以便作為一個其主要目的在反對社會主義的龐大的組織而在世界各地進行活動。在該組織受過訓的和受過教導的分子們便滲入各工作地點，進行活動。我知道好幾個非法小組的成立，這些小組就是進行破壞活動的據點。其中有一個小組，早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就在多密尼克會的修士加本領導下進行活動了。

主席：被告，你知道恩克納這個人嗎？

奧帕塞克：知道的，主席先生。他是布拉格總主教區的一個神甫。一九四八年的一天，他來訪我，告訴我在白倫大主教的命令下，他已經匿名潛入克拉德諾鋼鐵廠中工作了幾個月，這樣可以不暴露他的神職人員的身份而試圖進行陰謀活動。同時，他又假裝忠實於人民民主政權。他還告訴我，他已向白倫大主教彙報了他在克拉德諾的活動，並按照大主教的指示行事。

主席：你知道關於吉利·斯伏波達修士一些什麼？

奧帕塞克：吉利·斯伏波達修士曾親自帶給我幾份非法傳單和告教徒書。

主席：那是什麼時候？

奧帕塞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後給我的。他告訴我，他也積極從事着反政府的破壞工作，直接听命於布拉格總主教區的白倫大主教。吉利·斯伏波達在那一次還告訴我，他曾在破壞活動中勾結聖·喬治的隨營司鐸馮·德拉和比爾森的副本堂約瑟夫·萊斯勒。當時，他还提及，在草擬某些煽動性的傳單中他还勾結了雅羅里密克院長。一九四九年九月，萊斯勒被逮捕後，他來找我，表示擔憂他也可能被捕。我告訴他，應該非法潛逃國外，在那裏進行破壞活動可能容易些。斯伏波達表示，他將听从我的忠告，並將通過他的同學尼爾斯哥的本堂司鐸的幫助而潛逃。究竟逃跑成功沒有，我也不知道，因為隨後我自己就被逮捕了。

主席：你自己與雅羅里密克院長有關係嗎？

奧帕塞克：有的，主席先生。我同樣也勾結過雅羅里密克院長。從一九四五年起，我們經常在斯特拉霍夫會晤，有時雅羅里密克院長隨同泰若夫斯基和馬加爾卡院長來布列夫諾夫看我，討論如何進行陰謀活動。雅羅里密克與我彼此從來不隱瞞對現政權的憎惡。

主席：其他的聖部或修會的長老也與這陰謀活動有關係嗎？

奧帕塞克：有的，主席先生。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各修會長老在布拉格三區尼魯多伐街贖世主修道院舉行了一個秘密會議。除了主席耶穌會的省長錫爾根之外，參加會議的還有贖世主會省長蘇可米爾、法蘭西斯會省長托波拉、多密尼克修道院長班納茨和許多教會長老。在會議二小時中，我們同意並決定了各修會的團結一致，進行反對政府及現政權的鬥爭，並將在此活動中支持各主教和教皇，無條件地服從他們的命令。我把這次會議

的情況向白倫大主教一一彙報了，大主教也十分贊同。
主席：你與伏西赫院長有關係嗎？

奧帕塞克：我和愛馬斯修道院院長伏西赫也有過接觸。大約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伏西赫曾經告訴我，有一個在他的參與下在愛馬斯修道院聚會並從事破壞活動以瓦解“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聯盟”的青年小組，曾闖入斯羅伐街“青年聯盟”書記處搗亂。他告訴我，他將隱藏一個時期，請我在他有立即被逮捕的危險時去通知他。以後，我听得要逮捕他時，就去通知了他。過了六星期，我接到從外國來的一個署名為莫拉斯（伏西赫的教名）的明信片，於是我才明白，他已經非法潛逃國外了。

主席：你還和什麼別人勾結過嗎？

奧帕塞克：大約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我的僱員，建築師蘭格告訴我，前人民黨國會議員波登·休多巴在布拉格到處隱藏，打算逃跑。我告訴蘭格，休多巴應該來找我。過了幾天，休多巴果然來布列夫諾夫修道院來找我了。他決定要逃跑，請我幫助他。我和我的同謀者蘭格及檔案管理員塞羅夫斯基共同商討了這件事。我們替休多巴想出了一個辦法，讓他逃跑。休多巴還請我供給情報，以便其在國外使用，我答應了。

主席：你只替梵蒂岡進行情報活動嗎？

奧帕塞克：不，主席先生，我還為了情報而勾結過比利時情報員波讓和法國特務弗利波將軍。

主席：你們怎樣建立關係的呢？

奧帕塞克：大約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駐布拉格的比利時新聞通訊社代表兼比利時的“自由比利時報”的通訊員波讓來布列夫諾夫修道院找我。他向我索取情報和報告，隨

後又先後來修道院訪問了十次。我把从白倫大主教處獲得的傳單和諭令給他看，波讓做了摘錄。波讓和我約定，我們之間的暗号爲“玫瑰和空谷水仙”。

主席：現在還有馬里昂·雷赫。這姓名能引起你什麼回憶嗎？

奧帕塞克：由於里爾的大主教，亦即利納特紅衣大主教的推薦，馬里昂·雷赫从法國來到捷克斯洛伐克。她与總主教區的“天主教行動會”相勾結。一九四九年五月，她來找我，並告訴我，她正在搜集各種間諜情報。我又通過波讓將利里翻譯的報告送給我們在比利時的聖·安得烈修道院院長尼微。我又讓她与波讓接觸。

主席：你已經談過關於神學生哥夫通，他是你給他錢潛逃國外的。你還記得哥夫通与別人的關係嗎？

奧帕塞克：記得的，主席先生。大約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哥夫通介紹我和他的朋友、天主教人民黨的新聞記者茲坦尼克·羅特勒克相識。羅特勒克請我替他安排傳遞情報至英國的辦法，我應允了並从他那裏接到過裝有報告的一個封口的信封。

主席：你知道報告的內容嗎？

奧帕塞克：我雖然並不確實知道它們的內容，但我知道其中涉及重要問題。後來這一點更明確了。當蘭格被捕，我害怕我的屋子會被搜查時，我拆開了羅特勒克的最後一個信封，在未焚燬那信之前，我發現信中包括有重要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的情報，遞給倫敦英國廣播公司的卡來爾·布魯沙克。還有一個信封是給斐廸南·帕羅特克的。

主席：現在談談關於你与弗利波將軍的勾結。

奧帕塞克：大約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有人來布列夫諾夫修道院找我，自稱為弗利波將軍。他和我談話很隨便。他告訴我，他是法國天主教黨人。他提及前人民黨的總書記克利米克，還請我替他轉一封附有陰謀活動指示的信給江狄契卡或波布里克。

主席：你知道這些人嗎？

奧帕塞克：就我個人而言，並不知道他們，但我知道在二月以前，這兩人都人民黨內工作。當我確知江狄契卡在那裏工作後，我就打發信差將弗利波的那封信給他送了去。一個月後，當弗利波將軍再度來訪我時，我與他開始建立了聯繫，他告訴我他已與江狄契卡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在他第一次來訪時，為了要掩飾真實的目的，免得被保安當局察覺，弗利波將軍曾從修道院圖書館借了幾本書。

主席：為什麼？

奧帕塞克：那樣做，可以辯解為他只是為了借書而來的。

主席：你怎樣與霍斯狄契卡建立關係的呢？

奧帕塞克：一九四八年九月或十月，前古物保管處處長華格納博士來見我，還帶了個陌生人來，他把這個人介紹給我，說是他的朋友、革新人民黨的法律顧問霍斯狄契卡博士。霍斯狄契卡要求我與他建立非法合作。我答應了，並且實現了我的諾言。

檢察長：我建議把他在密拉達·霍拉可伐及其同謀案件中當証人時的供詞拿給被告看。這些文件，我在書面備忘錄上曾引証過作參考的。

主席：這是你親筆簽名的供詞筆錄。它是與你在霍拉可伐審訊中的口供相符合的，你現在身為被告，有什麼地方需

要修正的嗎？

（交記錄給被告審閱。）

奧帕塞克：這供詞是由我簽署的，與事實相符合，對於我與霍斯狄契卡博士和華格納博士的關係，我沒有什麼需要修正的了。

主席：你為什麼準備非法潛逃呢？

奧帕塞克：因為我害怕被逮捕，主席先生。我有許多陰謀活動的夥伴們都被逮捕了，因此我在家裏做了預防的佈置，當保安當局來修道院時，便於逃跑。

主席：你在這方面怎樣做的呢？

奧帕塞克：我裝置了一個特別警鈴，從門房直通我的書房，這樣當保安當局來人時，僕人便可以警告我。除此以外，我又告訴他在距離布列夫諾夫修道院門口不遠的帕洛霍斯卡烟攤上某處放幾顆鋼釘，以便在保安當局來搜查，而我還在城裏時警告我。

主席：這怎麼進行的呢？

奧帕塞克：大約在六月二十日，刑事警察到修道院來，我吓慌了，誤以為是國家保安機關人員，因而離開了修道院。我乘車上布拉格，到處躲藏，如尼塔歇洛夫博士家、來茲納博士家、最後在波讓家中。在我上次去羅馬之前，我就怕會被逮捕了。當在梵蒂岡時，我就害怕會有逮捕我的拘票來。在這樣一個危險狀態發生時，我的朋友卡格爾就要給我發個假電報，說我母親病了或出了類似的事情，那末，我就可以不回來了。我還請這位卡格爾給我佈置了一個安全的海關檢查辦法。

主席：為什麼要安全的海關檢查辦法呢？

奧帕塞克：我戴了一個鑲有紫水晶金鍊子的院長十字架。我

將這藏在羅馬本篤會修道院中了。

主席：在你的案件中藏匿寶物的情況怎樣？

奧帕塞克：作為一個宗座總理，我管理了布羅莫夫修道院。

我將布羅莫夫的寶物移運至布拉格的布列夫諾夫修道院中。我請金飾匠阿波林拉·斯第波挑選了最珍貴的物品，那就是價值一百多塊金元的院長戒指和一些聖器。

主席：這裏有張清單，與你現在所列舉的符合嗎？

（將文件交被告審閱。）

奧帕塞克：符合的，主席先生。

檢察長：請看這張像片，你所藏匿的東西都被發現了。（將像片交給被告看。）

奧帕塞克：正確的。

主席：還有關於那金飾匠的一些事。

奧帕塞克：我的朋友阿波林拉·斯第波金飾匠將布羅莫夫和布列夫諾夫修道院中最有價值的寶物挑選出來。我叫斯第波花一萬克朗假造了一個最寶貴的斯蒂芬·勞亨斯脫勞切爾院長的十字架。我將原來的十字架藏起來，而將假的放在那裏。

主席：還有什麼問題要詢問被告嗎？沒有了。雅安·奧帕塞克的訊問在此結束。被告，你可以坐下。

由於檢察署的書面建議，法庭准予引用國家法院第 Or I 73/49 號關於卡勒爾·弗洛夫及其同謀案，Or II a 316/49 號關於約瑟夫·保羅案，Or II a 309/49 號關於波格斯拉夫·庫卡爾及其同謀案，Or II a 494—496/49 號可斯特爾卡及其同謀案，Or II a 314/49 號關於伏依特克·江狄契卡

及其同謀案, Or I b 179/49 号關於茲坦尼克·羅特勒克及其同謀案, TSI/IV 46/50 号關於伐茨拉夫·華格納及其同謀案, Or I/VII 65/50 号關於密拉達·霍拉可伐及其同謀案, Or I/VII 81/50 号關於奧格斯丁·馬加爾卡及其同謀案和布爾諾區法院第 T IX 145/49 号關於安东尼·雪米克及其同謀案的案卷作証。

爲了要刻劃出教會及其分支的全部活動情況, 必需說明案卷中下列各節: 从布拉格國家法院關於卡勒爾·弗洛夫及其同謀案的案卷中, 可以看出梵蒂岡及其間諜如何幫助本查、班達、休多巴等叛徒的潛逃。这些罪犯的潛逃是由布列夫諾夫修道院及前國家保安部隊人員雅安·皮特博克——其罪行已由被告庫拉契敘述——的幫助而造成的。弗洛夫自己則通过茲諾伊莫的多密尼克修道院及其院長雪米克的幫助而潛逃國外。他和其他叛徒潛逃後, 又在休多巴和文森上尉所領導的法國情報機構駐奧地利的間諜站受訓三個星期。

關於約瑟夫·保羅和伐茨拉夫·蘭格的案卷, 証明了休多巴的潛逃國外及其情報活動的開端与被告奧帕塞克在法庭上所供的一樣。

關於波格斯拉夫·庫卡爾案, 可斯特爾卡及其同謀案和江狄契卡及其同謀案的案卷說明了所謂“奧來地下組織”。這三個小組同爲外國所領導的破壞、情報及恐怖組織的一部分。这些小組的後台就是教會。做爲三個小組的領導小組的江狄契卡小組, 与教會高級代表們和以弗利波將軍及文森上尉爲首的法國情報機構直接相勾結。奧帕塞克充當其聯絡員。江狄契卡又与反共和國陰謀破壞的头子們取得联系, 其直接的联系人就是霍拉可伐。

奧帕塞克还与主要活動於摩拉維亞的茲坦尼克·羅特勒克情報小組保持联系。这小組所獲得的情報，正如他自己所供認的一樣，由他轉送到倫敦。

其次，關於華格納博士案証明了，在江狄契卡被捕後，奧帕塞克与其後繼人霍斯狄契卡建立了联系。奧帕塞克还讓霍斯狄契卡与教会最高代表接觸，另一方面，他自己則通过華格納認識了特務加塞克，又直接与美國情報機關“反間諜情報組織”發生關係。

反政府叛逆陰謀的頂點，是霍拉可伐及其同謀案中所判處的領導分子們的罪惡活動。这小組的活動已經十分清楚了。因此，我只說明奧帕塞克与之相勾結的霍斯狄契卡博士，在这次審判中是作為陰謀活動領導分子之一而被判處叛國罪与間諜罪的。

布爾諾區法院關於雪米克院長案的材料証明了边境的修道院——本案所指係茲諾伊莫的多密尼克修道院——乃是叛徒及間諜非法越境的棲身之所。

國家法院關於馬加爾卡及其同謀犯等教会长老的案卷，充分証明了修道院的罪惡行為。这些案卷的內容已經非常明確，這裏所要說明的是僧侶小組領導人奧帕塞克和雅羅里密克二人直到現在才受到法律制裁。

（主席說明这些案卷的內容，以刻劃出各被告和教会的全部罪惡活動。）

主席：还有什麼問題或解釋嗎？——沒有。——我宣告休庭，明早八時繼續。

証人的証詞

主席：休庭之後，我們現在繼續審訊。昨天對各被告的詢問已經告結束。請問，還有什麼建議嗎？

檢察長：我請求法庭對我所提出的關於証人的書面建議作出決定，同時對我所提交的証據加以考慮。

主席：法庭將考慮這一建議，在考慮期間，我宣告暫時休庭。

（法官退席商討。商討後，主席重新開庭審訊。）

主席：經過秘密商討後，現在我宣佈決議，法庭準備接受檢察長的建議。根據他書面建議中所指出的各種情況，亦即各被告所犯的罪行，將傳訊以下証人：伏拉納、芬克、莫席節克、利茲卡、米卡勒克、布拉別克、湯姆素、柏拉尼克、羅森納、斯克勒納、塞羅夫斯基和茲姆茲利克。

証人約瑟夫·伏拉納的証詞

主席：我請証人、克羅墨利茲的大主教修院教員約瑟夫·伏拉納入席。

（証人入席。）

（主席在依法予以警誡及其他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証人，你还記得被告雪拉給过你一些什麼指示嗎？

伏拉納：一九四七年，主教雪拉命令我去見他。當時，我是阿羅木茨總主教區教士聯合會的行政秘書。雪拉告訴我

說，教會財產國有化的結果將使教會喪失其勢力與地位。爲了這個原因，保護教會財產乃是神職人員的責任。因此需要利用教士聯合會的組織，來影響阿羅木茨總主教區的神職人員，以便使他們能在教堂中盡力影響信徒們，从而使信徒們也起來保護教會財產。

主席：雪拉博士還給過你什麼別的指示嗎？

伏拉納：雪拉博士還向我指出過，教會將由於“新教育法案”的制訂，而喪失其在青年中的勢力，所以我們得組織反對這一法案的運動。

主席：這兩件事究竟怎麼會牽涉到被告雪拉和教會中其他有關分子呢？

伏拉納：實際上，就是想設法恢復舊制度。

主席：關於經管教會財產事務的所謂經濟立法諮詢委員會你知道些什麼呢？

伏拉納：這委員會的成立，是爲了防止“土地改革修正法案”按照政府所提出的方式通過。這委員會的主席是斯特拉霍夫修道院院長雅羅里密克博士，委員中有布拉格總主教區產業管理人可夫博士、阿羅木茨總主教區產業管理人格來格、布列斯勞總主教區產業管理人尼克斯卡博士、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管理人司徒利克、布拉格議會的產業管理人波勃、維塞格拉德議會的主教府諸議員波加茨、布列夫諾夫修道院財產代理人加夫利塞克和邊區教會財產代理人、宗教教員伏拉狄卡等。

主席：該委員會是怎樣進行活動的呢？

伏拉納：調查所有主教區的、主教會議的、修道院的和監牧區的財產，草擬備忘錄並將其提交國會議員聯誼會。白倫大主教和雅羅里密克院長兩人受命親自參加活動。

而這些活動的主要支持人則為人民黨前部長斯拉密克博士和加拉，通過他們的關係又獲得了斯特蘭斯基、真克爾等人的支持。

主席：保護教會產業而免於國有化的運動，實際上是由誰發動的呢？

伏拉納：是些教會產業的暫時所有者，諸如各主教、議會負責人、各修道院院長等，可以說，他們害怕喪失自己的財產，喪失自己的勢力，喪失自己的地位，所以用盡辦法挽救這些財產，使其免於國有化。

主席：你知道關於普勒羅夫“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事情嗎？

伏拉納：大約是一九四七年底，基金管理人卡普修士前來參加教士聯合會的會議時，曾經提出關於設法挽救一部分教士疾病救濟基金財產的建議。

主席：從那裏挽救出來呢？

伏拉納：設法使它免於被國家中央保險公司合併。卡普建議教士聯合會購買一所屬於教士疾病救濟基金所有的別墅“伏拉斯塔”。。當他知道教士聯合會沒有錢時，他提出教士疾病救濟基金中的特別款項可以用來作這筆開支，辦法是將這筆基金分散到各個個別教區，然後再由這些教區捐錢出來購買“伏拉斯塔”別墅。

主席：決定採取這個辦法了嗎？

伏拉納：是的。委員會通過了這項決議，附帶條件是卡普必需將此建議在主教會議中提出。它在取得各主教同意後，便付諸實行。

主席：（轉向被告雪拉）証人伏拉納先生所告訴我們關於你的事情都是真實的嗎？

雪拉：是的，是真實的。

主席：還有問題要詢問証人嗎？——沒有。你可以退席。

对証人西亞多·芬克的訊問

主席：我請証人前大主教顧問，阿羅木茨的聖·韋塞勒斯修道院院長西亞多·芬克博士入席。（証人西亞多·芬克被帶入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你是由於什麼活動而在國家法院中受審並被判刑的？

芬克：由於我在大主教馬托卡的命令下參加了叛逆活動的緣故。在歷次朝聖禮中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大主教在烏格斯基·布羅德、各斯丁、維勒格拉德和斯伐第·可列塞克（“聖嶺”）所召集的宗教集會中，我都曾在神父們和神長們中間散發過反政府的傳單。這些傳單的內容包含了有關執行開除教籍勅令的各項指示。這些我已經都供認過了。實際上，這就是反對所有從事建設共和國的人們。

主席：是你親自制定這些傳單的嗎？

芬克：不，這些都是事先在大主教寓所中準備好了，然後由大主教和我乘他的汽車運送到會場上去的。這些集會並不是有信徒們參加的一般的朝聖禮，事實上就是教士們的秘密會議。

主席：開除教籍勅令的目的是什麼呢？

芬克：其主要目的在於破壞我國的建設工作。方法就是對所有參加這種建設工作的人施以壓力。

主席：你還犯過些什麼罪行沒有？

芬克：我還參加了普勒羅夫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的欺詐陰謀。

主席：你可以退席了。我得指出，証人西亞多·芬克由於他

犯了剛才所敘述的那些罪行，也就是他曾在阿羅木茨總主教區的神甫們中間散發破壞性的開除教籍勅令的罪行，曾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被國家法院判決犯了叛國罪。

对証人約瑟夫·莫席節克的訊問

主席：我們將訊問下面一個証人。請証人約瑟夫·莫席節克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關於在佔領期間阿羅木茨總主教公署與納粹秘密警察之間的關係，你知道些什麼？普列江大主教知道雪拉博士去拜訪納粹秘密警察的事情嗎？

莫席節克：普列江大主教知道這件事的，並曾經加以贊許。雪拉博士擢升為主教後，他便同意我代替雪拉去訪納粹秘密警察。

主席：關於解放後翻印和散發帶有叛逆性的傳單的事情，你知道些什麼？

莫席節克：馬托卡大主教曾發給大主教樞機會議廳三種帶有叛逆性的反對政府的傳單，以供轉發到各監牧區之用。這都是些違反人民民主政府法令的東西。

主席：當時，誰是樞機會議廳的負責人呢？

莫席節克：雪拉主教。三種傳單都是由他經手的。

主席：你傳遞過些什麼傳單給主教樞機會議廳呢？

莫席節克：根據大主教馬托卡的指示，我曾經發給樞機會議廳一些傳單。其中的第一種是關於禁止神職人員參加政治活動的，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後曾以非法傳單的形式散發出來；第二種是關於教會任命事宜；第三種是關

於神職人員薪金新規定，其中包括給神職人員如何反抗該新規定的各種指示。

主席：你還知道什麼別的有關非法傳單的事情嗎？

莫席節克：是的，我還可以舉出一項一九四九年在阿羅木茨主教會後所發佈的有關天主教行動會的傳單，這一傳單是在阿羅木茨佈道部翻印的。

主席：被告雪拉，這供詞中牽涉到你個人的地方都正確嗎？

雪拉：正確的。

主席：還有什麼問題要詢問証人嗎？如果沒有，我就結束這一訊問。

對証人約瑟夫·利茲卡的訊問

主席：請証人、阿羅木茨大主教馬托卡秘書兼禮儀執事約瑟夫·利茲卡博士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關於阿羅木茨大主教和駐布拉格聖使館間的關係，你知道些什麼？他們用什麼方式保持這關係的？

利茲卡：有許多機密信件從阿羅木茨送到布拉格的白倫大主教和聖使館。這些信件的傳遞，是由我親自佈置而由秘密信差執行的。

主席：由誰來擔任這項秘密信差工作呢？

利茲卡：由馬托卡大主教親自指定，或者由我來挑選我所認為適當的人，如勃雷托博士和德孚查克博士等。關於使用信差的聯系辦法，我是這樣佈置的：我先從大主教那裏把信件接過來，然後由我親自將信送給收信人，或採取轉遞的辦法。擔任阿羅木茨大主教和布拉格的大主教與駐布拉格聖使館之間的聯絡人，乃是布拉格的耶

蘇會省長錫爾根。

主席：你还犯了一些什麼其他罪行？

利茲卡：根據馬托卡大主教的指示，我曾替大主教區的神長們草擬過全權秘密委任書。除此以外，一九四九年托馬歇克博士受大主教之命被任爲主教時，我曾與助理秘書普拉塞克和御侍普羅格利達參加典禮。舉行典禮時所宣讀的委任令是由德·利華簽署的。

主席：沒有問題了罷？你可以退席。

對証人阿露瓦·米卡勒克的訊問

主席：我請下面一個証人、大主教秘書、布爾諾區禮儀執事阿露瓦·米卡勒克博士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布爾諾主教區散發旨在反對我國人民建設工作的傳單的？

米卡勒克：早在一九四六年選舉以前，就散發過一封各權力人的聯合告教徒書，勒令教徒們僅選舉保護天主教上層神職人員利益的黨派。後來，卡來爾·斯古匹主教又發出了一張傳單，禁止神職人員參加政治活動或加入民族陣綫中的任何派別。

主席：你还記得一九四九年六月所散發的一封告教徒書嗎？

米卡勒克：這封告教徒書的原稿是由主教從白倫大主教所召集的會議中帶回來的。後來我們也將這份告教徒書加以翻印，分發到布爾諾主教區的各監牧區去。我又曾散發過一九四九年八月大主教馬托卡博士所頒佈的開除教籍勒令的傳單。

主席：你也進行過間諜活動沒有？

米卡勒克：一九四八年十月，奉主教之命曾替梵蒂岡草擬過一個報告，內容包括幾項有關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經濟情況的秘密材料。後來，主教把這報告交給了聖使館。

主席：你在这方面還進行過一些什麼別的活動？

米卡勒克：同年十一月，我給聖使館寫過一份有關神職人員的反政府活動情況的報告。

主席：關於全權委任書的事情呢？

米卡勒克：我知道，主教斯古匹博士曾接到過秘密指示，授權給他指定一個秘密代理人，同時，在聖使館停止工作期間及在與羅馬間的聯繫發生困難的期間，他具有特殊權力。這個全權委任書是在福爾尼主教離開後，由繼任聖使館負責人德·利華簽署的。

主席：還有問題要詢問証人嗎？沒有了嗎？你可以退席。

對証人斯坦尼斯拉夫·布拉別克的訊問

主席：我請下一個証人、契斯克·布德索維塞的主教秘書斯坦尼斯拉夫·布拉別克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在教會反對現政權的非法活動中，你幹了些什麼？

布拉別克：我曾經翻印和散發過各種非法印刷品，其中大部分是契斯克·布德索維塞的主教格盧克博士親自從布拉格、阿羅木茨或其他地方所舉行的秘密主教會議上帶回來的。叛逆活動的指示是由格盧克博士本人或主教府秘書湯姆素給我的。湯姆素還幫助我將反政府的叛逆印刷品分發至各監牧區。

主席：你知道所謂簽名運動的事情嗎？

布拉別克：在我們主教區中，簽名運動是在主教本人親自發

動之下組織起來的。神職人員對主教必須絕對忠誠和服從。這運動在契斯克·布德索維塞的執行人是院長馬利。他派遣了兩個神學生去訪問所有的神職人員，讓他們簽名。整個說來，運動的目的在於向政府挑釁。

主席：當然，你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囉。

布拉別克：我得服從我的主教。

主席：你知道所謂“薩維什十字架”的事情嗎？

布拉別克：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金十字架，其歷史價值超過物質價值。這十字架一向是放在主教區公署中的，後來格盧克主教命令他的僕人別加夫卡將它藏到屋頂閣中去了。

主席：在你們主教區中還發行過一些什麼別的非法和敵對的印刷品沒有？

布拉別克：以我們主教區而論，我們曾發行過幾種類似這樣的东西。一九四八年春，我以多密·布可伏斯可的管理人身分接到過一份禁止神甫們和神職人員參加政治活動與擔任公共職務的非法傳單。另外還有一份有關神職人員薪金新規定和開除教籍勅令的傳單。格盧克主教把這些傳單從特爾納發的主教會議中帶回來，然後命令我和湯姆素二人在室內將其翻印出來。這些傳單中的一部分，當格盧克主教訪問各拉茲多維斯及其附近監牧區時，由他自己帶去散發了；另外一部分則由主教府秘書湯姆素秘密攜帶到神學院中，分發給專為這事而召集起來的神職人員。後來，這些非法傳單又被大量地翻印了，以備各監牧區之用。

主席：還有問題嗎？沒有了。証人可以退席。我宣告休庭十五分鐘。

(短暫的休息後。)

对証人卡來爾·湯姆索的訊問

主席：我們將繼續進行証人的訊問。請証人、契斯克·布德索維塞的主教府秘書卡來爾·湯姆索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在教會的反政府活動中你幹了些什麼？

湯姆索：鬥爭的方式和方法均由白倫大主教、其他主教們和這次出庭的各被告共同擬定的。我只不過是他們命令的執行者而已。從一九四八年起，便有大批帶有破壞性的傳單和指示送到契斯克·布德索維塞的樞機會議廳來。我根據主教格盧克博士的指示在教區中散發這些傳單，有時也通過充當信差的神甫們發散出去。我又將傳單送到個別代牧區去，由它們再往下發。

主席：這些印刷品的內容是什麼呢？

湯姆索：首先是禁止神職人員參加政治活動，使神職人員不可能在人民委員會等組織中與人民共同合作。這樣做，是為了表示主教們對人民民主政權的敵對態度，同時也企圖藉此製造一個印象，使人們感覺到這是整個教會，而非單獨教廷的態度。與此敵對性質相類似的傳單，乃是主教格盧克博士所發佈的有關教會產業贖買的傳單。根據這一傳單的指示，神甫們得影響土地改革委員會的委員們和一般信徒們，以達到破壞“農業法案”和保全教會產業的目的。這樣一來，佔有少量土地的農民權利將實際受到影響，而土地所有權將由教會中各高級教士掌握。此外，格盧克主教還就屬於政府所有的其他財產發出過一張傳單，要求神職人員阻撓這

一法令的執行，故意不作全面的統計，或在未向主教請示之前不進行統計。

主席：你知道所謂薩維斯十字架事件嗎？

湯姆素：這十字架價值幾百萬克朗。格盧克主教命令把它藏起來了。

主席：那末，這個歷史遺物就可以不被列入教會產業調查統計範圍之內啦。

湯姆素：可能是的。

主席：你還代表格盧克主教去契斯克·布德索維塞參加过一次神職人員會議，是嗎？

湯姆素：是的。這次會議的召開與主教們反對“天主教行動會”有關。簽名運動，乃是這項鬥爭的一種手段，神職人員必需無條件地、毫無保留地在簽名運動中與主教們站在一邊。此外，還有些會議是由格盧克主教自己召集的。在會議上，他本人也參加對“天主教行動會”的攻擊。他威脅會議說，誰不參加簽名運動，誰就該受開除教籍的處罰。我曾代表主教參加过一次在契斯克·布德索維塞舉行的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我闡明了主教的指示，對到會的人們指出了不服從命令的後果，並號召神職人員在契斯克·布德索維塞的天主堂中矢誓對主教忠誠和對人民民主政權的不調協。

主席：還有其他類似的公開反政府的表示沒有？

湯姆素：一九四九年，主教曾在他那一教區中以教區的經濟困難為名，而進行募捐。本堂司鐸們都有責任使信徒們重視這次募捐，並向他們解釋捐款將用來補助邊區的貧苦教堂。然而，實際上這捐款是被用作叛逆活動了。

主席：你知道，契斯克·布德索維塞主教區所發佈的告教徒書嗎？

湯姆素：一九四九年六月，發佈了兩種帶叛逆性的告教徒書。規定在六月十二日的那個星期日和下一個星期日的聖禮會上公開宣讀出來。我已經記不得詳細的內容了。但是我知道，其內容中含有反對政府人員的言辭和對幾位部長的攻擊。總而言之，這些告教徒書的內容都是挑撥不滿情緒。它們的結果必然會造成嚴重的騷動，這也就是它們的目的。第一封告教徒書連同保證將其分發到各教區的指示，是從主教格盧克博士那裏收得的。我利用神甫們充當信差，執行這項任務。有些告教徒書是由我在樞機會議廳中直接交給副本堂們的。那些沒有來到的副本堂們，由我後來轉送給他們的。

主席：你知道在特爾納發舉行的秘密主教會議嗎？

湯姆素：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在特爾納發秘密舉行的一次主教會議，格盧克主教也參加了這次會議。當他回來時，他交給了我五種傳單草稿，其中有進行反政府的鬥爭的指示；還命令我再草擬一張傳單，並監督其在整個教區中遍發。我寫了個長達五頁的傳單，內容包括開除教籍勅令和附於該令的指示，諸如對有關神職人員薪金條例的指示，對“天主教行動會”的意見，對政府忠誠宣誓作某些保留（這是主教們的要求）的指示以及對信徒們的指示等。其中所散發的有關對“薪金條例”的各項指示，總的說起來，就是叫神職人員拒絕接受薪金，儘管這新條例對他們是有利的。據我所知，這乃是以顛覆人民民主政權為目的之挑釁行為。

主席：你知道，梵蒂岡的代表曾去過你們的教區多少次？

湯姆素：一九四五年夏，教皇代表福爾尼來到契斯克·布德索維塞的樞機會議廳，要求與副主教開斯談話。福爾尼離開後，開斯告訴我，福爾尼所關心的是要使那些在佔領初期曾受德籍主教管轄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被我們直接接收過來的教區，繼續受德籍和奧籍主教管轄。

主席：沒有問題了嗎？你可以退席。

對証人托馬斯·柏拉尼克的訊問

主席：我請下面一個証人，神長兼教皇名譽秘密御侍、伏德納尼本堂區的副本堂托馬斯·柏拉尼克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你什麼時候從契斯克·布德索維塞主教區的主教格盧克博士處收到第一封非法告教徒書的？

柏拉尼克：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維帕克的副堂名叫奧考克的來訪我，並且叫我次日派遣人到契斯克·布德索維塞去領取準備星期日在教堂中宣讀的主教聯合宣言。我派遣了我的鄰居切爾契斯的本堂司鐸弗蘭狄塞克·斯盧別克到契斯克·布德索維塞去，他給我帶回來了三十份告教徒書，其中除了我留下的十四份給我的代牧區而外，餘下的我都分送至皮塞克和普拉恰狄斯兩個本堂區，交給了恩卓伐的隨營司鐸普羅克斯和伏拉利的司鐸。我曾親自宣讀這種告教徒書，並認識到其內容是叛逆性和煽動性的。然而，我還是下了指示，將其分發至各本堂區中。

主席：你還從主教格盧克博士那裏收到過其他的告教徒書和傳單嗎？

柏拉尼克：約莫一星期後，利索夫的斯特列塞克神長又給我

的本堂區帶來了另外一份告教徒書。這一份告教徒書也是規定要在講壇上宣讀的。當時，在伏德納尼有許多本堂司鐸也都帶走了幾份告教徒書。我的妹妹安娜還將其傳遞到了其他兩個地區。

主席：這樣，你就公開加入了叛國活動。格盧克還用了些什麼別的方法來領導你反對現政權呢？

柏拉尼克：大約在七月中，我散發了關於將參加“天主教行動會”的教徒們開除教籍的勅令。

主席：你知道簽名運動嗎？

柏拉尼克：共有兩次運動。一次在八月間，是反對“新薪金條例”的；另一次時間較早，大約在七月中旬，是以我們擁護主教們進行反對國家鬥爭為內容的宣言。我先從契斯克·布德索維塞接到一份宣言的底稿，後來又照樣抄了出來，通知神甫們簽名。

主席：你用什麼方法通知神甫們的呢？

柏拉尼克：在這兩次簽名運動中，我都使用了密碼請帖。在此以前，我曾輪流去拜訪过神甫們，請求他們別為“天主教行動會”簽名，後來為了避免輪流訪問的麻煩，我就和他們約定好，讓他們在接到寫有“請你送給我關於一九〇九年七月十五日出生的約瑟夫·諾伐克的個人材料”字樣的書信時，親自到我這裏來。這意思是，收信人將在七月十五日來訪我，年份的最後一個字代表那天的第幾小時。

主席：你還接到過其他的指示嗎？

柏拉尼克：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為了救濟邊區貧苦教堂，曾舉行過一次教堂募捐。我們本堂區共捐得十二萬克朗。當我將這筆款子交上時，主教叫我將這筆錢存在自己

的家裏，分別藏在一些妥當的地方，以後將用這筆款子來維持進行叛逆活動的神甫們。

主席：你是否知道，格盧克主教爲了預防他因進行叛逆活動而被逮捕，曾採取過什麼準備措施呢？

柏拉尼克：那是六月十九日至六月二十日兩次宣讀告教徒書的那段時間的事情。當時，主教告訴过我，他一旦被逮捕，就採取步驟，使我和另外三個神甫——堪米尼·烏萊茲德的副本堂、利索夫的斯特列塞克和馬利修院的院長共同組織一個諮詢委員會，以協助副主教開斯。

主席：謝謝你。還有問題嗎？被告方面呢？沒有了。你可以退席。我宣告休庭，下午二時再進行其他証人的訊問。

對証人阿露瓦·羅森納的訊問

主席：休庭之後，我們現在繼續進行訊問。請所謂布拉格佈道部的秘書阿露瓦·羅森納入席。（証人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你有些什麼叛逆活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羅森納：我是“天主教學生會”的副主席，在曼德爾博士的邀請下我曾經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參加過一次在大主教公署中舉行的會議。我在这次會議上結識了布拉格主教府諮議員斯維茨博士。我通過他便成爲佈道部的一個支取薪金的僱用人員了。我一直在那裏工作至到被逮捕時爲止。

主席：你參加過一些什麼會議呢？

羅森納：我幾乎參加了所有的主教區聯席會議，在這些會議上草擬了一項各主教區通用的在青年中進行破壞活動的綱領。該綱領在一九四九年秋開始實行。它要求爭取

青年們起來支持主教而反对政府。曼德爾也參加了這些會議，並在會上談論了过去在法國青年中進行活動所採用的方法。

主席：整個活動的背景就是儘量利用青年們。這個所謂的青年綱領是誰擬定的呢？

羅森納：這綱領是在幾次主教區聯席會議上共同擬訂的。關於這些，白倫博士知道得很清楚。他還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

主席：關於非法傳單，你知道些什麼？

羅森納：有兩種。一種是出自主教會議的決議案；另一種是布拉格大主教區本身的傳單，是大主教親自擬訂的。我們從主教府秘書多納博士處或從曼德爾博士處獲取這些傳單，然後加以散發。

主席：你是怎樣散發這些傳單的？

羅森納：是由佈道部的兩個僱員巴塔克和馬列克用機器腳踏車運送的。

主席：佈道部的這些設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羅森納：佈道部的設備是從聖·瑪麗捐稅基金中支付的。

主席：被告斯維茨博士上前來。（被告斯維茨走到前面。）

主席：羅森納的供詞正確嗎？

斯維茨：正確的。

主席：被告曼德爾上前來，對這位証人的供詞表示態度。

曼德爾：（走到庭前）証人的供詞是正確的。我沒有什麼可補充。

主席：你可以退席。還有什麼問題要詢問証人嗎？沒有了。我宣告結束這一証人的詢問。

对証人約瑟夫·斯克勒納博士的訊問

主席：下面一個証人約瑟夫·斯克勒納博士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你与駐布拉格教皇聖使伏羅林納主教有什麼關係？

斯克勒納：有一次，伏羅林納主教來訪我。我应他的邀請，也去回拜了他。伏羅林納主教除詢問了有關建築管理部門及其人員的一般情況以外，還詢問了各種秘密問題。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去拜訪他時，他曾請我替他調查究竟是斯洛伐克還是布拉格的那一個法庭在处理可拉可維茨間諜案件，並問我是否可以查明他犯罪的程度。

主席：你怎樣獲得這一情報的呢？是誰幫助你獲得這一情報的呢？

斯克勒納：在我做學生的時候，我就認識了後來任國內貿易部主席團團長伐克拉夫·伐斯哥博士，我知道他曾任在斯洛伐克住過若干年。我打電話給他，問他關於可拉可維茨知道些什麼。伐斯哥告訴我，他將替我獲得案卷。我從這個案卷中抄錄了各証人關於可拉可維茨的供辭，並寫成報告送到教皇聖使館。

主席：你还犯過些什麼叛國罪行？

斯克勒納：普勒羅夫的“教士疾病救濟基金”是委託我作法律訴訟的。在理事長卡普所製造的訛詐計劃基礎之上，我擬訂了購買台普里斯的“弗拉斯特”別墅的合同。此外，我还接受過非法傳單，幾次抄錄非法報告，並將其其中的一份送給拉傑哈修道院院長勃可尼。

主席：還有問題嗎？檢察長？辯護人？你可以退席。

对証人雅安·塞羅夫斯基的訊問

主席：請下面一個証人、布拉格本篤修道院的檔案保管員雅安·塞羅夫斯基入席。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說明你与被告奧帕塞克的關係和你們共同進行的叛逆活動。

塞羅夫斯基：作為布列夫諾夫修道院的一個僱員，我與院長奧帕塞克有密切的關係。由於他對我的影響，使我对人民民主政权的仇視愈益加深。我知道奧帕塞克在羅馬時曾與梵蒂岡的高級代表往來，甚至还見過教皇。他回來後，曾談起教皇對政治問題所持的態度。除此而外，奧帕塞克還與西方各國間諜有關係。

主席：你認識這些人嗎？

塞羅夫斯基：有些認識，譬如法國的弗利波將軍和比利時的新聞記者兼間諜波讓。奧帕塞克院長自己又建立了一個附屬的間諜網，以便搜集情報。

主席：你知道奧帕塞克曾與人民黨前國會議員休多巴有聯系的事嗎？

塞羅夫斯基：大約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底，波頓·休多巴博士到布列夫諾夫修道院來。他說，在最近的將來，可能在六個星期之內，將會發生新戰爭。當時，休多巴還拿出來一張偽造的法國護照給大家看，他企圖利用這張假護照來達到非法偷越國境的目的。奧帕塞克特別把修道院的汽車撥給我和蘭格使用，讓我們把汽車開到西部邊境一帶去調查，看是否有適當的地方可以越境。過了些時候，建築師蘭格將休多巴的國會議員証帶來交給

了我，囑咐我把它保存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於是我就將它放在修道院檔案中了。

主席：你還在檔案中藏了些什麼東西？

塞羅夫斯基：這事發生後不久，安東尼·巴力克博士來訪我，要求我將前任部長普羅卡斯卡博士的一些文件藏在檔案中。那是一捲文件和一些銀行存款摺子。一九四八年五月或六月，奧帕塞克院長又交給我幾份特別機密的文件，叫我在他被逮捕後轉交給波讓。

主席：為什麼奧帕塞克叫你在這樣的情況下把這些文件交給波讓呢？

塞羅夫斯基：波讓是盧維亞的本篤修道院的修士，比利時籍，一九四五年後為奧帕塞克院長的座中常客；院長為了自己的利益，便利用波讓傳遞情報到外國去。我之所以能夠說這句話，是因為我自己曾在奧帕塞克的指示下，親自把兩封給在國外的天主教高級教士——本篤會修長帕納德·卡林和本篤修道院院長西亞圖·尼維——的密封信交給波讓。此外，我還交給過波讓許多旁人的文件；這些人都是準備潛逃出國，並希望有人能將文件隨後送給他們的。

主席：奧帕塞克與叛逆組織有聯繫嗎？

塞羅夫斯基：在二月事件以後，曾經有許多人上修道院來；這些人後來都因叛逆罪而被逮捕了。

主席：這些人當中，有你認識的嗎？

塞羅夫斯基：首先在一九四八年中，奧帕塞克院長曾叫我去拜訪總理辦公室經濟委員會人員江狄契卡博士。我交給江狄契卡一封信，並帶給他一個口信，警告他和一個名叫庫格拉的工程師對他們正在進行的非法活動，

必需特加謹慎。此外，我知道弗利波將軍有時也來訪奧帕塞克。我曾替弗利波將軍在修道院圖書館中挑選過幾本他自稱為感興趣的書籍。在來訪奧帕塞克院長的人當中，還有一個前法西斯政客，佔領期間曾任“國家政治報”總編輯的席諾斯特。他曾經到寺院來過，替奧帕塞克寫過許多反政府的演講稿。奧帕塞克用佈道方式，在聖禮中宣讀了這些演講辭。

主席：被告中有誰來看過奧帕塞克院長嗎？

塞羅夫斯基：布拉格“天主教行動會”的理事安東尼·曼德爾博士常常給奧帕塞克送來些翻印的主教非法傳單和告教徒書。據我所知，曼德爾博士與奧帕塞克還共同打算廣泛地發行許多有關法國“天主教行動會”反社會主義活動的目的與方式一類的書籍。

主席：被告奧帕塞克院長，你對被你拖入叛逆活動中的檔案保管員所招供的話，有什麼可說的嗎？供詞正確嗎？

奧帕塞克：是的，正確的。

主席：被告曼德爾有意見嗎？

曼德爾：這供詞是正確的。

主席：現在我結束這位証人的訊問，並宣告休庭二十分鐘。

對証人阿露瓦·茲姆茲利克的訊問

主席：現在我們將進行下面一個証人薩列斯會神甫阿露瓦·茲姆茲利克的訊問。

（主席在例行的程序完畢後，便開始訊問。）

主席：你在布拉格聖使館中擔任過什麼職務？你怎麼會去那兒的？

茲姆茲利克：一九四一年，我在意大利都靈修完神學後，就

在当地的“傳教士中心”工作直到一九四二年爲止。此後，我又到瑞士工作，認識了福爾尼博士。一九四五年九月初，我回到國內。在我入哥必里西的薩列斯學院不久以後，該院院長斯狄朋·特羅塔便通知我說，福爾尼博士叫我去聖使館工作。

主席：在聖使館工作期中，你會替伏羅林納主教翻譯過告教徒書，是嗎？

茲姆茲利克：伏羅林納博士叫我將告教徒書譯成意大利文，轉送到梵蒂岡。我可以肯定地說，伏羅林納博士對於散發告教徒書這件事是很滿意的。尤其使他感到滿意的是在教堂的聖禮中宣讀告教徒書。伏羅林納知道，這些告教徒書在波希米亞由利托墨利斯的主教斯狄朋·特羅塔博士負責散發，在摩拉維亞由阿羅木茨的大主教馬托卡博士散發，在斯洛伐克則由特拉伐的主教拉錫克博士散發。

主席：關於伏羅林納到斯洛伐克的旅行你知道些什麼？

茲姆茲利克：一九四九年六月，我以譯員的身分伴隨伏羅林納博士到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去旅行。在旅行過程中，伏羅林納幾乎普遍拜謁了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的各位主教。此行的主要目的，在於指示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的主教們繼續進行破壞活動。我曾親眼看見伏羅林納和普累索夫的哥依狄克主教。伏羅林納最關心的是，哥依狄克主教是否在教堂中宣讀了告教徒書。而哥依狄克主教的回答是沒有宣讀過。

陪審員柏德納：哥依狄克以消極的態度對待宣讀告教徒書嗎？

茲姆茲利克：全然不。他強調一般下層教士不願意唸這些告

教徒書，於是伏羅林納便指出那些曾在教堂中宣讀過告教徒書的教區為例。在这次旅行中，伏羅林納曾親自下令，必須公開宣讀告教徒書。

陪審員：這樣說來，哥依狄克主教並沒有反抗，他只不过強調了下層神職人員不願意唸告教徒書而已。

茲姆茲利克：是的，就是這樣的。哥依狄克主教曾經答應服從伏羅林納的指示。

主席：你对你的供詞，還希望加以補充嗎？

茲姆茲利克：首先我得聲明，我並不願意在這裏替自己辯護，更不希望減輕我所已經承認了的罪行。梵蒂岡的代表們拿的是美元，坐的是新式美國汽車，而對我這每天早晚往返於哥必里西和聖使館間這樣遠程徒步的人，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為止每月才給二百克朗。後來，才增加到每月三百克朗。他們整月在外國休假，而我則費了很大的周折每年才能得到一天或一禮拜的空閒時間。今天，我對我的行為深感慚愧。

主席：我沒有問題了。你可以退席。

法庭根據檢察長的建議所進行的對証人的訊問在此告結束。又根據檢察長在起訴書中所提出的建議，有關軍事、政治情報的問題，法庭將听取鑑定人的意見。我得向這些鑑定人指出，他們有責任把他們的一切學識和經驗在鑑定人作証中提供出來。

（至此，主席宣佈法庭決議：鑒於鑑定人的公開作証將危及國家機密與經濟機密，謝絕羣衆旁听。）

教授安东尼·霍布薩博士的專家鑑定詞

主席：現在開庭繼續審訊。首先，我宣佈法庭的決議，根據檢察長的建議，將再听取一個國際法和宗教法方面的鑑定人作証。法庭已經決定聘請安东尼·霍布薩博士作鑑定人。

主席：我請鑑定人發表他的鑑定結果。

鑑定人霍布薩博士：

敬愛的國家法官！

法律鑑定在訴訟中的作用，在於尽可能地從法理的各方面闡明作為訴訟主體的各種行為，以獲得正確而公正的判決。這種詳盡的說明，特別是當問題的性質不能單純從一種法律體系出發去判斷，而必需根據各種法律體系來判斷時，是非常必要的。

近代國家除特殊情況以外，一般都各自形成其統一的法律領域，而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從國際法來看，從外部對某一法律領域進行干涉，在原則上都是不能容許的。這一理論的正確性，即使從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來看，也不能予以否定，而在那些把法律制度看作人民最高意志表現的人民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則更加是正確的了。

如果我們撇開下列事實不談——一九二九年與意大利簽訂的條約規定，教皇是小國梵蒂岡城的統治者，

那末他基本上只不过是所有天主教信徒們的精神首領而已。然而，教皇的这种作用却越來越讓位給其次要的作用，亦即政治作用了。由於梵蒂岡在國際事務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各國都通過教皇使節和代理人來與它繼續維持外交關係。按照一般公認的國際慣例，這些人員與普通的外交代表一樣，享受同樣的特權，並從事類似的工作；不干涉他國內政，也是一切外交人員所應盡的責任。

然而，各使節與教皇之間的關係，在國際法上並沒有規定，其規定僅見於所謂宗教法典中，而從近代國家的觀點看來，這種宗教法典卻絲毫不具備法律的性質。

過去許多世紀以來，由於國家法律與宗教法典之間的矛盾，以及教皇基於宗教法典而產生的政治野心，梵蒂岡與各國之間曾經發生無數的衝突。人民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在原則上堅持反對任何外國官員可以在其國家領土內施行既不代表人民的意志，又不代表主權國家的意志的法律系統的那種說法。經過悠久的、動蕩不定的、混亂的歷史發展過程，領土法的原則終於被肯定下來了。今天，一國的法律生活已經不再劃分為國家法律範圍和宗教法典範圍，而是統一地由國家法律管理。一切為國家法律所管轄的事宜或與國家法有關事宜，均屬國家內政，根據國際法的規定，任何外交代表不得加以干涉。

因此，管理一切有關一國領土內的教會生活問題的國家法律，也同樣不受任何外交代表的干涉。

由此可見，教皇聖使與捷克斯洛伐克大主教間的直接聯繫，無論從捷克斯洛伐克法律的意義上來看，或

者从國際法的意義上來看，都不算作而且也不能算作官方性質的。駐捷克斯洛伐克的聖使，只不過是個僅能与政府或通過政府洽辦公務的政治代表而已。

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內，聖使並沒有傳達違反法律的教皇諭令和指示的權利，更沒有飭令信徒們“如何對付法律或行政當局命令”的權利。如果他這樣做，他就因干涉他國內政而違犯了國際法。同時，从捷克斯洛伐克本國法律的意義上來說，他也是犯罪的；雖然，由於治外法權的關係，他不會因此而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法院的制裁。因此，如果一個捷克斯洛伐克籍的教會人員，因受教皇指使而囑使其從屬人員從事違法活動，也同樣是犯罪的。

如果本庭認為起訴書中所控告的各項罪行，都在審訊過程中得到証實的話，那末我們在這裏所談的問題，从國際法來看，也同樣是些嚴重的罪行。

我們全都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敵人正在竭力進行顛覆活動，煽動並支持叛逆行爲，並組織間諜活動。梵蒂岡爲了同一個目的，在與他們合夥來幹。而在間諜工作方面，梵蒂岡因有教會從屬人員應服從上級教士的教規，因之較其他國家尤其佔有很大的優勢。

就爲了這個緣故，梵蒂岡在間諜工作方面所表現的成績，超過了其他國家所掌握的一切間諜組織。

一個不承認宗教法典的國家，當然也不承認宗教的服從教規，這乃是一個原則問題。

一個捷克斯洛伐克的教會人員，在對待任何一個外國人關係上偏重宗教服從的教規而違犯了國家法律

的規定，那他就會是一個叛徒。

現在，在我們這偉大的法庭上，作為審理對象的起訴書所控告的九名教會高級人員犯有叛逆、間諜和準備反捷克斯洛伐克戰爭的罪行。

起訴書還控告這些教會人員曾濫用所謂授權制，即全權委任書，在國內從事顛覆活動。

在宗教法典上，所謂授權制乃是一種授權或者再授權的方式。藉助授權制，教會中的一個低級人員就有權行使教會中某些高級人員的職權。在巨大的政治變革時期，這種授權與再授權的制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種秘密的教皇授權制，已經被證明是教皇在反對國家的鬥爭中的一種有效的武器。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既然不承認宗教法典，那末主教或教皇的授權制在我國領土上當然也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根據第218/49號法律第七款的明文規定，一切教派和教會中神職人員的活動，只能由已經取得政府同意並按法律規定宣過誓的人去執行。

一個教會人員，因被授權而執行教會行政範圍內原屬於上級教會的職務時，其行為如非係純宗教性或聖事性質而違犯了法律時，應受該國行政當局或法院的制裁。

但是，如果教皇的和其他的宗教授權制被濫用來作為進行秘密的叛國活動，擴大間諜網，並組織地下教會時，那末該國即面臨着一個有組織的陰謀問題，這陰謀在本國領土上的指揮者係聖使，上面的領導則為教皇，而聖使與教皇均係外國人，該國法院無法加以處理。

秘密宗教授权網的建立,且用來在一國內委以並轉委以撤換一切教會職位的權利,常常証明着梵蒂岡已認為在最近的時期內,一個反國家的公開暴動即將爆發。

事實上,這就是教廷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目前形勢的看法。我研究阿羅木茨大主教根據梵蒂岡的命令所授予大主教區副主教兼沙弗拉根主教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的秘密授权書的結果也証實了這一點。

雖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第 218/49 号法案和政府第 219/49 号通令中已經規定由政府方面給予羅馬天主教教會以物質保障,而梵蒂岡仍對我們共和國持這種態度,確實是特殊的。

在衡量這些反對國家的罪行時,當然必須分別考慮教會上層與下層,而採取這樣的原則:職位愈高,罪惡愈大,則判刑愈重。

如果法院根據審訊的結果,確認有任何梵蒂岡駐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代表採取不論何種方式來干涉我國內政時,則該外交代表即係嚴重地違犯了國際法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法,同時,也玷污了他外交代表的身分。

主席:有問題要問鑑定人嗎?沒有。鑑定人可以退席。

(短短的休息後,審訊繼續進行。)

主席:我現在請檢察長做總結性的發言。

檢方的總結陳述

檢察長雅安·費西博士致詞

主席先生和國家法院的法官先生們：

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的聲音還在我們耳中迴旋，全世界對華沙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所草擬的、代表着億萬人們渴望和平的意志的致聯合國書仍然深深銘記在心。

億萬個和平保衛者目前已更堅強地團結起來，形成了一個抵禦戰爭挑撥者的罪惡計劃的堡壘。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在其先鋒隊和作為和平堡壘的蘇聯領導下，正與一小撮貪得無厭的帝國主義猛獸及其走狗面面相對；和平陣營對這些新的戰爭策劃者正嚴陣以待。

在本法庭裏，在我們面前的被告席中，就坐着九個戰爭幫兇、戰爭販子和大規模屠殺人類的劊子手們的特務、反基督仇恨的播種人、崇拜偶像的僱傭間諜，他們為了那代替聖經的金牛^①的金元而發動了反對人民、反對生命的“十字軍”。

被告中，有八名是布拉格人，一名是阿羅木茨人，但全都是屬於梵蒂岡的。請問，這些對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進行陰謀的人，還能具有什麼國籍呢？這些籌劃以戰爭的毀滅和集體屠殺人類為目的的人，還能被包括在這個我

① 猶太人所崇拜的偶像，象徵錢財。——譯者

們尊之爲“國家”的共同体之中嗎？

坐在这裏的九個被告是西方帝國主義戰爭計劃的一部分；他們是華爾街在反進步、反自由、反正義、反和平的鬥爭中劃分給梵蒂岡分担的一個部門的執行機關。

全体被告皆業經証明犯有叛國罪行和間諜罪行。如果我們要正確地估計他們罪行的嚴重性及其規模，那末我們在考慮這些罪行的時候決不能脫離開廣大人民羣衆的努力，特別是廣大信徒們的努力，來孤立看問題，而應該從我們大家今天所从事的偉大鬥爭出發，來看待他們。

這是億萬人民爲了維持和平而進行的鬥爭，是爲了挫敗一小撮帝國主義者及其僕從們的戰爭計劃而進行的鬥爭。因此，對這些罪犯們不僅本國家法院要根據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制作出公正的判決；而且億萬個在斯德哥爾摩和平宣言上簽了名的人與億萬個爲實現華沙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而鬥爭的人都要作出公正的判決。

我們只簡單地將這些被告未到法庭之前所走過的道路敘述一下。這道路的起點並不是各被告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而是紐約市的一條已經變成爲歷史概念的、引起每一個正直的人厭惡與痛恨的街道。這街道的名字就是華爾街。

那些坐鎮在華爾街並從那裏指揮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美國壟斷資本家和強大的托辣斯統治者，對於戰爭利潤有着莫大的胃口。

我們知道，美國獨佔資本家及其走狗們，甚至當他們宣佈對希特勒作戰的時候，都沒有把希特勒當作死敵看待，而是把他當作一個競爭對手來看待。他們派遣美國士兵上戰場的目的，並不是爲了擊敗血腥的法西斯惡魔，而是爲了使他們自己可以代替希特勒的地位，成爲希特勒統治世界計

劃的繼承人。

“當我們看見德國會勝利時，我們就得幫助俄國，而當我們看見俄國會勝利時，我們就得幫助德國。”这句刺耳的話，就是当年的國會議員，今天的美國大總統杜魯門早在美國參戰的第一天說的。而那個老戰爭販子、對蘇聯進行干涉的組織者邱吉爾，當他拖延開闢第二戰場的陰謀已經証明無效，而蘇聯軍隊已經毫無阻難地驅逐了納粹軍隊的時候，也曾經對他的同僚們說過：“我們並沒有擊敗真正的敵人。”

對於那種浸透在這兩句話中的可鄙的大儒主義精神，任何認識到今天美國獨佔資本家及其同盟者邱吉爾在繼承希特勒的事業上都能做得青出於藍的人，都不會感到詫異的。

在對朝鮮進行掠奪性的侵略上，華爾街的紳士們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這些“超人們”既不在百老匯，也不在好萊塢，而是在漢城，在平壤，在朝鮮的城市和鄉村中，向全世界暴露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之真實意義。

在戰爭販子們的道路上，佈滿了叛賣、欺詐和陰謀。那是一條充滿了許多被蹂躪的協定和條約的道路。希特勒的英、美繼承人撕毀了雅爾塔和波茨坦協定。他們釋放了德國和日本的戰犯們，並在釋放之後，又從中挑選出一批人來，作為他們參謀部的顧問。他們利用一些從屬於金元帝國的傀儡政府，強使他們的戰爭計劃在聯合國中通過。他們甚至竟已達到在聯合國的旗幟下，大規模地屠殺無辜人民的程度。他們還企圖在這旗幟下派遣軍隊強行進入許多他們已經被驅逐出來的國家。

然而，美帝國主義者一開始就被迫承認，世界勞動人民是決不會對他們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謀袖手旁觀的，

他們決心要來保衛和平。

戰爭販子們由於對危害其統治和生存的一切事物懷着無比的仇恨，特別由於他們對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仇視，而不得不到處尋找同盟者。目前，他們正在獵尋着同盟者、僕從和走狗。

他們正在進行反對各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的鬥爭。同時，他們也在自己國內對勞動人民進行着殘酷的鬥爭，因為勞動人民對自由與和平的渴望在不斷地阻撓着他們的計劃。

因此，在已經馬歇爾化的國家中，帝國主義分子便依靠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依靠憲兵隊、情報員以及監獄等，並利用右翼社會民主黨的叛徒們來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而在那些已從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國家內，他們則竭力利用已經被打垮了的資產階級殘餘，並派遣許多特務和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去協助他們。

然而，像貝文、勃朗、舒馬赫、薩拉蓋特以及其他類似的人物，雖各有其一定的活動範圍，但華爾街卻還掌握着一個使東、西、南、北各地特務領導中心活動協調起來的工具。這工具便是梵蒂岡及其教廷，而教廷則是羅馬天主教會千年來的機構。

梵蒂岡的歷史，早就註定了教皇在美國獨佔資本家統治世界鬥爭中所起的作用。

梵蒂岡的歷史告訴了我們：教會高級教士們目前正走着他們前輩們所走過的反人民、反進步、反自由、反和平、反世界人民的幸福的老路。

梵蒂岡一向與歷史上最反動的統治結成同盟。它曾經當過封建制度的堡壘和看家狗。當資本主義制度與瀕於死

亡的制度相比較起來，還算是一種新的、推動社會進步的制度時，梵蒂岡曾經和這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作過鬥爭。但當另一個新的歷史因素，亦即作為資本主義產物的工人階級在政治舞台上出現時，它又變成為資產階級的忠實同盟者了。

整個梵蒂岡的近代歷史充滿了反對實現一切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鬥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梵蒂岡曾是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者，它感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倒台是個不可彌補的損失。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梵蒂岡便變本加厲地支持資產階級中極端反動的一部分，同時還制訂計劃，圖使哈布斯堡王朝復辟，並在中歐建立起一個天主教國家的聯邦。

雖然梵蒂岡的陰謀詭計因廣大人民羣衆的反抗而終歸失敗，但教皇和教會的反動政策却絲毫也沒有受到挫折。這個政策的方向仍然是反對人民，反對工人階級運動，並永遠與剝削階級的利益相一致。

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梵蒂岡對殺人魔王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而在最近則是对美國戰爭罪犯，對其中之一在屠殺男女老幼的殘酷上並不亞於任何納粹屠夫的麥克阿瑟所持的擁護態度。

正像美國化學工業和鋼鐵工業的托辣斯曾與那把希特勒捧上台的希特勒的法本工業托辣斯、克虜伯、蒂森、史汀納斯締結過秘密協定一樣；正像美國與德國的獨佔資本家們，甚至當美國已與德國作戰而仍然密切合作一樣；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工具的梵蒂岡為了祝福這種合作，曾於一九三三年由當時的帕賽利紅衣大主教，亦即現在的教皇庇護十

二世与希特勒締結了一項條約，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梵蒂岡公開地繼續執行支持帝國主義的政策，与那些在战争期間將納粹托辣斯得來的利潤寫到銀行秘密戶头上去的華爾街大亨們唱着同一個調子。梵蒂岡所關懷的，既不是人民的福利，更不是信徒們的福利，而是如何來保全並增加教會的財產問題。从这些事实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爲什麼一九四一年六月当納粹軍隊侵入苏联的時候，耶穌會會員們都像飢鷹一般跟在他們的後面。梵蒂岡的真正政策路線，並不是什麼對“天國”的信仰，而是對血腥財產的無恥貪婪。

梵蒂岡是今天世界上的头号地主。通过四十家大銀行和數百家小銀行，它控制了意大利國家準備金六千億里拉中的四千億。它在羅馬擁有三分之一的不動產与全部城市公用企業。在意大利的電氣工業中，梵蒂岡控制着價值七十億里拉的股票；在化學工業中，佔有二十億里拉的股票。梵蒂岡操縱了巴黎—荷蘭銀行及其在南美各國的支行，並擁有沃姆斯銀行股金總額的三分之一。梵蒂岡在法國投資達二千餘億法郎；其中有一部分是投資在蒙特·卡羅賭博事業中。梵蒂岡在拉丁美洲各國和西德的投資約達六千億法郎。

總計起來，梵蒂岡的不動產、股票、銀行存款等共約值三百億美元；此外，各主教會的財產合計起來，約值六百五十億美元。

正由於这种緣故，教皇不但不把希特勒看作是個集体屠殺人民的大劊子手，把法西斯主義看做是人類的洪水猛獸，反而看作是個同盟者。他也和美國的杜邦与摩根、或德國的蒂森与克虜伯一樣，把希特勒造成一個反對工人階級

運動，特別是反對那已經將資本家們驅逐出境的國家，即蘇聯的突擊力量。

下述事實是毫不為奇的：在一九三五年曾與希特勒訂立協定的教皇，又在一九三七年頒佈了一項旨在反對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共產主義的“神聖贖罪”通告。根據這個通告，教皇對為反飢餓和失業、反剝削和奴役而鬥爭的共產黨員們極其無恥地加以咀咒，而在當時的情況，正如“神聖贖罪”通告中所說的一樣，“由於世界財富分配之不平均，而產生了非常的貧困”。

可是，教皇並沒有把向這種貧窮作鬥爭看作他的神聖義務。相反的，他却想來進一步保全並擴大他的私有財產。

梵蒂岡的活動並不限於發宣言、通令和告教徒書一類的東西。早在一九一七年，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工農政府的偉大十月革命剛一勝利之後，它就展開了反對這一國家的敵對活動。

當時，在梵蒂岡所設立的“東方學院”成了白衛匪幫殘餘分子和一切仇視新興的社會主義世界的人們的活動中心。那裏訓練了許多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間諜和破壞分子。這個學院裏，也和在那所謂“教皇俄國事務學院”一樣，已經訓練出來而且現在還在訓練着大批的神甫，是用作去破壞蘇維埃制度和進行間諜活動的。我們知道，當帝國主義對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干涉戰爭時，梵蒂岡會利用宣傳和特務來支持那一直到今天仍然在繼續的活動。

因此，表示贊同墨索里尼、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梵蒂岡在後來的若干年代裏，仍然奉行這一政策，並積極參與毀滅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由於捷克斯洛伐克有了強大的、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階級，就成了教廷的眼中釘。

梵蒂岡從一開始就讚揚赫林卡法西斯分子在斯洛伐克所進行的活動。後來，當罪大惡極的約瑟夫·狄索把斯洛伐克人民送到希特勒的刀口上時，教皇庇護十二世還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給這個斯洛伐克國家祝福。千百万人民變成了血腥法西斯主義的犧牲品。這些損失是永遠不會被人遺忘的；過去這幾年的經驗，是永遠不會在人們的回憶中消失的。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正是梵蒂岡，正是教皇，也正是教廷在這些恐怖事實的面前，不僅默不作聲，甚至还公開地加以讚揚，並進一步——正如在這次審判中所証實的一樣——與兇手們狼狽為奸。

教廷對捷克與斯洛伐克人民一向是採取敵對態度的。主教們和大主教們都是廣大土地的所有者，他們既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者，也就是使奧地利日耳曼化和匈牙利化陰謀的支持者。所以，教廷不歡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自由的國家，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獨立國家建立後的最初幾年中，教會是不承認其存在的。但到一九二〇年，當教廷看到資產階級已把國家的領導權抓到自己手裏，並直接違反人民意志，鞏固了資本主義的制度時，它才開始與國內的統治集團密切地合作。它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在於維持它那因奧匈帝國滅亡而岌岌可危的權力。一九二五年，教廷在與統治集團密切合作之下，曾對參加工會組織的工人們發佈了一道以開除教籍作威脅的通告。這完全証明了教會對人民的敵對態度。

教會因與資產階級的合作而得到了丰厚的報酬。根據第一次土地改革法，教會產業本來是應該被分配的，然而實際上並沒有這麼做。這樣，教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三十一萬九千公頃的巨大產業便被保存下來了。

教廷利用了資產階級第一共和國存在的二十年，來鞏固其勢力。它在政府中派有自己的代表，並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黨這樣一個重要的政黨。在斯洛伐克，高級教士們藉赫林卡人民黨實行了一種在原則上是反對派的政路綫，而人民黨在本質上不過是法西斯與梵蒂岡的一個前衛。它最終分裂了我國各民族的團結，並因給予希特勒政權以軍事援助而給斯洛伐克人民招致了無窮的災難。

必需由教廷的這種對待勞動人民的態度中來找尋本法庭內各被告的罪行的根源。這些被告都業經証實犯有叛國罪與間諜罪。他們的這些罪行是在人民掌握政權、人民當家作主人的共和國中犯的。

當我國還處在外國佔領者的鐵掌中的時候，當我國人民起來對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殘暴勢力進行鬥爭的時候，這些被告曾站在我們民族敵人的一邊，高聲宣揚他們贊成納粹政策，而且還用行動來支持這種政策。因為，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這些人都不過是梵蒂岡的工具而已，而梵蒂岡又是把希特勒看成同盟者的。他們的口號是：“贊成希特勒；反對共和國。”

紅軍的勝利前進，使華爾街，因而也使梵蒂岡面臨一個新的局面。

華爾街與梵蒂岡的合作協定有其悠久的歷史。其淵源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三年教皇與紐約大主教，即後來的紅衣大主教史培爾曼的晤談以及一九四四年與邱吉爾的會談。

梵蒂岡利用教會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的合法地位，從一九四五年起就開始其破壞活動。

梵蒂岡一方面勾結納粹殘餘，幫助他們逃避對其罪惡行為的正義懲罰；另一方面，又與打進某些政黨中的反動分

子尽可能地建立密切的联系,以便始而秘密,繼則公開地維護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

梵蒂岡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和它在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各國的政策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事實上,這些政策都是出自一個指揮中心的。當各人民民主國家中的反動巢穴陸續被揭發出來以後,華爾街也就越來越依靠梵蒂岡了,而梵蒂岡本身依靠其教會組織網,也就變成了帝國主義破壞活動最重要的因素了。在此回顧一下波蘭的賣國賊米科拉茲柯接受教會幫助的事實,或者匈牙利間諜紅衣大主教明曾蒂在美帝國主義計劃中所起的作用就足够了。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由美國總統駐教廷的私人代表邁隆·泰勒經手轉交的杜魯門的致教皇書,是梵蒂岡參加美國間諜和破壞組織中的又一標誌。杜魯門在這封信中寫道:“我願在我的權力範圍以內尽力促成各種勢力的協力合作,為世界的精神秩序而鬥爭……為達到此目的,我們願意獻出我們全部的物質與精神的力量……”

在同一天,教皇庇護十二世覆函杜魯門稱:“請允許我們表示無限的歡欣與感謝……閣下與貴國人權保衛者可以指望神聖教會在這一方面的全面合作。”

杜魯門的“秩序”,應該了解為國務院所安排的秩序,即不是按照美國大多數公民的願望,而僅根據五角大樓(國防部)的指示,換句話說,就是僅根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指示而擬定並執行的侵略政策。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人員是隸屬於華爾街的,這一點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他們掌握着軍事工業的股票,而這些工業只有等到美國的外交政策演成集體屠殺的時候才能從事生產……。

一九四八年春,達成了一項具體的協議。根據協議,締

約双方在國際政治方面，有責任使彼此的行動一致。

一九四八年夏，教皇庇護十二世召集了歐美各國的紅衣大主教會議，討論梵蒂岡應如何在已經清洗了反動破壞分子並迫使他們轉入地下的人民民主國家中加強顛覆活動的問題，同時還注意到世界和平運動不斷增長的事實。

從這次會議以後，梵蒂岡的破壞活動就更加變本加厲了。梵蒂岡的廣播和報紙都被利用來為美國戰爭販子服務，它們被僱來向教會發佈在自由的人民民主國家中進行破壞活動的指令。

從此打開了通往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事件的道路，在那一天梵蒂岡頒佈了臭名遠揚的所謂開除教籍令，妄圖冷不防給予整個進步運動以致命的打擊。

今天，經過了一年多時間，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個打擊是落空了。這個打擊之所以落空，乃是命中註定的。因為教皇正如他的教會以及華爾街的大亨及其走狗們一樣，都是脫離人民的。他們的情報網提供給他們的情報並不正確。

被告們，你們提供給你們梵蒂岡的那些上司們的情報太糟啦！

你們的情報工作之所以做得糟，是因為你們脫離了人民，是因為你們所接觸的人，僅限於那些和你們一樣的罪犯們！你們卻沒有注意到，只有人民的声音才是你們神職人員應該注意的。人民要求的是和平，要求的是幸福和安居樂業。你們不願意看見這個真理：即不僅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在全世界說來，和平乃是全人類不分種族、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平乃是一切对生活有信心的人們的共同要求。

你們的眼睛避開了這個真理，因為你們做了一羣已經

失掉人類同情心的罪犯們的工具，因為你們做了正在準備新戰爭的人們的僱傭兵。

在法庭中的這九個被告乃是梵蒂岡鎖鍊上的一環。他們是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的世界主義的化身。

被告席中的九個被揭露的叛徒和間諜，並不是什麼思想體系的代表。——他們只不過是一批罪犯。

各位法官們，請從我們作為和平陣營中的一分子對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所負的責任出發，來衡量這些被告們的罪行吧。

讓你們的判決書來揭露那些新戰爭的策動者吧！不管他們是在華爾街，還是在華盛頓，或者是在梵蒂岡，我們保衛和平的鬥爭也包括着揭發並嚴厲而公正地制裁一切干犯或將要干犯和平的罪犯們。

檢察長契雪克博士致詞

各位法官：

我有責任來揭發捷克斯洛伐克教會組織及充當其積極助手的諸被告，在強大的世界和平鬥爭中，在帝國主義戰爭侵略者的反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準備中，扮演了可恥的第五縱隊的角色。

首先，必需注意的是，在法西斯佔領期間，當我國各民族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進行殘酷鬥爭時，教會及各被告所持的態度。在四天的審訊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幅教會及充當教會主要代表的被告們出賣我們民族解放鬥爭的驚人的圖畫。這幾個執行梵蒂岡親法西斯政策路線的被告——我明白地指出雪拉·庫拉契和波卡爾——竟然成了納粹秘密警察的情報員，其他幾個被告則以各種方式協助了佔領

者。同時，我們又看到反動派，特別是二月事件前德狄納所領導下的司法機關，怎樣盡其全力來阻撓這一陰謀不被揭露。發假誓、造假証件以及一些反動官員們的罪惡活動——這一切無一不在於掩飾充當教會主要代表的各被告的卑鄙叛逆行爲，以逃避我國人民的正義懲罰。

事實已經清楚地証明，這些被告們之出賣祖國，只不過是在執行那支持佔領制度的教會政策路線。

教會的代言人，波希米亞的首領紅衣大主教卡斯巴博士曾号召過全國人民都要安分守己，並支持佔領者及賣國賊們。他在結尾時曾這樣說道：“……人們應該完全信賴那些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們的良心和明智，好好地工作。”在整個佔領期間，教會都貫徹着這條密切合作的路線。教會曾号召人民替佔領者收集廢鐵，和募集社會救濟金；它自己也捐獻了數十萬克朗的款項給德國紅十字會。當佔領當局要徵用波希米亞一部分地區作軍事訓練場時，教會就強迫神職人員來支持這一計劃。教會又曾贊同取消教會假日，招募神學生爲佔領者工作，並号召居民援助從紅軍中逃出來的納粹分子。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即在赫德里奇暗殺事件後的時期，教會在告教徒書中曾表示贊同佔領者的恐怖行爲。爲了保全財產起見，教會通過其高級代表與納粹秘密警察交涉，藉其力量，把一些“不合適”的，也就是把那些爲了恢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自由而與一些信徒們共同進行鬥爭的教士們清洗出去。在與納粹秘密警察的合作之下，教會曾爲納粹秘密警察在查斯姆克設立過一所管制神職人員的集中營。被告契加克就是該營的主任。被告契加克直到一九四三年爲止，曾任專爲對付我國人民反佔領者的解放鬥爭而建立的納粹組織——“反布爾什維克同

盟”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大主教在其告教徒書中曾強迫我國人民去支持佔領當局；後來甚至到了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教會還與克·赫·弗蘭克磋商關於派代表團到西方去與美國人進行談判，讓西方帝國主義者來佔領我國，以便掠奪我國人民的勝利果實。

甚至在納粹佔領結束之後，教會還協助納粹神甫們藏匿各種教會產業。這點可以由被告雅羅里密克當台普拉修道院的納粹修士們被驅逐出境時所締結的賣國合同，特別得到証明。被告在合同的各條款內明白地承認，他只不过是臨時佔有勃孟斯特修會總修長努茨的領地——台普拉修道院的產業，保證只要這些修士們能夠重回我國領土的時候，立即將財產交還給他們。雅羅里密克這個猶大，甚至當我國人民在血腥的佔領時代所受的創傷尚未痊癒時，又在出賣我們艱苦奮鬥得來的自由。真的，再也找不到這樣無視於道德和政治的無恥之尤的第二個例子了。

蘇聯軍隊戰勝法西斯侵略者的光榮勝利，給我國各民族帶來了自由，使我國人民能把叛變的資產階級從其盤據的位置上趕掉，並將政權掌握到自己的手裏來。我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踏上了一條新的歷史大道——走向社會主義的大道。然而，教會正和信徒中間的廣大勞動羣衆相反，從一開始就對人民民主制度採取了敵對的態度；正如我現在就要指出的，這種態度純粹是受物質利益所支配的。

人民民主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嚴重地動搖了教會的經濟地位。我們知道，遲至一九四五年，教會還擁有面積達三十一萬九千公頃的大量地產。在爲了保持這些非由正道得來的大量財富所作的鬥爭中，教會與極端反動的

分子，甚至和國外敵人勾結起來，初則進行反對，最後則要推翻我們這個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教會曾對被其認為危害其經濟與政治勢力的“新土地改革法”發動了廣泛的破壞活動。正如在這次審判所看到的，教會在這次鬥爭中曾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甚至於濫用教堂的講道壇作為其反對分配教會產業的工具。此外，教會還更進一步濫用其宗教職權，以教會懲罰來威脅所有請求分取這些土地的信徒。

最後，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初，當反動勢力認為是剝奪人民艱苦得來的自由，並準備發動反革命叛亂最好的時候，教會也參與了這一罪惡計劃。最突出的是，當教會在參加這一聯盟時，竟聲稱要收回自己所喪失的財產。

在審訊中所提出的各項文件証明了叛徒真克爾和白倫大主教在二月事件的前夕所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法庭查獲的文件又揭露了大主教曾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召集過一次會議。在會議上決定了高級教士們應該堅決拒絕承認我國人民和我國政府的各項措施——其中包括沒收教會產業的各項措施——甚至还討論了一項關於準備在全國範圍內頒佈一項驅逐出教令和煽動忠實信徒們進行反人民民主制度的破壞活動的建議。在二月事件中，白倫大主教曾發佈過一封告教徒書，以此來全力支持反動派的叛亂計劃。

勞動人民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中取得的勝利，粉碎了所有這些反動計劃，把怠工者和破壞分子從他們所盤據的經濟與政治的崗位上趕了出去，從而加速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這樣就使得教會內外的反動勢力和他們的顛覆計劃，在我們廣大的人民羣衆中間被孤立起來。

在忠於共和國建設事業的廣大信徒的壓力下，教會在一九四八年春開始了與政府進行締結一項協定的談判。然

而，教会在同年之內就中斷了此項談判。一九四九年初——審訊已經証實，這是直接奉着梵蒂岡的命令的——談判終於完全破裂了。

曾經在此地引証过的布達佩斯審判案中有關叛徒明會蒂紅衣大主教和拉伊克二犯的文件，其中關於教会於一九四九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發動破壞活動一節，証實了談判破裂的時間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作為有計劃行動中的一部分而慎重選定的。从所引用的文件和这次審訊中所証實了的許多實際情節來看，顯然地可以看出美帝國主義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都準備了一項大規模的破壞活動，並為達到其目的，而利用了梵蒂岡。捷克斯洛伐克教会与政府間談判的破裂以及教会和作為其積極幫兇的各被告後來的罪惡的破壞活動，乃是大規模反对人民民主國家的反動陰謀中的一部分；在这一陰謀中，捷克斯洛伐克教会及作為其主要代表的各被告所承擔的任務，就是準備用暴動和進行破壞活動等方法，替美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準備基礎。

从这些事实看來，後來在大主教白倫以及其他大主教們的領導下所進行的許多破壞活動，其叛逆性已經是昭然若揭了。正如被告斯維茨所供認的：“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改組一事，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經在他的領導下開始進行了。一九四八年一月，被告曼德爾奉派赴法國和比利時。他在这些地方吸取了採用陰謀手段与社会主義進行鬥爭的各种經驗。究竟是些什麼經驗，从他帶回來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法文譯本这一事实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当審問曼德爾時——該被告的供狀曾由証人伏拉納和被告斯維茨証實——曾審查过一九四八年三月的所謂“佈道部”會議。“佈道部”是“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秘書處，

但正如被告羅森納以及其他被告所証實的一樣，這個秘書處乃是專門爲佈置與領導有組織的叛國活動而設置的。其設備包括：供顛印反政府印刷品用的印刷機，用來把帶有顛覆性的文件與各種非法資料送至遙遠的監牧區並携回間諜報告的機器腳踏車和汽車等。証人米卡勒克、布拉別克、湯姆素、莫席節克都已經証實，各教區的所謂“佈道部”都設有同樣的裝備。柏拉尼克証明，在全國範圍內有許多神職人員都和這一活動有密切的聯繫。反動的“天主教行動會”建立了許多非法小組，其任務是以各式各樣的暗害手段來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甚至在青年中間也建立了這樣的小組。從維傑斯卡及其同謀犯的審訊材料中，我們知道，曼德爾根據“我的奮鬥”的精神所進行的教育曾導向恐怖主義和暗殺行動。霍多寧的波里澤克修士非法小組中的一個青年組員，就是謀殺案中的一個幫兇。被告契加克、波卡爾和其他的人又証實了，這整個組織的領袖就是大主教白倫，而白倫本人則受聖使館的領導，並傳遞間諜報告給聖使館。

當一切都已準備就緒，並在一九四九年春設法破壞與政府的談判之後，教會就開始了旨在破壞共和國國內安寧的、大規模的陰謀活動，号召信徒們積極起來反對政府，這樣就爲在捷克斯洛伐克實行叛亂作好了準備。在四五月間，通過陰謀組織網，每星期都將許多新的攻擊國家、煽動神職人員起來反抗的教會傳單散發給神職人員。六月十九日及二十六日，教會又發出了兩項煽動信徒們反對政府的、破壞性的告教徒書，由曼德爾的組織將其轉發至各監牧區。梵蒂岡特務伏羅林納巡視了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的各主教區；斯洛伐克的赫林卡地下組織也準備好發動暴亂。

可是，所有這些企圖，在我國人民的真誠團結之下，

都被徹底地粉碎了。

从这些事实看来，旨在反对那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忠实信徒的开除教籍禁令所起的作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这些禁令意在破壞我們國內的社会、經濟生活，並反对為我們憲法所鞏固起來的各种基本成果。在審判各修会會員們的案件中，曾揭發过一个在修道院牆壁後面秘密籌劃的反人民的陰謀。而在目前的这次審訊中，被告奧帕塞克特別明白地揭露了在美帝國主義反对我們社会主义制度的鬥爭中，梵蒂岡給各修道院及各修会發出的指示所引起的破壞作用。在这次審訊中所提供出來的各項文件与在宗教法典和國際法方面的鑑定人的結論，都証實了他們在破壞与間諜活動中所使用的最陰險的工具之一，就是所謂秘密“授权制”。主教們根據梵蒂岡密封的“教皇極密”指示來破壞我國主权，並在違犯我國人民法律情況下，設立了一個秘密的地下教会網，作為進行破壞和間諜活動的工具。

我們必需对駐布拉格的聖使館在教会所發動的、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運動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加以特別注意。聖使館違背了國際法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刑法的規定，策動、規劃並指導各被告与整個教会的破壞活動，从而極其無禮地濫用了我國人民的優待和它自己的外交特权。

正如本法庭所審判的其他叛國案件一樣，这次審判再一次地揭露了某些西方國家的外交使節所起的作用，亦即在被告們的間諜活動中做中間人，並支持教会的破壞計劃。事實証明，粗暴地破壞國際公法而參與这次陰謀的各外交使節，乃是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帝國主義間諜。

因此，總括这次審訊中所暴露的各項事實以及被告們在証據確鑿下所招認的供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起

訴書所控告各被告所犯的叛國罪、間諜罪以及其他罪行已經全部証實。根據這點，關於各個被告我將陳述以下意見：

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

被告自一九二〇年起，就在阿羅木茨區大主教斯克班斯基、斯托江、普列江等人處服務。作為一個忠實奴僕，他在宗教事業上很快就飛黃騰達起來。由於他所担任的職位，他變成了梵蒂岡與教會反人民的政策的一貫追隨者。

在納粹強盜們侵入波蘭時，被告曾被納粹秘密警察抓去作過人質。三個月後，由於德籍主教納真與韋納克從中斡旋，他就被釋放了出來。釋放後，經普列江大主教的同意，他先後充當了納粹秘密警察官員班克爾和勃蘭池的情報員。被告曾將有關多西德拉本堂司鐸和“基督之子”修會的情報以及在赫德里奇遭暗殺後，有關希臘正教的情報等供給納粹秘密警察，以便他們採取步驟來收拾這些人。結果，多西德拉和“基督之子”修會的會員，以及希臘正教的神職人員都相繼被捕，被關進了集中營。後來確知，對這些人們所採取的步驟會危及他們生命和健康，並進而涉及他們的財產，其中特別是希臘正教會的財產，簡直被洗劫一空。被告雪拉明明知道，他供給納粹秘密警察的情報將要危及情報中所涉及的人員之生命與健康的。他也知道，由於納粹秘密警察的罪惡行徑和佔領期間的情況，他的行為會造成特別危險情況的。從第 117/1852 號法令第八十七款所規定的罪名看來，他的罪行是完全成立的。

解放後，雪拉又和許多與他自己相類似的叛徒及賣國賊，如阿羅木茨的納粹秘密警察情報員波斯皮西爾博士等接近。他們約定在法庭中僅對那些足以使他們逃避對其在

佔領時期所犯罪行的正義制裁的情節互相作証。根據這樣的協議，被告雪拉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特別人民法庭審理波斯皮西爾時，就故意作偽証，而將實際情況隱瞞起來。而且，德伏拉克、瓦西卡、普列江大主教本人和波斯皮西爾在雪拉的影響下，也在法庭上作偽証。特別人民法院審訊波斯皮西爾的案卷、波斯皮西爾發出的密碼信件、維可波律師與列古卡議員的信件以及被告自己的供詞等，都清清楚楚地証實了被告犯有作偽証罪、同謀偽証和唆使他人作偽証罪。因此，第 117/1852 号法令第 203 款所規定的欺詐罪已被完全証實。

被告的殘酷成性及其對人民民主政權的仇恨，又從他與被告斯維茨等人在有關普勒羅夫“教士疾病救濟基金”案件中共謀進行欺詐的事實，進一步得到証實。被告在這事件中的罪行已由証人卡普和芬克的証詞與被告本人的供詞所証實。他承認，他知道那是一種不應該作的違法行為，並且別人也曾明白地向他指出過這一點。然而，他仍然同意而且在用欺詐的方式轉移“教士疾病救濟基金”和“教士聯盟”的財產的命令上簽了字，從而給國家中央保險公司造成數達四百萬克朗的巨大損失。從損失方面看，第 117/1852 号法令第 203 款所規定的罪行已被完全証實。

從審訊中所提供的證明材料和証人們的証詞中可以看出，被告雪拉顯然是陰謀活動中的首要分子之一。我想起証人伏拉納在其証詞中曾明明白白地供認，早在一九四七年，他就接受被告雪拉的關於破壞活動的各種指示。証人莫席節克曾明確地講出了被告的進一步的活動，他確切地証實了被告曾參加翻印與散發叛逆性的印刷品。証人利茲卡也証實了雪拉曾參與委派秘密的主教府諮議員和秘密授予

“全权”等事实。被告本人也招認，所有这些事情他是知道的，因為有作為破壞活動中心的佈道部向他有系統地報告一切。

从被告与佈道部秘密信差德孚夏克博士以及被揭發了的梵蒂岡間諜伏羅林納的联系，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參加了間諜活動。被告被秘密賦予行使大主教職務的权力，積極实行梵蒂岡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第二套的更加隱蔽的破壞与間諜組織的計劃，便是被告參加梵蒂岡破壞与間諜組織的明顯的証據。

雅安·奧帕塞克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間，他在羅馬本篤大學讀書，接受了梵蒂岡反動政策精神的教育。

在各被告中，他的活動範圍最為廣泛。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就与梵蒂岡反動政策的高級代表們相勾結，並從他們那裏接受關於与人民民主制度作鬥爭的各种指示。直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勝利時為止，按照教會其他人員的方式，他一貫進行着間諜活動，並以動搖廣大人民羣衆，特別是天主教信徒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及其社會主義綱領的信心的行動，來秘密地与人民民主政權作鬥爭。他在濫用聖·阿德勃特的朝聖禮中所起的作用，就是被告進行破壞活動的明顯証據。許多專門提供作國內外反動派活動証據的材料都証實，奧帕塞克曾經積極參加過準備發動反革命叛亂的“奧來”組織中各地下小組的活動。奧帕塞克曾給予江狄契卡所領導的地下運動以精神上的支持，並充當該組織与教會之間的聯絡員。江狄契卡一被逮捕，奧帕塞克立刻与領導反共和國破壞陰謀的繼承人——霍斯狄契卡建立联系，並給他

与教会中其他人員建立联系以便利。

在審判过程中所提出的大批材料証实, 与他这些破壞活動的同時, 奧帕塞克还从一九四五年起即爲梵蒂岡与西方帝國主義各間諜中心進行了有系統的、大規模的間諜活動。關於這點, 我特別指出証人塞羅夫斯基所提供的廣泛而又完備的、令人信服的証據。

奧帕塞克及其同謀等的意圖, 可以由他們所準備的、在我國人民重新被奴役時實施的政治綱領証明; 这綱領就是要恢復資本主義, 也就是要回到較之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國時代更爲惡劣的情況中去。霍斯狄契卡的綱領, 就是要在我國建立以階級制度爲基礎的統治。根據霍斯狄契卡的親信柯塞的筆供, 奧帕塞克在这綱領的制訂过程中出过很大的力量。

从被告的活動範圍及其在破壞活動中所採取手段的險惡看來, 他是在特別嚴重的情況下犯了叛國罪的。对奧帕塞克五年來所進行的大規模間諜工作說來, 亦是如此。至於詳細情況, 請參考軍事和政治情報方面鑑定人的結論。

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

一九三九年, 被告任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副院長, 在佔領期間, 任勃孟斯特修会代理修長。

佔領期末, 他變成了捷克民族的叛徒皮納爾特和格盧比的親信, 把他們在西方各國旅行的筆記藏匿在斯特拉霍夫修道院檔案中。

身爲一個教会的主要人員, 又爲一個擁有大量不動產的修会代表人, 雅羅里密克自解放以後, 就站在破壞捷克与斯洛伐克人民團結的最前列。雅羅里密克对捷克斯洛伐克

共和國的看法，從他由被驅逐出境的納粹修士的手中接收台普拉修道院時，承諾在他們回來之前代為管理該寺院及其財產這一事實，可以想見。早在一九四五年，被告就充當了教會破壞活動中的一員。他是主教會議中有關財產問題的顧問；他和聖使館保持着聯繫，專門向它報導政府或民族陣綫中有關教會財產的討論和決定。

關於這些問題的情報，是他從當時政府中的梵蒂岡的信徒處獲得的。被告曾在他講道時採用各種方法，竭力使天主教徒們不去參加復興他們那被納粹佔領者破壞了的祖國的工作。

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後，被告再度站在破壞活動的前列。身為勃孟斯特修會的院長，他是第一個利用他的職位，與和他具有同樣觀點的罪犯馬加爾卡及泰若夫斯基相勾結，濫用修道院來和共和國進行鬥爭。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這三人就共同草擬了一個破壞綱領，旨在人民中間挑起不團結和衝突，並企圖利用禮拜式、朝聖禮來達到這一目的。雅羅里密克還與教會其他高級教士的叛國活動有牽連，他曾積極參加散佈帶有挑撥性的小冊子與傳單，其中有些還是他親自草擬和散發的。休多巴潛逃國外後，被告為了進行間諜活動，曾通過法國大使館，與他保持聯繫。同時，他還充當了休多巴與由天主教人民黨前國會議員們組成的地下組織間的聯絡員，傳遞休多巴對陰謀活動的各種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勞動人民取得勝利後，被告更以給聖使館和勃孟斯特修會總修長努茨傳間諜報告，充當法國間諜機關的特務，來進一步加強其長期以來為梵蒂岡所進行的間諜活動。雅羅里密克通過休多巴或直接經由法國間諜弗利波將軍，把他的報告轉送給法國間諜組織。從反共和國

陰謀着手進行時起，雅羅里密克就与被告奧帕塞克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經常和他商討下一步的行動。

当教会的迅速傾覆人民民主制度的希望破滅時，被告雅羅里密克便開始準備進行長期暗害和間諜活動。根據楚蒂岡的命令，他把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大部分財產，包括現款、珍貴物品以及珠寶等藏匿在許多隱蔽的地方，準備用這些資財作為教会日後進行陰謀活動的基金。

这种破壞活動的規模、与潛逃國外的叛徒們和与國內各破壞組織間的联系以及他在教会中所居的高等職位均充分地証實了他是在特別嚴重的情況下犯了叛國罪。同時，鑑定人的詳盡的結論又完全証實了被告的另一罪名——間諜活動罪。被告雅羅里密克的罪行已經由他自己的供詞、被告奧帕塞克的供詞、証人茲姆茲利克的供詞以及提供作証的各種文件完全証實了。

被告及其同謀者們的意圖与目的，从休多巴自國外送給他的綱領中清楚地被証實了。根據這一綱領，國家保險事業應該被取消，因為它允許私人企業自由經營。這就是說，根據雅羅里密克及其同謀者們的計劃，被剝削的無產者將有可能再度任人隨便剝削和餓死。綱領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將財產歸還給私人企業家們。以上兩點不但暴露了雅羅里密克，同樣也暴露了其他被告的真正目的。根據綱領上的另一點，剝削者与被剝削者之間的鴻溝將由一種“對自己同胞的愛”的社會政策來填平。顯然，這裏所指的對自己同胞的“愛”，正是那在第一共和國時期曾使失業者及其家屬得不到任何援助而遭受餓死的“愛”，也正是这种對自己同胞的“愛”的原則，使得這些失業的工人們当了炮灰。

約瑟夫·契加克

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議會的副主教。

在一九四三年德國佔領期間，被告的本來面目以教會代表的身分充當“反布爾什維克聯盟”中央委員會委員開始完全暴露出來了。他積極參加了“聯盟”的活動，並熱心地邀請神職人員去參加“聯盟”所召開的會議。由於他在實國活動中的熱誠，曾被授予聖·萬塞斯拉斯金鷹勳章。

正如契加克自己所承認並經証實了的，被告在佔領期間曾充當過附敵分子。因此，他對新共和國的態度，除了敵對之外，不會是別的什麼。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就與教會中的其他代表共同支持天主教人民黨反動分子的政策，使教會有可能在人民黨的協助下，不僅阻撓，而且扭轉我們國家向社會主義的發展。在一九四九年六月的一次議會的會議上，契加克和其他主教府諮議員一同表決贊成贈送十萬克朗給天主教人民黨，以資助其可恥的競選運動。除此以外，這個運動又從聖·維特斯議會以及其他教會的收益之中獲得支持，因而使這些教會產業變成了陰謀活動的財政基礎。

契加克在其反人民民主制度活動中，曾參加了教會的破壞陰謀。他收集過各種非法文獻，包括告教徒書和非法傳單。他的秘密檔案中，除告教徒書外，還存有秘密授權書。

基於這秘密授權制，被告契加克和同被秘密任命為主教的馬托歇克博士就被安置到布拉格總主教區的叛國、破壞和間諜活動的首要位置上去了。

甚至在此之前，即一九四八年六月，契加克就加入了梵蒂岡的間諜網，並充當了聖使館與白倫大主教之間的聯絡員。為了給聖使館傳遞間諜報告，被告自己供認曾經利用過

聖·亞瑟拉修道院的修女。

奧特卡·斯維茨博士

宗座主教兼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諮議員。

斯維茨曾在羅馬學習五年。与被告契加克一樣，被告斯維茨曾在一九四五年从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議會產業收益中抽出十萬克朗，贈予天主教人民黨，以支持其可耻的競選運動。

一九四七年，白倫大主教爲了要把“天主教行動會”變成教會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制度活動的工具，曾任命被告爲該會的首領。一九四八年，在白倫大主教所召開的，而有被告波卡爾和斯維茨參與並合作的一次會議上，奠定了梵蒂岡的破壞組織——“天主教行動會”的基礎。斯維茨採用了被告曼德爾在這次會議上所提出的總的組織機構和活動方式，並在不久之後，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將被告曼德爾拉進這個顛覆組織中，充當其助手。於是，斯維茨和曼德爾便成爲教會非法運動的中心人物了。

被告在其破壞活動之外，還從事間諜工作。對於這類工作，他是經過多年訓練的，因爲從一九二〇年聖使館成立時起，他就一直充當該使館的特務。正如這次審判中所提供的各項證據所証實的，亦如斯維茨自己所供認的，他曾將各類間諜報告傳遞給聖使館。他從事間諜工作的伎倆，和他出賣祖國的冷酷心腸，可以由他伴隨白倫大主教正式訪問斯可達工廠後，當天即將有關斯可達工廠生產情況的間諜報告送給聖使館一事得到証明。除此而外，被告的間諜報告還涉及我國政治、經濟生活的各方面。他所做的報告包括政治和經濟性的，同樣也包括軍事性的以及其他性質的。作爲一個

曾受專門訓練的間諜，被告還有其自己的情報組織。這是由賣國的資產階級中間一些最反動的分子組成的。其成員都是十足的叛徒，如前天主教人民黨總書記克利米克博士、“聖·万塞斯拉斯聯盟”主席江狄契卡博士、社會福利部官員格魯帕博士以及其他等人。然而，斯維茨不僅在梵蒂岡的間諜機關中工作而已，他還參加了意大利情報機關工作，把情報送給意大利公使館前新聞參贊斯坦達多博士。所以，一個像耶穌會會員可拉可維奇這樣的梵蒂岡間諜和罪犯，會受到斯維茨的殷勤招待，並於一九四五年與一九四六年，爲了幫助他逃避正義的制裁，兩度安排他與聖使館取得聯繫，乃是絲毫不足以奇怪的事情。

由於被告斯維茨任普勒羅夫“教士疾病基金委員會”委員與基金管理理事會的理事，所以，他也參與了一九四七年關於該機構特別救濟基金的欺詐陰謀，並使受保險的普通教士們和國家中央保險公司蒙受了爲數達四百萬克朗之鉅的損失。

雅羅斯拉夫·庫拉契博士

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諮議員，“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教士聯合會”的理事長。

佔領期間，以教會最高代表身分參加了納粹秘密警察的工作。如他自己所供認的，他按時將間諜報告供給納粹秘密警察官員奧帕豪塞，從而和被告雪拉及波卡爾一樣，變成了納粹秘密警察的情報員。佔領期間，被告庫拉契又以教會代表的身分，與天主教新聞界的賣國賊保持聯繫。他甚至唆使過賣國新聞記者席諾斯特和雪蘭卡、神甫勃羅依以及賣國賊庫拉等撰寫擁護納粹的文章。這些人在庫拉契的教唆

下所寫的文章，已經呈交給法庭。被告也承認了這種活動。

一九四五年六月，被告庫拉契與教會其他代表們共同表決，贊成從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議員財產中抽出十萬克朗獻給天主教人民黨，以資助其可恥的選舉運動。庫拉契還在梵蒂岡的顛覆性組織“天主教行動會”中積極活動。證明文件和被告自己的供詞証實，被告庫拉契曾散發大批“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所印行的告教徒書和非法傳單。然而，被告的破壞活動還不局限於教會地下活動而已；通過前國家保安部隊叛徒皮特博克的幫助，庫拉契還參加了僑居國外的賣國賊們的叛逆活動，因而與叛徒休多巴、本查、赫爾、奧巴達勒克等周圍的人都發生了聯系。

與庫拉契的破壞活動有密切聯系的，乃是他的間諜工作。自一九四七年夏至一九四九年夏，被告由於曾以有關政治、經濟和宗教事務的間諜報告供給意大利公使館新聞參贊斯坦達多，因而犯了間諜罪行。被告通過這一外交官員，曾將書面的間諜報告送給梵蒂岡間諜約瑟夫·班斯狄塞克，然後再經此人，將其轉送到羅馬的間諜中心去。

被告對於他在國內所進行的叛逆活動與間諜活動，曾打算潛逃國外，一走了之。爲了這一目的，他曾在一九四九年夏匯了二十五萬克朗到羅馬，因此犯了套購外匯的欺詐罪。

安東尼·曼德爾

被告曾在羅馬學習九年。在東方學院受間諜訓練，特別是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進行間諜工作的訓練二年。

白倫大主教因爲他曾受過特種教育和訓練，特地把 他選拔出來進行陰謀組織網的工作，並命他在捷克斯洛伐克

境內進行叛國活動與間諜工作。曼德爾在法國熟悉了反對社會主義的陰謀鬥爭方法，並在那裏以各種譏謗性、煽動性和破壞性內容的文件來武裝自己，隨後又把這些東西應用到捷克斯洛伐克來。他還帶回來了一本反映“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思想特點的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法文譯本。在擔任了賣國的“天主教行動會”與“佈道部”組織領導人以後，他在破壞和間諜工作方面的能力就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曼德爾所進行的廣泛而又複雜的破壞與顛覆活動，業已全部得到証實。他曾在各主教區內建立“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分支機構，佈置各個主教區代表的非法會議，在會上給他們下指示，並組織秘密遞信機構，將帶有污蔑性的印刷品一個接着一個地送到各監牧區。他積極收集各種間諜報告，呈遞給他的上司，以便再轉至梵蒂岡。在布拉格主教區中，這一活動是由他親自領導的。曼德爾曾親自去訪問各監牧區，參加“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各種非法小組會議，並在會議上對國家和國家制度大肆誹謗。在教堂佈道的時候，他也是這樣做的。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使青年腐化墮落並將之引入歧途上。

被告及其上司的犯罪性質，可以从所有資助叛逆活動的款項概由教堂的捐款支出，換一句話說，即由忠實信徒們所捐獻的基金支出的這一情節來說明。在審訊過程中還証實了，曼德爾曾通過間諜班納特卡和律師克里塞克，與許多從事破壞和叛國活動的地下組織建立聯系。克里塞克在霍拉可伐及其同謀案中曾被判刑。為了間諜的目的，曼德爾又曾與專門為英、美帝國主義間諜中心供給情報的駐捷克斯洛伐克外籍新聞記者建立聯系。

被告曼德爾的活動，除了在審訊過程中已由其他被告，

如奧帕塞克、波卡爾、斯維茨和庫拉契的供詞，以及証人羅森納和塞羅夫斯基的証詞予以証實外，還有大批的文件材料作為証明。鑒於其活動的規模，並考慮到被告竭力腐化青年等情由，被告的活動必需被看做是特別嚴重的。

由被告本人所組織的，並由其親自進行的許多間諜活動完全証實了起訴書中所控訴和為鑑定人結論所肯定的那些罪行。

雅安·波卡爾博士

大主教的一等秘書。

他在中學時代所受的耶穌會教育，對他後來的成長影響很大。在他三十多歲時，充當了大主教的秘書。納粹佔領期間，他參加了納粹秘密警察的情報組織，擔任情報員。被告明白地承認，自一九四三年起，他就為納粹秘密警察官員奧帕豪塞供給情報。作為對他工作的報酬，他後來被任命為布拉格最富裕監牧區之一的聖·斯蒂芬監牧區管理人。

他對納粹佔領者的態度，是和他對人民民主制度的敵視態度有着直接關係的。在“佈道部”的破壞活動中，波卡爾居中心地位。他在那裏抄錄了許多他所翻印的非法傳單和告教徒書的草稿，而且他自己也供認曾參加過起草三個反對人民民主制度的非法傳單。

他的叛逆行為並不局限於教會範圍以內，而且还擴展到非教徒的非法活動方面。一九四八年三月，他通過利布什·什塔斯娜與破壞組織“我們來了”以及由賣國賊兼殺人犯，如卓克、福羅夫等人所領導的非法組織建立聯系。一九四八年秋，他佈置了什塔斯娜的向國外潛逃，並資助她一萬克朗和五百美元。以後，當她抵達外國後，他又資助了她更

多的美元。爲了達到这一目的，她擅自動用了由美國本篤會的捷籍修士處獲得的、專爲在捷克聖人墓前作彌撒用的捐款中的一千二百美元。

除了叛逆罪行外，波卡爾早自一九三九年就犯有間諜罪行。他是梵蒂岡間諜網中的一員。一九四六年，解放以後，當我們國家已經踏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時，他作爲一個教會人員更加強了間諜工作。他在當時建立了自己的間諜組織，其中包括這樣的著名的極端反動分子，如皮查契克博士、克利米克博士、伏西赫院長、被告雅羅里密克、庫拉契、斯維茨，還有米塔爾博士、蓋德勒博士和多納等。他將所獲得的情報，轉交給聖使館。被告供認了，他曾把有關國防部和內務部幾種安全措施的重要情報，也就是把極重要的國家機密供給了聖使館秘書德·利華。當他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到羅馬去旅行時，又曾親自將捏造的且帶有污蔑性的報告，給予梵蒂岡廣播發言人弗爾特博士，以便後者在梵蒂岡針對捷克斯洛伐克展開煽動性的廣播運動中加以利用。这一次，由於他替合同會會員，即後來因叛國罪行而受到正義懲罰的帕爾爾·古茨科由羅馬帶回來兩封信，而又充當了班達匪幫的聯絡員。

伐茨拉夫·姆特非

薩列斯會的修士，聖使館的職業間諜。曾在意大利都靈攻讀神學。他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起便開始作叛逆活動，他曾爲進行陰謀活動的格特魯達·米克奧華、孚拉·蘇可伐和保加利亞籍的明哲夫博士的非法潛逃國外作安排，並參加佈置勃拉其潛逃的陰謀。這些罪行，被告均已供認不諱。

在教會反人民民主共和國總陰謀中，他所承擔的主要

任務乃是間諜工作。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期間，他在布拉格的梵蒂岡間諜中心——教皇使館——做僱傭間諜。他的具体任務是把間諜報告譯成意大利文。这一工作的目的在於促進与那些接受布拉格情報的其他國家間諜中心的合作和瞭解。姆特非对这些間諜報告的內容，都知道得很清楚。正如他自己所供認的，他曾親自与該使館秘書間諜德·利華共同將報告加以分類，並通过某些西方國家的外交信使轉送到梵蒂岡，这是毫不足以為怪的。他在此項工作中所得的報酬，為數遠超过他正常的月薪。

各被告的活動，不論是从細節上或者是从整体上看來，都是羅馬教廷反共和國及其人民的大陰謀的一部分。這個陰謀是由國外的敌对集团、美帝國主義以及其在梵蒂岡的奴僕們所策劃与領導的。

陰謀的終極目的，在於破壞和顛覆我國的經濟和社会制度，逼迫我國人民再度在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枷鎖下生活。

教会內外的賣國的反動勢力以及他們的外國主子們都已經知道：我國人民堅定地依靠着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所建立的牢不可破的联盟，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都決不允許他們那經由艰苦奮鬥而得來的自由被人奪去的。一切依靠國內力量來發動政變的反動希望不过是一种夢想。因此，被告們所籌劃的叛亂与顛覆活動之終極目的都不过是为了便利帝國主義对我國進行武裝干涉。这次審訊已經清楚地說明，教会和作為教会積極助手的各被告為了實現他們的叛國陰謀，曾指望美國侵略者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

主國家發動干涉戰爭。這次審訊又証實了，各被告在協助帝國主義準備對他們自己的祖國發動戰爭方面，是毫不畏縮的。

如果我們了解了他們的犯罪動機的話，那末這些在宗教的假面具掩護下的罪犯們深重的叛國罪行和毫無人性的行為就顯得更加險惡了。

這幾天來，教廷的首要代表們都在法庭前供述了他們的罪行，而我國人民也都听到了他們的犯罪動機。這就是：希望收回他們已經失去的財產；希望收回原來屬於他們而由我們人民民主共和國分配給勞動農民的大量土地；希望恢復他們已經失去的權勢。是的，最無恥的物質利益引導着教會及各被告去從事反對我國人民，反對共和國的罪惡陰謀。爲了財產，爲了金錢，他們毫不猶豫地想使我國人民遭受戰爭的恐怖。這次審訊已經撕破了被告們和教會所帶的虛偽的假面具；他們在審訊中所提供的積案如山的証件前面，已經供認了他們所犯的顛覆、叛國和間諜罪行的卑鄙動機。這麼一來，他們和整個反動世界製造的所謂他們的叛國顛覆行為乃是爲了實現某種理想的一切謊言，便被徹底粉碎了。

我們已經說過，唯有人民民主制度才能給我國人民以一切自由，其中特別包括了廣泛的信仰自由。科息斯政府綱領早曾宣佈過保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則，對任何一種信仰和宗教都一律給予自由舉行儀式的機會。這些原則都在五月九日的憲法中肯定下來了。而我們的政府在其實際政策中也充分地給予了保證。神職人員的薪金也在教會及宗教團體經濟保障的法律下得到了保證。

凡教會本身收入不能負擔的物質開銷，均由國家付給。

國家確實已經盡了一切力量來幫助神職人員和教會，使他們有可能充分照顧信徒和宗教的需要。

這些事實，對於所有生活在我們國土上的人都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勞動人民出身的天主教徒們都知道，由於人民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消滅了罪惡的人對人的剝削，以新的道德、大公無私、自我犧牲和誠實生活的道德觀念來教育人們，由於它結束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所產生的一切罪惡，並因此而有助於實現那讓每一個人都成為上帝化身的基督理想，所以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制度乃是基督教最高教義的實現。

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凡是勞動人民出身的信徒，都堅決地擁護人民民主制度，都忘我地在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因為只有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在這個國家所創造與保障的生活裏，勞動人民才看到基督理想的實現。這就是愛國的普通神職人員所以與人民團結在一起、與共和國的建設者行列中的信徒們堅決站在一起的原因。

這也就是為什麼教會及充當其助手的各被告的一切邪惡陰謀結果都歸於失敗的道理。這也就是為什麼坐在被告席上的一羣罪犯們所以在勞動人民中、在一切正直信徒們之中遭到孤立的理由。他們與勞動人民的利益沒有絲毫共同之點，他們甘心為外國人服務，為我們人民的敵人和世界和平的敵人服務，為新的世界大戰的挑撥者——美帝國主義——服務。

因此，他們不能動搖人民民主制度的力量和穩固性，他們不能摧毀我國人民的團結和決心。

然而，這並不能減輕他們的罪惡。恰恰相反，由於這些

被告們曾爲戰爭服務，協助了戰爭的準備工作，因此，他們的罪行是更加可怖的。

在最近這些日子裏，全世界也从華沙、从具有歷史意義的世界和平大會上听到了神職人員的呼聲——他們是許多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神職人員，但他們和世界上的億萬勞動人民一起發出了共同的呼聲。這是和平的呼聲。這聲音號召人們爲保障全世界億萬勞動人民美好的生活而進行艱苦的、堅決的鬥爭。這聲音呼籲着保衛世界和平。

這裏，在我們面前的也是一羣神職人員；但是他們的聲音却是要求戰爭。他們的聲音幫助了一小撮坐在美元錢袋上，渴望着新血液來擴大和保全其正在崩潰的統治的貪婪者們。

各位法官！我以我國正在熱心地、忘我地建設一切新的輝煌生活的勞動人民的名義，以千百萬爲和平而鬥爭的勞動人民的名義，請求你們，強迫那些新的世界大戰挑撥者們閉起嘴來！向我國的勞動人民表示，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不論披着什麼樣外衣來顛覆我們的共和國，來危害我國人民的幸福生活。

爲了社會主義，爲了和平，讓這些被告們受到人民法律所規定的懲罰吧！

主席：我宣告休息，下午一時繼續開庭。

辯護人致詞

主席：現在，我請各位辯護人發言。

辯護人維雪克博士：

各位法官先生們，主席先生：

我的辯護委託人奧帕塞克院長在你們面前所作的供詞是悔悟的、真實的、特別是絕對全面徹底的。他已經把過去所作所爲一一地告訴你們了；他的供詞與其他被告的供詞之間並沒有矛盾的地方，這一點業經整個審訊予以証明。根據被告奧帕塞克院長所犯罪行以及他所供認的各節，依法應處極刑。但是，請你們考慮一下，鑒於罪犯本人的身分或減刑條件，如根據新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判處，是否失之過嚴。

（至此，辯護人敘述了被告的簡歷，並繼續說。）

因此，我請求你們估量到梵蒂岡故意把許多青年挑選出來，使他們脫離人民，把他們培養成梵蒂岡在反對一切進步勢力鬥爭中的忠實工具這一事實。被告在被逮捕之後及時地作出供詞，無疑地有助於部分地消除其行爲的有害結果，而這依據刑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就提供了進一步減刑的一個條件。我請求法庭考慮以上這些減刑的條件。

主席：謝謝你。我現在請斯拉伊博士爲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雪拉進行辯護。

辯護人斯拉伊博士：被告雪拉博士對於被檢察長控訴爲叛國罪，並經証人、証件與鑑定人所証實的各項罪行，均已一一供認不諱。被告並已供認，他已經瞭解到由於他根據梵蒂岡的意圖，並與梵蒂岡的代表相勾結所進行的活動，嚴重地危害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這些活動的終極目的，又在於以暴力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制度。雖然，被告雪拉陰謀活動的範圍涉及甚廣，他所用來實現這些陰謀的手段也極其狡猾——例如授權制一事——然而，辯護人仍然請求法庭對本案是否應根據刑法第一條第三款第五項所規定的叛國罪而處以極刑的問題，加以慎重的考慮。請慎重考慮，雪拉叛逆行爲的情況是否危險到足以依據上述條款來判處的程度。被告業已供認的第二項嚴重罪行，乃是間諜罪行。但在這一方面，從各種情節上看，他並沒有按照梵蒂岡的意圖，表現出像他這樣一個在教會中佔有很高地位的人所應表現的主動性。他在“佈道部”中的活動是比較被動的。

至於談到雪拉與納粹秘密警察合作一節，請法庭不要忽略，雪拉之所以承擔這一工作，是出於普列江大主教的要求，而這又與梵蒂岡支持納粹政權的意圖完全吻合的。至於雪拉博士在波斯皮西爾訴訟案中所犯的偽証罪，和他因參加盜竊普勒羅夫“教士疾病救濟基金”大筆財產而犯的欺詐罪；被告對於這兩項刑法上所規定的罪行已經承認，辯護人只希望指出，在偽証案中，被告在阿羅木茨法庭面前隱瞞波斯皮西爾與納粹秘密警察合作的情節，顯然，是因為這事與他本人和納粹秘密警察的接觸密切相關，除此而外，別無其他原因；至於普勒羅夫“教士疾病救濟基金”案中的欺詐行

爲，雪拉則只限於簽字批准而已，欺詐的主謀與實施，應歸罪於卡普修士以及其他等人。

因此，辯護人有責任請求法庭根據新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減刑辦法，判處被告雪拉以褫奪自由的刑罰來代替極刑。鑒於被告所犯的各項罪行幾乎無一不是因爲職務上對梵蒂岡服從，和由於受梵蒂岡教育影響的結果，因此減刑的要求更合乎情理。最後，辯護人請求國家法院信任被告的全部供詞。

主席：謝謝你。我現在請格德利契卡博士爲被告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進行辯護。

（辯護人格德利契卡博士首先說明雅羅里密克在梵蒂岡各學校內所受的教育、教育的方法以及他們對教皇最高權威絕對服從的嚴厲要求等都給予被告的思想以極大的影響。然後又接着說了下面的話。）

被告的實際生活，與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需要完全隔絕，乃是出於被迫的。由於他對梵蒂岡的狂熱崇拜和忠實服從，他的行動便日益陷入梵蒂岡的勢力羅網中。然而，罪惡的幕後策動者倒不一定是他，而每次都是由同謀者先來找被告的。雖然被告也經常接受他們的要求，但主動的還是他們，而不是被告。我請求國家法院審判委員會對被告表示悔悟的供詞以及促使他犯罪的各種情況加以估量。我認爲，應用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的條件是存在的，我請求國家法院應用這一條款。

主席：謝謝你。我現在請伏羅爾博士爲他的辯護委託人、被告約瑟夫·契加克博士進行辯護。

辯護人伏羅爾博士：

各位法官：

被告契加克博士已經供認，他曾在佔領期間担任过“反布爾什維克同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委員，曾搜集並藏匿过挑撥性的小冊子、傳單、告教徒書与全权委任書的副本等，曾設法將重要情報傳遞給聖使館，最後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曾接受了授權書，來領導全主教區，並領導反人民民主制度的鬥爭。這些事實清楚地說明了，被告所犯罪行應屬於保衛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法律範圍之內的。然而，關於大主教傳遞給聖使館三個報告的事情，我請求對被告自己的供詞，即他確實不知道其中的內容一事，加以考慮。与此相同，我請求你們注意僅在这次審判中才洩露出的另一件事實，就是間諜報告是用各種方法傳遞給聖使館的，並有一個与契加克博士毫無關係的專門組織來進行這項傳遞工作。至於判刑的問題，被告在預審中与这次公審中均已供認其全部罪行，並兩次對其叛逆活動表示懺悔。

（然後，辯護人伏羅爾博士又指出，被告在羅馬所受的教育給予他以莫大的影响。並要求對被告在對羅馬的从屬關係之压力下犯罪到何種程度這一問題，加以考慮。辯護人請求法庭在判決時注意這兩種情況。）

主席：謝謝你。我現在請托西博士為被告斯維茨博士進行辯護。

辯護人托西博士：我的辯護委託人斯維茨博士被控訴犯有嚴重的叛國罪行与欺詐罪行。為了精確起見，我得聲明，“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首領乃是白倫大主教本人；斯維茨博士只不过是他的副手而已。我的辯護委託人對於他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所舉行的兩次“天主教行

動會”工作人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已經記不清楚，而且曼德爾博士也記不起這報告的內容了。

（至此，辯護人托西博士對被告被控訴為間諜罪犯的各種叛逆罪行作了個總結，最後並引用了斯維茨博士自己所供述的一段話作為結束）：“我得補充一句，我之所以被引入叛逆活動乃是由於我的教育和我對梵蒂岡及教會的順從。早自中學時代，我就在教會的指導下接受了這方面的教育。”我相信，根據被告本人的情況以及各種減罪的條件，法庭會認為處以極刑會失之過嚴，而不予採用的。

主席：謝謝你。我現在請馬丁博士為被告雅羅斯拉夫·庫拉契博士進行辯護。

辯護人馬丁博士：

各位法官：

不論在預審中或在这次公審中，我的辯護委託人既沒有企圖否認其罪行，更沒有企圖以自己所受的影響來作辯護。我想指出，納粹秘密警察的特務華爾納·波勃在他的供詞中曾描述過，庫拉契博士生性脆弱，易受別人的影響。被告之從事間諜活動，純係偶然的事情。他認識斯坦達多博士也是很偶然的。他和國家保安部隊人員雅安·皮特博克發生關係，是因為他們早在年青時代就相識的。被告在被羈押過程中，已認識到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我請求法庭對一切作為庫拉契減罪的條件仔細加以斟酌，對他那無辜的性格，對他的附從性和職務上的極端從屬關係，最後對他是因被引誘而參加活動的這一項事實均予以考慮。

主席：謝謝你。我現在請辯護人切索夫斯基博士為被告曼德

爾博士進行辯護。

辯護人切索夫斯基博士：審判中所提供的証件，特別是我的辯護委託人安東尼·曼德爾博士的全面的、悔悟的供詞毫無疑義地証實了他被控訴的罪行。曼德爾博士的罪行可以用一句話來表達：他是個大主子們的奴僕。這是他真心悔悟地寫在其書面供詞的結尾中的一句話。我現在摘引如下：“我爲了効忠於教會中的上司，而犯了一些罪行。作爲一個天主教的神職人員，我是受他們管轄的，是由他們來指揮的。”被告並非“天主教行動會”的真正發起人。証明文件已經証實了，真正的領導者與創辦人乃是白倫大主教本人，其次，才是他的副手斯維茨博士。是他們把這個現成的組織機構交給曼德爾博士掌管的。同樣，在大主教白倫博士的直接命令下，曼德爾博士又被派到法國。在判決時，應注意到以下的重要減刑條件：曼德爾博士是在職務上的隸屬關係的壓力下犯罪的；他曾主動地、毫不猶豫地、且表示悔悟地招認了他的罪行；他的供詞是完全的，而且非常重要，它有助於弄清全部的案情；最後，還有他那無辜的性格。

主席：謝謝你。我現在請辯護人卜茨曼博士來替雅安·波卡爾博士進行辯護。

辯護人卜茨曼博士：

各位法官，主席先生：

我想我不必重複那些在審訊中已經揭露，且與全體被告有關的事情，我只需舉出特別與被告波卡爾博士案情有關的事情就夠了。如果我們將波卡爾活動的積極性和其他被告活動的積極性比較一下，我們就不

能不看出波卡爾博士活動的從屬性和次要性。波卡爾博士前後只到納粹秘密警察去過三次，而庫拉契則有七十二次；他並不知授權制的事，也不知道“梵蒂岡天主教行動會”的活動。其餘被告均認為自己係梵蒂岡的從屬人員；然而，我想一個秘書在工作上更是直接附屬於其上司了。各位法官先生！我請求對一切可以用來作為減刑條件的情節，諸如職務上的從屬關係、引誘、環境影響及認罪等予以適當的考慮。在判刑時，法庭應酌量考慮改過的可能性。

主席：謝謝你。我現在請辛尼克博士替被告伐茨拉夫·姆特非進行辯護。

辯護人辛尼克博士：

各位法官：

被告伐茨拉夫·姆特非並不是教會正式成員，相反的，他是個從屬人員。在翻譯意大利文的工作方面，他並不僅限於翻譯間諜報告，還翻譯每天報紙上的文章，這就是個例証。在獲取情報或洩露情報給外國勢力的問題上，也談不上是他的主動，因為那些報告在未交給被告之前，就在外國勢力——德·利華手裏了。在被告的非法活動中，應包括他曾經以捏造的不真實的諜報供給德·利華，和他曾經幫助兩個人非法潛越國境的事情。作為減刑條件，我願指出：被告的供詞是完全的，他的犯罪是由於受人引誘，或者是由於職務上的隸屬關係；而且他並沒有利用他所接觸的大使館而潛逃外國的這個可能性。我還提議，應對他活動的積極性遠遜於其他被告以及他缺乏主動性的這兩點，予以注意。我請求法庭盡量引用刑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以利被

告。

主席：謝謝你。辯護人的發言到此結束。現在，我宣佈休庭十五分鐘。

被告最後的陳述

主席：現在再來開庭審訊。在法庭退庭舉行最後會議之前，

各被告有权提出最後申述。現在由被告奧帕塞克發言。

奧帕塞克：在我的案件被審理的時期中，我曾對我自己所進行的叛國和間諜活動以及天主教教会在我國所進行的類似活動作過一番思索。我認為，我有責任就我現在對自己行動的看法加以說明，特別是我應該對過去知道我是個梵蒂岡政策的忠實奴僕的千萬個信徒與神職人員來說明一下。毫無疑問的，我的職責應當是執行聖祖，對信徒們講解上帝的語言，並用基督福音來教誨人們。然而與此相反，我却盲目地服從了梵蒂岡的帶煽動性的指示，服從了那些專門破壞我國、從而使我們與祖國相對立的指示；服從了那些不是為了勞動人民的福利，而是為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富翁和剝削者的利益的指示。我應當慚愧地承認，我們這些生活在我們國家裏的天主教代表們是經常把這種利益誤以為是宗教的利益。由於盲目服從教廷的政治指示，我們不但沒有伸手參加國家建設，反而從事了破壞共和國的工作。不幸得很，這正是整個天主教教会在我國遵循的道路，也正是我自己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這些話能被我們國內的天主教教会領導者們聽到，我將感到非常愉快。

主席：請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發言。

雪拉：我對我的一切罪行表示深切而誠摯地悔恨。我所犯的罪行都是背叛祖國，背叛人民民主共和國制度，背叛勞動人民利益的。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我毫無意思藉此來減輕我所充分認識到的罪過；我再度對我的一切罪行表示深深地悔恨。

主席：謝謝你。現在請雅羅里密克博士發言。

雅羅里密克：在被羈押的時期中，我得到一個反省、權量、探問自己的良心和進行懺悔的機會。我在此地所要說的也就是我反省的結果。我希望我的全体弟兄們，不僅是在國內的，也不僅是下層、中層與上層的神職人員，甚至連教廷的內閣閣員們在內也都能聽到。我不希望替我自己的罪行作辯護；這些罪行我已全然認識到了，而且深深地感到悔恨。使我感到痛心的是產生這些事情的根源，環境的最深的根源。現在我已經發現，我們這些神職人員，主要是天主教會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而且不僅止是錯誤：我們使勞動人民和貧苦大眾離開了我們，因為我們自己脫離了人民。如果把天主教會和神職人員的命運與資本主義的命運連結起來，這就會是一個災難；因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異端，它是拜金主義的，對於基督教來說，它在實質上是和偶像崇拜一樣的。我們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現在已經到了全世界羅馬教會神職人員們痛下決心的時候了，即使在這最後的剎那間，基於基督的仁愛和正義也要站在國際間真正保衛持久和平的前列中來。我這聲明的用意並不是為了想來影響國家法院的判決。

主席：請約瑟夫·契加克發言。

契加克：主席先生，法官先生們、陪審員先生們，我願意在這

裏對我星期一所作的供詞加以補充。我已經認識到了我的罪行的嚴重性，我也完全認識到檢察長对我所提出的控訴的正義性。我還能告訴神職人員，讓他們从我的实例中認識到：不但要做一個神職人員，而且也必需要做一個公民，這樣在他們的一生中才能忠实地完成國家法律所賦予他們的義務，這樣他們才可能真正傳播基督的仁愛与和平，而避免一切引向戰爭的东西。

主席：請奧特卡·斯維茨博士發言。

斯維茨：可尊敬的法官先生們：讓我再次承認我的罪行。由於絕對服从，使我離棄了正道，使我不能認識到梵蒂岡的真正意圖；我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也許是我自己故意地自欺欺人。現在我已經完全認清了我的罪惡。我曾幫助教會和梵蒂岡保全他們的財產。我的上司們都是資本家的同盟者；这种同盟使他們成為在準備中的戰爭的同謀者。我還得承認，我因為參加了這一組織，而危害了勞動人民。我警告天主教神職人員不要再蹈我的覆轍。

主席：請庫拉契博士發言。

庫拉契：我之所以被逮捕，並不是因為我当了主教府諮議員，也不是因為我当了天主教神甫，而是因為我進行了陰謀活動。我深深悔恨這些行爲。

主席：請曼德爾博士發言。

曼德爾：在居住羅馬的九年中，我自己，也可能是我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曾被梵蒂岡的教育所侵蝕。由於長久生活在外國的結果，对自己的祖國說來我簡直變成了陌生人。在这种教育的影响下，我是無法对共和國採取積極態度的。我要指出，造成我罪惡的兩大因素：我对國

家現行法律的不負責任的態度和我對教會矢忠不二的精神。作為一個天主教神職人員來說，我是屬於教會的；而教會確乎領導了我的行動。

主席：請波卡爾博士發言。

波卡爾：在大主教學校以及後來的神學院中受教育的期間，我养成了一种对一切進步事物的仇視和格格不入的感情。我的犯罪，一方面是出於我自己的主動；另一方面，則是根據我的頂頭上司約瑟夫·白倫大主教的直接指示，最後還由於聖使館僱用人員們的直接命令、要求或慫恿。今天，我已經明白地看到了，引導教會和梵蒂岡從事破壞活動的並不是基督福音的啓示，而是資本主義的推動。法官先生們，我對我的罪行表示衷心的悔恨。

主席：請伐茨拉夫·姆特非發言。

姆特非：教會中有許多人与勞動人民及其國家的敵對陣營相勾結，在梵蒂岡的壓力与影响下，發動了一種鬥爭，企圖把他們的屬員及信徒們一齊拖下水去。我願向所有担任神職的同僚們說，如果他們想完成他們的責任和他們的神職工作的話，他們就必需和人民一道前進，決不能与人民背道而馳。

主席：被告們都已經提出了他們的最後申述，審訊到此即告結束。法庭將退庭考慮判決，明日，即十二月三日上午八時將在此地宣佈。

判 決 書

上午八時三十分，國家法院審判委員會全體委員進入法庭。

主席：請听共和國的判決書！

布拉格國家法院第七庭在完成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日的審訊之後，認為各被告：

一、斯坦尼斯拉夫·雪拉

神學博士，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二日生於霍尼·聶特契茲，沙弗拉根主教兼阿羅木茨總主教區的副主教，其最後住址為阿羅木茨共和廣場三號；

二、雅安·奧帕塞克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生於維也納，布列夫諾夫的本篤修道院院長，其最後住址為布拉格布列夫諾夫修道院；

三、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

神學博士，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費林，斯特拉霍夫的勃孟斯特修道院院長，其最後住址為布拉格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四、約瑟夫·契加克

神學博士，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於奧布丹尼，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議會副主教，其最後住址為布拉格第四區格拉堪斯廣場十四號；

五、奧特卡·斯維茨

神學博士，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於比爾森，宗座主教兼布拉格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諮議員，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四區格拉堪斯廣場七號；

六、雅羅斯拉夫·庫拉契

神學博士，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生於拉坦尼斯，聖·維特斯總主教府諮議員兼教士聯合會理事長，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四區格拉堪斯廣場七號；

七、安東尼·曼德爾

神學博士，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生於布拉格，爲主事，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一區米夏爾斯卡街十二號；

八、雅安·波卡爾

神學博士，一九〇六年五月八日生於布拉格，大主教的一等秘書，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四區格拉堪斯廣場五十六號；

九、伐茨拉夫·姆特非

一九〇七年十月一日生於別契弗依的特洛布克，薩列斯修會的修士，其最後住址爲布拉格第八區哥必里斯克廣場一號。

現在在國家法院被告席中的罪犯均犯有：

第一、所有布拉格、阿羅木茨及其他地方的被告們，均從一九四五年解放時起就逐步相互勾結，並勾結其他罪犯，力謀摧毀爲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民主制度及共和國的社会經濟制度，且爲此目的而與外國勢力發生直接联系；其中尤以被告雪拉博士、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博士、斯維茨博士和曼德爾博士等特別嚴重地犯了上述罪行；

第二、所有在布拉格、阿羅木茨、羅馬以及其他地方的

各被告曾在同一時期內，相互勾結，並勾結其他罪犯，企圖獲取國家機密，並將其洩露給外國勢力，且爲此目的曾與外國勢力發生直接聯系，而在實際上也確乎取得了國家機密，並已將其洩露給外國勢力；其中特別是被告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博士、斯維茨博士、曼德爾博士和姆特非均係以專門竊取國家機密之間諜組織成員的身分犯有上述罪行；被告奧帕塞克和斯維茨博士所犯罪行涉及了極端重要的國家機密；被告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博士、斯維茨博士和姆特非之犯有上述罪行，爲時甚長，其範圍甚廣，犯罪方式尤爲險惡；被告姆特非還曾藉此謀得私利；

第三、被告雪拉博士、庫拉契博士和波卡爾博士在佔領期間曾在布拉格，或在阿羅木茨充當過納粹秘密警察的情報員，特別是充當過納粹秘密警察官員班克爾、勃蘭池和奧勃霍塞的情報員；又由於他們與上述納粹秘密警察官員的陰險合作，引起了他人的生命、健康與人身安全上的嚴重危害，尤其鑑於佔領期間的情勢與納粹秘密警察的性質，其危害性更爲嚴重；

第四、被告雪拉博士和斯維茨博士曾於一九四七年在阿羅木茨、普勒羅夫和布拉格以欺詐手段侵吞“教士疾病救濟基金”，特別以財產過戶的狡猾藉口，蒙騙當局，結果使國家中央保險公司遭受爲數達四百萬克朗之鉅的損失；

第五、被告雪拉博士曾在一九四六年在阿羅木茨，

甲、作爲証人在法庭上受訊問時作僞証；

乙、以極端狡黠的手腕勸誘他人作僞証；

因此

第一、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一款第三項及同條第二款之規定，全体被告均犯有叛國罪，被告雪拉博士、

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博士、斯維茨博士和曼德爾博士並適用同法同條第三款第五項之規定；

第二、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五條第一款之規定，全体被告均犯有間諜罪，被告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博士、斯維茨博士、曼德爾博士和姆特非並適用同條第二款第三項之規定，被告奧帕塞克和斯維茨博士並適用同條第二款第四項之規定，被告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博士、斯維茨博士和姆特非並適用同條第二款第五項之規定；

第三、被告雪拉博士、庫拉契博士、波卡爾博士曾在極端嚴重的情況下惡毒地犯有第 117/1852 号法令第八十七條所規定的破壞公共秩序罪；

第四、依據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一九七、二〇〇、二〇三各條之規定，被告雪拉博士与斯維茨博士犯有欺詐罪；

第五、依據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五、一九七、一九九各條第一項和第二〇三條之規定，被告雪拉博士犯有欺詐罪和共謀欺詐罪；

因此被判处如下：

一、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三款，參照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並考慮到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之規定，參照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和第十八條之規定，剝奪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自由权二十五年；

二、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三款，參照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並考慮到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之規定，參照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与第十八條之規定，剝奪雅安·奧帕塞克終身自由权；

三、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三款，參照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並考慮到刑法第二十九條

第二款之規定，參照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和第十八條之規定，剝奪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自由權二十年；

四、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三款，參照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三十四條，並考慮到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和第十八條之規定，剝奪約瑟夫·契加克博士自由權二十年；

五、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三款，參照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並考慮到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之規定，參照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與第十八條之規定，剝奪奧特卡·斯維茨博士自由權二十年；

六、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一款，參照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三十四條和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及第十八條之規定，剝奪雅羅斯拉夫·庫拉契博士自由權十七年；

七、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三款，參照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並考慮到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參照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和第十八條之規定，剝奪安东尼·曼德爾博士自由權二十五年；

八、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一條第一款，並參照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三十四條和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及第十八條之規定，剝奪雅安·波卡爾博士自由權十八年；

九、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五條第二款，參照第 117/1852 号法令第三十四條之規定，考慮到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並參照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和第十八條之規定，剝奪伐茨拉夫·姆特非自由權十五年。

依據刑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羈押期間將算入各被告之刑期以內，即刑期從他們被逮捕之時日算起，直到判決之法定有效期屆滿時為止；

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四十七條之規定，本案各被告

除被处以剝奪自由权外,並加以現款罰金,計:

一、斯坦尼斯拉夫·雪拉博士 一〇〇・〇〇〇克朗

二、雅安·奧帕塞克 一〇〇・〇〇〇克朗

三、斯坦尼斯拉夫·雅羅里密克博士:

五〇・〇〇〇克朗

四、約瑟夫·契加克博士 一五〇・〇〇〇克朗

違抗不付此款時,將加处剝奪自由权一年;

五、奧特卡·斯維茨博士 五〇・〇〇〇克朗

六、雅羅斯拉夫·庫拉契博士 四〇・〇〇〇克朗

七、安东尼·曼德爾博士 二〇・〇〇〇克朗

八、雅安·波卡爾博士 五〇・〇〇〇克朗

九、伐茨拉夫·姆特非 一〇・〇〇〇克朗

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四十八條之規定,宣佈沒收本案
案中所有被告之全部地產。

依據第 231/48 号法令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宣佈剝奪本
案中所有被告之榮譽公民权;十年之內不得恢復此項权利。

所沒收的珠宝珍貴物品發还充宗教用途。

宣判以後,被告雪拉、奧帕塞克、雅羅里密克、契加克、
斯維茨、庫拉契、曼德爾、波卡爾和姆特非在答覆審判委員
会主席訊問時,均宣稱对本判決不擬提出上訴,並立即執行
判決。

主席:我宣佈本案至此結束。